

《三江文史资料（第七辑）》

三江文史资料编委会

主 编：韦宗超 韦 刚
副主编：潘忠林 向美焕 赖 军 龙善辉 陈杏萍
编 辑：赖诗仁 廖韦春 吴明照 莫先平 唐胜荣
参 审：杨文朴 唐志宗 杨通山 颜 谷 吴炳金 梁国文
责 编：赖诗仁
文 印：张月珍
校 对：赖诗仁

目 录

吴炳金	三江早期革命烈士邓恒若生平考.....(1)
唐志宗	忆我的革命领路人曹竞军同志
梅品彰 赖良基	送信
吴炳金	解放三江“235”团番号质疑
颜 谷	溶江河收鸦片烟税
成瑞竹	解放初在三江工作的回忆
王善昌	白云突围脱险
刘森廷	往事悠悠 烈士千古
赖守基	富禄重点剿匪侧记
杨振光	解放初期光辉民兵参剿点滴
梅品彰	溶江区举办土匪自新学习班追忆
周 瓮	匪首石世佑的穷途末路
陈进文	我所知道的土匪杨标的一些情况
覃安民	解放初期斗江区征交公粮工作回忆
杨通山	回忆周春鸣同志
杨通山	三江侗族自治县成立前后
杨文朴	民族区域自治工作回忆
颜 谷	独峒武装匪徒团伙的覆灭
覃安民	独峒区农业合作化工作回忆
曹积尧	三江公社化初期的回顾
欧邦玉	参加自治区射击运动会的经过
梁 谊	三级书记上苗山
梅 岭	以史为鉴，莫让悲剧重演
梅 岭	华练救灾的日日夜夜
吴炳金	郭沫若为程阳桥赋诗追忆及“层”、“寻”辨正
梅 岭	郭沫若手迹失而复得记
肖玉书	组建三江民兵独立团 支援枝柳铁路建设
杨文朴	溶江公路修建前后
何汉昌	回顾重新工作的第一步
何汉昌	在企业局工作的岁月
赖守基	三江县粮食购销之变迁
梅 岭	悠悠侗乡情

龚 义	关于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工作的汇报
杨大彬	丹洲书院的来历及演变
吴大贤	明清民国时期三江教育概况
赖守基	清朝民国时期的富禄镇
赖守基	民国时期的富禄教育
赖守基	民国时期三江两大米市
杨大彬	我对魏任重的去思
颜 谷	我所知魏任重在三江的二三事
杨开枝	回忆香山慈幼院在三江办学
王机先	两毁三建回龙寺
吴炳金	史事扫描
唐志宗	宜阳旧地名地物考
莫 抑	《怀远县志》序
碑文几则	(《重修二圣侯王庙碑》《钱粮额定》《清白悠传》《名扬万古》)
诗二首	……凌绍光
忆江南·侗乡好	……韦 英
忆江南·瑶山美	……覃安民
诗四首	……龚 敬
记隔山一对夫妻	……龚 义
访白石沟	……梁肇基
咏三江鼓楼	……覃安鼎
瑶乡名胜·风情	……向本才
诗三首	……赖诗仁
众志成城抗“非典”	……杨顺丰
诗三首	……莫先平
词二首	……韦运芳
《三江文史资料》稿件续征启事	

三江早期革命烈士邓恒若生平考

吴炳金

在东兰县武篆北帝岩（即列宁岩）挂着的“列宁岩农讲所组织机构图”中，在韦拔群的名下简显的写着：军事教官——邓恒若。当年，韦拔群在右江一带开展农民运动时，邓恒若作为韦拔群的得力助手，担任过东兰第一、二届农讲所教员，第三届农讲所副主任，都安县农协会主任。由于他对敌斗争英勇坚决，韦拔群给他另取了一个名字，叫邓无畏。那时，在东兰、凤山、都安一带，邓无畏几乎和韦拔群的名字一样，老幼皆知，遐迩闻名。1927年，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在悬赏通缉韦拔群等23名首要“匪党”名单中，邓无畏赏格为二千元。虽然邓无畏名震右江，但人们也仅仅知道他是韦拔群的战友和国民党通缉的重要人物，至于他的身世、经历，并如何结识韦拔群以及此后的情况等，直到现在仍鲜为人知。

邓无畏原名邓其寿，又名邓权、邓恒若。1900 年出生，祖籍广东梅县，后迁居融安板董村。清光绪年间，其祖父邓胜杨任怀远（今三江县）厘金厂（税收机关）执掌，全家又随迁到三江丹洲居住。邓无畏就读于丹洲小学。因此，邓无畏当属三江县籍人士。

邓无畏小学毕业时，正值辛亥革命兴起，宣统退位，民国成立。邓无畏经人介绍，到柳州给当时任广西右江军政府柳州分府总长兼统领的刘古香当勤务兵，时名邓权。在“二次革命”反袁斗争中，刘古香被拥袁势力杀害，邓无畏流落柳州。

1917 年，邓无畏在柳州参加刘震寰部，被送去桂林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调南宁讲武堂任教官。不久，又回刘震寰部，改名邓恒若，历任排长、连长、营长等职。

1921 年 5 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下令讨伐陆荣廷，并派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进军广西。刘震寰率部起义，倒戈向粤。这期间，邓无畏率队会同粤军黄明堂部到都安一带追剿陆荣廷的残部林俊廷。在都安，经所在连教官唐家祥介绍，与唐的族妹，拉烈乡三表村的唐爱研结为伉俪。

1922 年，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刘震寰奉孙中山之命率部入粤，改编为建国军粤桂湘联军西路讨贼军，刘震寰任军长。邓无畏在黎鼎鉴（融水人）师覃友松（都安人）团当营长，驻军广州。1924 年，韦拔群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期间，常到团部与覃友松谈时局，讲形势。经覃友松介绍，邓无畏结识了韦拔群。

1925 年春，韦拔群以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回东兰开展农民运动。不久，刘震寰部发生事变，邓无畏和覃友松同回广西。邓无畏以省农运特派员的身份和韦拔群、陈伯民、陈铭九等同志一起开展农运工作。邓无畏和覃友松在都安的夷江、拉烈发动群众组织了农民自卫军。

1925 年 11 月，韦拔群在东兰武篆北帝岩举办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来自周边各县。邓无畏在该所担任军事教员。

农讲所开办不久，韦拔群带领学员参加清算江平乡土豪龙显云的斗争大会，龙显云因而对农讲所恨之入骨。他勾结杜瑶甫，暗使土匪在农讲所附近拦路抢劫并嫁祸于农讲所，破坏农讲所的声誉。群众也继续向农讲所控告龙显云欺压群众，鱼肉乡里的罪行。11 月中旬，韦拔群派邓无畏和黄汉英两位军事教官带 10 多名学员前去惩罚龙显云。11 月 30 日，由韦拔群、陈伯民等发起在县城召开国民党东兰县党员大会，农讲所全体学员集中县城，高呼“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军阀刘日福和知县黄守先做贼心虚，加上龙显云的诬告，便决定对农讲所下毒手。12 月 29 日，黄守先带领警兵、民团、家丁围攻农讲所。得到情报后，韦拔群和邓无畏等人作了研究，做好迎击敌人的准备。韦拔群带领大部分学员埋伏在洞外，邓无畏带少数人守在洞里牵制敌人。另外，又派人到附近村子通报农军前来增援。当黄守先、龙显云带着匪兵逼近洞口时，邓无畏他们开枪阻击一阵后，便悄悄沿着洞内通道向后山转移。匪兵冲进洞内大肆进行破坏，还在洞内堆起柴草焚烧。待匪

兵撤离洞口时，韦拔群和邓无畏带领学员从两边夹击，黄守先不支，率队撤退。第二天，韦拔群和邓无畏等又带领农讲所学员和各区增援的 300 多农军向驻扎在中和乡那陆村的黄守先一伙发起进攻。黄守先败退缩回县城。

第一届农讲所学习结束后，邓无畏和陈伯民、陈铭九转回都安，发动群众组织农会。该县第一个农民协会华桂乡丹桂村农民协会就是在邓无畏的具体指导和组织下建立起来的。在古河常谷村召开的两千人群众大会上，邓无畏作了鼓动性演讲，他右手扬起锄头，说这是代表农民；左手擎起织布梭，说这是代表工人，工农要联合。接着他又抓了一把筷子说：一根筷子易断，一把筷子难折，只要我们工农团结起来，一定能打倒土豪劣绅，赶走列强！他简短地教唱一段歌后又说：我们农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做工，不得吃，没衣穿，特别是妇女，被压迫在最低层，我们要翻身，实现男女平等，就要联合起来，推翻反动政权，建立工农民主政府。为了激励妇女起来参加斗争，他当场题诗一首：“挥尔额上汗，疗尔腹中饥，尽尔十指能，织尔身上衣”。会后，宣告成立乡农民协会，并公审枪决了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黄朝规。

1926 年 2 月，黄守先、杜瑶甫勾引龚寿仪团到武篆大肆烧杀掳掠，制造了“东兰惨案”。惨案发生后，邓无畏协助韦拔群积极争取外界声援，发动群众开展锄奸斗争。9 月，农军攻下东兰县城，革命形势有了好转。为了培养更多的农运骨干，韦拔群又于 1926 年 10 月和 1927 年 6 月在武篆育才小学开办第二届和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邓无畏担任第二届农讲所教员和第三届农讲所副主任，和韦拔群等同志一起，培养了一大批农运骨干。在此期间，邓无畏还参与组织农军公审处决武篆大地主梁士训的斗争，带队到凤山反击黄明远部对凤山农运的镇压，并经常带学员下乡宣传、演讲，发动群众清算土豪劣绅的罪行。由于他机智、沉着，对敌斗争英勇无畏，韦拔群给他另取了一个名字叫邓无畏。此后，他即以邓无畏的名字在右江开展农运活动。

第三届农讲所学习结束后，韦拔群作为田南道农运负责人，派邓无畏到都安县领导农运。经过邓无畏、陈伯民、陈铭九、覃道平等同志的组织发动，都安全县大部分乡都建立了农民协会和组织了农民赤卫军。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都安县农民协会，邓无畏担任主任。县农协会成立后，邓无畏带领农军清算土豪劣绅和团务总局长韦还甫的罪行，轰走了反动县长梁济升。

1927 年“4·12”反革命政变后，黄绍竑也在广西大举“清党”，命令百色、龙州的反动军队头目刘日福、吕焕炎镇压右江的农民运动。韦旦明就任都安县长后，韦还甫又卷土重来，他们伙同国民党正规军吕谷貽团进行反攻倒算，追捕革命人士，残酷镇压都安县农民运动。在百色恐怖面前，邓无畏带领农运骨干撤离县城，和陈伯民、陈鼓涛、覃子升、黄鲂如、韦醒民、蓝子瑞等同志继续在拉烈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运骨干，组织农民赤卫队，同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斗争。

1927年12月，国民党广西省政府悬赏通缉韦拔群、陈守和、叶一茅、邓无畏等二十三人。邓无畏被迫离开都安。后来打听到桂系第十三军二师八团团团长张子扬是融安浮石人，于是就利用同乡关系改名邓权暂避于其部，任副连长，随军到过广州、上海、天津、武汉。这期间，先后发生了“蒋桂战争”、“护党救国军反蒋战争”和“蒋冯闫战争”，面对国民党军阀频繁的内战，邓无畏感到前程渺茫，于是邀约鹿寨县的伍学仁和柳城县的叶世祯两位好友从武汉转回广西。

1930年初，邓无畏重返东兰面见韦拔群。韦拔群即派邓无畏到广州与黄一平共同搞兵运工作。在广州，邓无畏碰上了原来的上司、融水籍人黎鼎鉴。那时陈济棠正在扩充力量反蒋，派黎鼎鉴到广西招兵，拟在武宣成立第一集团军第二别动队。黎鼎鉴极力邀约邓无畏同行。邓无畏也想趁此机会搞到一批枪枝，以发展革命武装。于是同黄一平邀上叶世祯于1931年前往武宣。到武宣后不久，黎鼎鉴和覃德组织了100多人的队伍，在武宣设立了司令部。但不久即被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新编第一师朱维珍部缴械，副司令覃德被打死，司令黎鼎鉴潜逃梧州。韦拔群得知此消息后，指示邓无畏打入朱维珍部搞兵运。朱维珍有一名副官，原是韦拔群的部下，后叛变投敌，认出了邓无畏。朱维珍就将邓无畏和叶世祯拘捕起来。被捕后，邓无畏极力否认叶世祯与自己的关系，保护了叶世祯。而他却受尽了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敌人关押、审讯了20多天，一无所获。最后竟下毒手杀害了邓无畏。邓无畏牺牲时年仅31岁。

忆我的革命领路人曹竞军同志

唐志宗

曹竞军（积玉）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

在风风雨雨的几十年中，历事甚多，随着岁月的流逝，大多早被淡忘，唯竞军同志对我的充分信任和精心培养，把我引上革命道路，以及他的思想品行和工作作风，对党对人民革命事业赤胆忠心的高尚情操，对我的影响和熏陶，却使我永难忘怀。

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

1948年，佳林、大保、下村三个行政村联合设立完全中心小学（简称联校）。把原任寨准乡中心小学校长王大增和原任古宜表证中心小学教导主任荣士奇调到联校分别任校长和教导主任。与此同时，我亦从古宜表证校调任联校教师。此外，还有曹庆庭、黄以福亦先后到联校任职。

当时竞军在寨准中心校任教。在联校教书的老师当中，除黄以福外，其余都是他的老熟人。所以，他每次由家到校或由校返家，路经联校，常进校稍事歇息叙话。

1948年下学期，特别是到了后半截，竞军进校只和大家略为寒暄之后，便多半托词同大增私下交谈。大增和他是多年至交，私下交谈，情在理中，谁都不以为怪。在这期间，

大增也常在竞军面前同我称兄道弟，并说我们俩过从甚密，情同手足，堪称莫逆。

此后，他常寻机单独同我谈心。他回家必由我村过渡，回家时我们可以同行一段路程，是个别谈心的最佳机会。所以，他除了照常同大增交谈之外，也常约我同他一路回家。路上谈谈时局和对时局的看法等等。开始时，他总让我先谈，极少插嘴。有一次，我们俩从联校出来，仍如往常，边走边谈。到岔路口时，他要我送他到渡口，我欣然应允。走到近渡口时，见渡船已向对岸开去，他便拉我在路旁草地上坐下休息等船。坐下后，他突然问起我在1947年冬，县中侯崇才老师被国民党县府以异党嫌疑拘捕，我参加营救的事。

我抬头望望渡船，便建议说，船等会就返回，此事以后再谈，以免耽误你赶路。他说，不要紧，日头还蛮高呢。我想，我参加营救也只是我到县参议会为侯老师作个证，别无他事，谈谈也费时不多。于是，我便把我到县参议会去应付柳州专署官员的问话和为侯老师作证的全过程，特别是将在侯老师处被搜查出的两本书（《延安访记》和《大众哲学》）的来龙去脉和在应对当中所遇到些险情，又如何作巧妙辩解而得以化险为夷的情况，详述了一遍。

竞军听后，只点头笑笑，不说什么，便起身准备上船。我要他进家住宿，明早再走。他说，过了河，直走平路，不会夜的，说完匆匆上船而去。

我在往回走的路上，反复琢磨，竞军为何对这桩往事感兴趣，硬要我细述全过程？我猜想他对这回事必早有所闻，这次要我详谈，无非是想核实一下情况，以便对我有更深了解而已。

这以后，大增陆续给过好几本油印小册子让我带回家，晚上学习，当中有《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一些章节），还有《华南人民武装行动纲领》等，并嘱务必搞好保密。

1949年2月初，新学年开始了。竞军、大增和我，工作没有变动，他过联校，仍常进校稍息。但这段时间，他和大增个别交谈较多。几天后，大增找我谈及“新民主主义促进会”的事。他解释说，这是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又讲了这个组织的宗旨、工作任务和必须注意的事项等等，简要地交待一遍。之后，他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我听后感到的新鲜，也十分兴奋，当即欣然表态，要求参加。大增要我写个申请。申请书比较简单，我当晚回家，很快写好，第二天回校即交给大增。过不几天，大增找到僻静处向我宣布，说组织上已批准我加入“新进会”。他严肃地对我说，你已是会员了，今后一切定要听从组织召唤，拥护共产党，遵守组织纪律，注重保密……说完，还要我自己表个态。我基本上按他所交待的那些内容重复一遍，他点头说，很好，就算是宣誓吧。

我知道，这是竞军同志对我精心培养、教育，让我懂得革命道理，领我一步一步地走上革命道路。当然，这其中大增同志对我的推荐和帮助教育，同样使我永志不忘。

关爱信任 义重情长

1949年3月以后，竞军调回泗里乡中心小学任教，我们之间很少见面。民变武装举义后，国民党在三江的县、乡政权大部被摧垮，县长逃跑，民变武装占据县城。不久，国民党省保安团派兵前来征剿，他们迅速恢复县及一部分乡、村的反动政权。这时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十分激烈。仗天天在打，时局动荡不安。6月的一天，我拿小船载着两担谷子到富文坪去碾（我村米碾被洪水冲毁），并进我大姐家吃中饭。竞军知道后，就过来看我，这真使我喜出望外。我们进入厢房，他先问我一些近况后，便跟我谈一些全国解放战争的新形势和本县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近况。这次会面，使我了解了许多过去渴望知道而又无法知道的事情，内心非常激动。临别时，他反复地叮嘱我：在这动荡不定的时候，一定要自己把握好方向，绝不盲从，稍有失慎就会误入迷途。今后没有我的招呼，谁喊你都不要瞎跟着跑。并告诉我说，你在家，仍如以前一样，继续作些社会调查，掌握各阶层思想动态及社会上存有的枪弹等情况。在目前情势下，你同大增要少接触，也不用来找我。他又特别交待：以前给你们学习的油印小册子要收藏好，做到万无一失，以免引起麻烦。

谈完后，我径直到碾房去挑米下船。在河边的路上，恰好碰上蔓山，和他打招呼后，他问我见到积玉（竞军）没有？我说，见到了，我俩还谈了好一阵子话呢。他说，那好，你就听积玉的。说完话，我速开船回家。

这次在富文坪得见竞军和蔓山，话虽讲的不多，但确是言简意明，语重心长，对我的前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后来，他们出去打游击，没有告诉我，使我有些茫然，但好在不久前得到竞军的叮嘱，于是就按其所嘱，在家静候消息。在这期间，也曾有好几起人登门邀约我出去参加民变。尤其是我的一位族兄唐汉斌三番五次到家动员，要我跟他去欧部（民变武装），我一想到竞军同志所嘱，便坚决婉言谢绝。但是，等了两三个月，音信全无，又不敢乱跑和随便打听，内心难免有些迷惘。

1949年11月18日傍晚，解放大军解放了三江县城。过得两天，接到竞军通知，要我速到县中找秦振武老师。并要我设法转告寨准的卢耀先、何耀辉两人去田寨河大顺村集中学习。我在欣喜之余，即速找人带话通知卢、何二人，他俩如期到达下村。我把他俩送过河后，也转回家中收拾点漱洗用具和换洗衣物，便抄小路直奔县中。

路上，我边走边想，竞军终于没把我遗忘。更使我感到欣慰的是，竞军在十分关键的时刻，给我谆谆教诲，指明方向，使我免入歧途。特别是想到那位族兄，不厌其烦地要我跟他出去，可是他到杨春那里混了一阵子后，便拉队叛逃到黎平水口当土匪去了。好险啊！有道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若不是竞军的真诚关爱和信任，后果不堪设想。这不仅是我个人之幸，也是我全家之大幸也！

身教言教 堪称良师益友

我到县中时，振武老师也刚从古宜回来，我们师生久别重逢，大家无限欣喜。振武老师说，竞军告诉我，他已通知你到这里来，要你在这里等他，三几天后他就上来了。振武老师还说，我很忙，新建的县治安委员会事情很多，我每天都过古宜那边工作。这里又常有人来访，你可帮我接待一下来访者。

在县中住了两夜，第三天，我的一位老同学梁日成也来找振武老师，振武老师安排我们俩在一起。第二天中午过后，竞军和梁谊来到县中。当时我同梁谊素未谋面，互不相识，只听竞军叫他荣平。振武老师恰好在家，他们三人在房间交谈，不到40分钟便出来了。日成跟着梁谊上斗江。竞军跟我说，我们属柳北解放总队第三大队，大批同志正陆续到田寨河大顺去集中学习，大队领导都在那边。我和蔓天、大增、梁谊先上来。我们这个组就叫情报组，主要任务是从事情报工作。我通知你来，就是要你参加这个组和我们一道工作。他还告诉我，现在蔓天、大增在泗里和寨准等地活动，梁谊和日成在斗江上面，你就跟我在古宜一带。他还给我交待了工作任务、方式方法以及必须注意的事项等等。振武老师告诉我，竞军就是这个情报组的组长。

此后，我就一直跟他在一起。但是，对这方面工作，我是从未经过，不知如何着手。开始时，他总让我跟他一道，边做边教边学。见摸到一点头绪后，便逐步让我个人单独出去工作。每次派出，他都把工作任务，工作方式方法一一交待清楚。他强调，我们所要接触的对象，必先了解其人，以便因人制宜，有的放矢；言谈和缓自然，使对方不感到有什么压力和顾忌，以达到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每次出去工作回来，他都认真地听取汇报，并及时指出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这就使我懂得许多东西，工作不断得到进步。

蔓天和梁谊等小组，所得到的情报资料，均送到竞军这里，经他综合整理，包装密封，选择携带工具，一切稳妥之后，还要细察一遍，看有否破绽之处，凡此等等，事必躬行。信由我负责传递。我先后两次到丹洲，一次到老堡。动身前，他都把要走的路线，夜息何村，遇上麻烦应如何沉着应对等事交待明白后，才叫我上路。他这种高度负责的精神和严谨细密的工作作风，对我影响很深。

又如，县人民政府尚未宣布成立，何俊县长到达丹洲后，即先期上到古宜，旨在了解熟悉情况，找些旧政权的头面人物做做统战工作，化阻力为助力。有一次，何县长叫竞军找韦建民（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参议长、民团司令，代县长）来，他要同韦谈话。何县长和竞军商量，谈话地点就选在旧县府的县长室内，此室是一套两间，方便在内间暗中记录。谈话地方，要像个会客室样子，内外均无武装警卫，使室内气氛平和，让谈话对象没有感到什么压力和恐惧。

一切部署妥当后，又叫我作好在里间秘密记录的准备，他亲自打开内房门，放好窗帘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深知这工作任务很是艰巨，要你在里面工作，连咳嗽都不行，

但必须忍耐，尽力克制，我相信你会配合好的。

韦建民到来时，竞军到大门迎候，并一直把他带到县长居室，何县长很客气地招呼他入座，以礼相待。韦见县长居室内外，均不见一个武装警卫人员，室内只有县长和竞军，连他共三个人，环境气氛较为轻松。何县长首先给他讲全国解放战争形势，以及共产党、人民政府对旧政权的军政官员的政策，希望他们弃暗投明，为新中国建设出力。韦见县长态度谦和，原存恐惧和戒心基本消除，情绪比较稳定，大体上能按照我们的要求陈述，使我们掌握了不少情况，特别是旧政权的一些组织及重要头目的基本情况。而我亦能按竞军要求，坚持下来，把所需要的一些重点问题记录好。这次谈话是成功的，收到预期效果。

我参加三大队后，一直都在竞军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直到土匪暴乱，县人民政府南撤丹洲时为止。1952年，又在竞军的举荐下，经组织决定，调到县公安局。此后几年，还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对党对人民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工作兢兢业业，责任心强，事事谦虚谨慎的作风和态度，对我的影响和教育很大。我走上革命道路是他指引，学会做事也是他教的，他的典范作用，言教身教，堪称良师益友。

我现已年近八旬，身体各部功能均有较大衰退，文笔事已是力不从心。但是，对于竞军，我仍于心耿耿。所以，尽管笔拙，也还是想写点东西，不成文体，权当对竞军同志的缅怀吧！

2004年8月15日

送 信

梅品彰 赖良基

1949年，我俩（梅品彰、赖良基）在三江中学读书，大约在农历4月底，端午节快到时的一天，在办公楼旁边遇见教导主任秦振武。他问：“初五快到了，想回家吃粽子了吧？”端午节吃粽子，这是传统习俗，特别是母亲做的粽子，和街上卖的不同，有枕头粽、三角粽，肉多板栗多，特别好吃，就随便答道：“想吃，就怕难请假。”秦主任笑笑说：“哎，可以向班主任请假嘛。”说实话，进中学以来，除放寒暑假回家，平时无特殊情况，是不请假回家的。一是因为路途太远，回家一趟来回要走五、六天山路，会影响学习，二是怕难获准假。听秦主任这样讲，有点心动，就冒昧地找班主任罗家阔老师。他笑咪咪地说：“想请假就写假条来。”罗老师对我们要求很严，但不管是学习还是生活却很关心。我们是第五班调皮的学生，夏天常到龙滩角游泳冲浪，多次被罚站。学校的鸡爪梨树甚多，成熟了就爬上树打鸡爪梨吃。罗老师碰上，在树下劝诫，我们就是不下来，他也无可奈何。对罗老师的关心当时我们不理解，对他的“严”有反感，暗地称他为“蒙”（侗话，即老虎）。现在见他态度和蔼，就大胆地写请假条，当然是写回家要钱要米的理由。罗老师说：“请假超过一星期要经教导处批。”我俩对于此事也不放在心上，谁知仅一天就批准了。没想到这次请

假这么顺利，我俩真是欣喜若狂，准备回家。当晚，秦主任把我俩叫到他房间问：“打算那天走？”“假批了，明天就走”。“那好，你俩帮我带封信到大滩我表弟覃光珍家，交给林老板”。那信是折叠的小字条，梅品彰随手放入上衣口袋。他见后说：“放在那里不牢靠，容易掉。”他左看右看，上瞧下瞧，知道梅品彰平时爱打篮球，球鞋里有厚海绵，就说：“放入海绵底，但过水要脱鞋，不要搞湿了。”我们说，保证不会弄湿弄丢。

第二天清晨，我们渡过大洲洲尾三角渡，上泗里凉亭，过石门渡，上和里坡，一路往家奔去。山路上上下下，弯弯曲曲，确实难走，但心情舒畅，不觉劳累。下和里冲要涉过多处小溪，特别是过产口苗江河，水深过大腿，我们都脱鞋而过。到了产口寨边，见有穿便衣持枪的哨兵检查，我们说是学生请假回家的，看我俩一副学生相，也就放行了（后得知是良口莫虚光队伍）。当晚在良口住宿，第二天清晨起床赶路。大滩离良口不远，找到覃光珍家，进入堂屋，就见一个头戴礼帽，身穿唐装便服，戴着眼镜，上口袋还有一根链子连着袋内挂表，文质彬彬，一副木材老板模样的人，知道这就是林老板了，于是就把信交给他。信不长，他看后对我俩微笑致意，非常客气。因要赶路，我们没有休息，就离开大滩。一路上我俩议论，秦主任是教书人，怎么跟木材商做生意，而且看来还是做大生意的。

我们回到学校后，形势突变，听说秦主任的家乡建立了叫“洋溪人民保卫队”的武装，直捣国民党政权。学校的几位老师也突然失踪了，弄得学校人心惶惶，影响上课。至1949年11月中旬，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县城古宜。后来我们才知道，林老板是地下党的负责人，真名叫雷剑。我俩为三江的解放做了区区送信小事，心里感到乐滋滋的。

2003年4月15日

解放三江“235”团番号质疑

吴炳金

1949年11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39军115师从贵州省洪州翻越大塘坳下林略和湖南播阳所经独坡下干冲进至独峒，18日攻占县城古宜，解放三江。

三江解放，对三江人民来说，是历史的大事件。记住这一历史，铭记解放三江的部队和指战员，尤其是解放三江的先头部队，对三江各族人民有着特殊的意义。

长期以来，见之一些史志资料，特别是《三江文史资料》的不少回忆文章都记述为115师235团首先进入县城解放三江。有的记述为天津支队。例如，《三江文史资料》第二辑：

《我参加民变武装前后》一文（作者吴仕德），第66页称：“1949年11月18日三江县城解放，我们民变武装部队跟随进驻古宜……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支队丁朴同志主持成立了三江县治安委员会。”

《民族革命武装欧文光部斗争史片断》一文（作者吴仕华），第74页写道：“解放军先头部队在三把岔与欧部胜利会师了。……这位解放军首长，后来才知道是115师235团（即天津支队）的程国藩团长。……18日拂晓，欧部和解放军一同进入三江县城，由部队首长主持，成立“三江县治安委员会”。

《回忆张雄同志》一文（杨雄口述，唐盛整理），第144页写道：“副司令杨春派我们5

人前往贵州黎平洪州迎接解放军进军三江。到目的地，接见我们的是两位身材魁伟的领导，即 115 师 235 团（天津支队）团长程国藩，政治部主任丁朴同志。”

《迎接解放大军进入三江的第一天》一文（搜集整理者杨成森），第 165 页亦称：“1949 年 11 月 16 日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支队）115 师 235 团已经到贵州洪州所……支队派人前往贵州洪州迎接解放大军……我们又配合解放军追击敌人到达古宜”。

《三江县治安委员会成立前后》一文（作者罗国恩），第 165 页写道：“1949 年 11 月 18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39 军（天津二支队）进三江县城古宜，11 月 20 日，天津支队政工民运处丁朴同志主持召开筹组县治安委员会的协商会议。”

《三江文史资料》第六辑，《追忆往事》一文（作者曹泽民），第 25 页称：“1949 年 11 月 17 日……半夜即听古宜街和西游寨那边响枪响炮……次日才知道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115 师 235 团（天津支队）民运科科长程国藩和政治部主任丁朴同志带队打前站。”

上述文章是作者口述或记述亲身经历之事，按说史实清楚，不应质疑。但近年来，笔者在整理史料过程中，发现上述部队番号有异。经考证，笔者认为，首先进入县城，解放三江的先头部队是 345 团。115 师没有 235 团的番号。依据是：

一、《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 39 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史》记载：“1949 年 11 月 10 日，346、347 团占领通道。……11 月 18 日 115 师攻占古宜，歼敌 329 师 987 团一部。19 日，该师以 345 团为前卫，从古宜出发，抢占珠玉渡口……”

二、剿匪期间，115 师留驻广西剿匪。39 军军史和广西剿匪资料记述：“军主力凯旋北上时，115 师奉命于 12 月 25 日进驻柳州、桂林沿线，接替 49 军担任护路、剿匪任务。师直驻鹿寨（后驻宜山），343 团驻雒容（后驻南丹），344 团驻永福（后驻来宾）。345 团驻阳朔、荔浦（后驻罗城、宜山）”。

三、《柳州鱼峰文史》第 17 期第 29 页《解放柳州之战》（作者韦烽）一文称：“1949 年 11 月 24 日 115 师前卫团 345 团在柳城县沙埔歼敌……师部命令 344 团以每小时 15 公里的速度进军柳州。”

四、《柳州市革命老区今昔》（二）第 60 页《解放沙埔的战斗》记述：“1949 年 11 月 22 日。115 师参谋长颜文斌召开战前会议，作战斗部署。……24 日，345 团控制了沙埔河渡口北岸。上午 8 时，345 团团长沙程国藩将团指挥部前移……”

五、1996 年，345 团团长沙程国藩应邀参加柳城太平、沙埔烈士纪念塔竣工典礼。

上述材料证明，345 团是 115 师的前卫团，团长程国藩是准确的。

从当时 39 军 3 个师团级单位番号序列来看，整体序列为：115 师为 343、344、345 三个团；116 师为 346、347、348 三个团；117 师为 349、350、351 三个团。235 团不列入该军和 115 师序列之内。

对其它两点也顺便在此阐述一下。

把 345 团称为天津支队和将 39 军称为天津二支队的提法也需更正。当时经过三江的有 2 个师，115 师从独峒至古宜，117 师从湖南经沙宜入三江，过桐叶、白言下长安。115 师代号为天津支队，117 师代号为兰州支队。不应将天津支队作为团的称号。

有些回忆文章把程国藩写为民运科长，也应作更正，有的说程国藩团长主持成立治安委员会，也不符合史实，因为 19 日 345 团已作为前卫团出发。成立县治安委员会的协商会议 20 日才召开，留下丁朴主持会议是符合史实的。至于丁朴同志当时的确切身份是什么，还需进一步考证。但我个人倾向于罗国恩的说法，因为罗当时参加了筹组县治安委员的协商会议，丁朴的身份在会上应有所介绍。

以上如有不妥，还可商榷。

2006 年事 8 月 3 日

溶江河收鸦片烟税

颜 谷

共产党收鸦片烟税？这会使人感到惊讶和不解，时隔 50 年了，我曾亲身参与在良口收鸦片税之事也该解密，公之于众了。

解放前，湘黔桂三省交界的几个山区县普遍种植鸦片，稻田、山地到处都种，国民党是明“禁”暗“放”，一到春天鸦片收割季节，国民党县长就带大队人马下乡以“铲烟苗”为名，收取鸦片烟税，中饱私囊。在三江当过县长的谁不发大财？1949 年初，三江县长白济环离任时，用竹篓装东毫，雇三只木船运走。当时，谁都知道来三江当县长是个肥缺。据说，广西省政府挂的广西地图，三江的位置都被指点得模糊不清了，个个都想来三江捞一把。

1949 年 11 月三江解放，12 月人民政府成立。乡、村政权尚未建立，工农业生产均未恢复，经费极缺，还得向商家借款开支。

1950 年开春，正是鸦片收割季节，为了解决当前经济困难，三江县人民政府决定派工作组下乡收取鸦片烟税，以充实国库。4 月初，县组织的“民族工作组”下乡了。我参加溶江工作组，由一位解放军干部任组长，负责富禄、梅林一带，莫虚光任副组长，负责良口、洋溪一带。我随莫虚光在良口。当时，良口乡治安委员会有名无实，我一个人住在乡公所守电话，没床，没被，我只带一张破毡子睡在稻草堆上。

刚到乡，莫虚光就带我们去拜访“寨佬”莫时中（莫虚光伯父），谈了我们工作组的任务。我清楚记得莫时中只讲了一句话：“你们来，不要把寨子搅乱就行了！”

莫虚光又带我们到江边一带稻田看种的罌粟。我第一次见到罌粟花开得这样美，红、黄、白的花朵夹杂着小石榴似的果实，撒满沿河大片稻田，人们正开始用刀片割取果浆熬炼鸦片。

莫虚光曾是三江民变武装之一莫部的司令员，家住良口街，各村群众为一睹莫司令的风采，时常挤满莫府。烟农也将鸦片烟拿到他家交纳。有三次莫虚光叫我去一同验收签字。记得有一次交的一砣用纸包成四方形，约 3 公斤左右象牛屎一样黑黝黝的烟土。

收鸦片烟税的具体标准、要求等，我什么也不知道，鸦片烟也放在莫虚光家。

在良口工作约一个月，5 月 10 日，忽接县人民政府紧急通知，要我立即赶回古宜（没有要我通知莫虚光和其他同志）。当天我步行回县报到，才知三江土匪已全面暴乱。

这次征收鸦片烟税的工作也就不了了之。

2003 年 7 月 7 日于龙城

解放初在三江工作的回忆

成瑞竹

三江县委第一任收发员

1950年3月，办完两期干训班后，县委宣布我任县委收发员。这是中共三江县委的第一任收发员，工作主要是接收、传送秘密文件和党内刊物，发给正区级干部阅读。当时，是原柳北游击队员荣瑞华（党员）担任县委首届秘书。他为人忠厚斯文，工作细致耐心，对同志和蔼热情，他教我如何保管好党内文件和做好保密工作。当时我还不是党员，而党内很多秘密文件都经我的手分送给县委领导，有时领导正在谈党内重要工作，也不回避，还叫我坐下来一起听。我自感这是党对我的信任，感到这项工作责任重大，决心不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都要为党做好保密工作，及时做好上传下达。我坚持做到当天收到的文件和宣传资料，当天分送出去，不积压，促使工作顺利开展。各区委领导干部集中到县开会，总是先到我办公室——即我的住房来看文件或要宣传资料。来往中，大家都是热情相待，平等相处，领导干部没有官架子。同志们对我的称呼，年纪比我大的，叫我“成妹”或“湖南妹”，年纪比我小的，都喊我“成姐”或“成大姐”，领导干部则叫我名字“瑞竹”或“成瑞竹”。这些称呼，我感到很亲切。我的收发工作一直做到1951年3月。当时地委宣传部分给三江两县两名到广西省党校宣干班学习的干部名额。县委指派我和罗家阔两人去学习半年。当时柳州地区十一个县，只有五个学习人员指标，其中三江两名，融安一名，柳城一名，象州一名，由此可知上级党委对三江两县干部培养工作的重视。此后，我在柳州地区从事宣传工作长达四十多年。总的来说，在三江县工作时间不长，三江县是我可爱的第二故乡。在三江工作整整五年，在党的领导下，在当地干部帮助下，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成效的，有意义的。一切记忆犹新，有的人说“收发是收收发发没有出息”，我亲身体会收发工作很重要，应有一套科学管理才能做好。

举办干部培训班 培养区乡干部

1949年12月中旬，我们柳州干校第一批学员共19人分配到三江工作，跟随南下领导干部柳林、何俊、张瀛、姜肇初等到达丹洲。12月18日就在丹洲宣布成立三江县人民政府。那时干部很少，不但从北方南下的干部很少，就是柳北游击队留下的干部也不多。为适应建设区乡政权的需要，必须迅速培养地方民族干部，充当区乡骨干。故新政府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办干部训练班培养骨干。县委决定由组织部长李仁为办班的负责人，指定北方干部朱光君、郝国胜、杜琴为正副指导员，我负责组织学习，并在丹洲、古宜张贴招收学员的布告。第一期学员于12月27日开始报到，1950年元旦开学。第一期学员有80人左右，除了三江本地人，还有邻省、邻县的也来报到，如贵州省的伍翠兰、龙胜县的

韦国胜，融安县的罗刚等。

训练班的宗旨，是端正学员入伍动机，消除思想顾虑，放下家庭包袱，初步进行革命人生观的教育，树立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训练班地点在丹洲原国民党时期的破烂县政府内。无固定教师，采取听大报告，各人联系思想实际分组讨论的学习方式进行。除李仁同志做端正入伍动机的报告外，还有县委书记柳林同志作形势报告，县长何俊同志作有关民族政策、培养选拔干部的政治报告，等等。每期培训 20 多天，学习结束，学员即分配到工作岗位。

学员的来源，大部分是由区政府推荐来的，有小学教师，有回乡青年，还有一些稍为有点文化的青年农民。其中有极少数学员曾被迫参加过国民党时期土匪，为一般匪众。这些曾经参匪的人员，有的是为逃避婚姻，有的则是受亲戚、朋友、同学的影响随大流去为匪的。经过学习，他们都自觉交待了参匪的经过，写了悔过自新书。我们根据情况逐个排队，按照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对那些经过阶级教育、革命教育，很快转变立场，主动彻底交待了问题，表现好的人，都留在革命队伍里量才录用。我们在丹洲先后办了两期这样的干部培训班，共培养了一百多名学员，为全县输送了一批地方民族干部，后有许多同志成为县、区政府的主要骨干。如荣光明、吴昌言，廖增山、颜亨贤、侯邦庭等都是第一期干训班的学员。

2003 年 5 月 26 日

白云突围脱险

王善昌

1950 年 5 月，我在三江田寨区（苗族聚居区，1952 年划归大苗山即现在的融水苗族自治县）工作，区府设在白云街上一座两层木板楼。区辖四个乡，即白云、大浪、大湾、平卯。当时我担任大湾乡长，刘锐担任大浪乡长，白云乡长是本地人（在我印象中有个叫罗子存的同志，不知是否是他）。当时，与大湾乡毗邻的平卯乡，为该乡匪首廖国卿纠集的约二百人枪匪众所盘踞。土匪在那里进行反革命活动，并不时窜扰大湾乡的东芝、黄奈等边界村屯。为了及时掌握匪情，做到耳目灵通，在县公安局长姜肇初等领导同志的指导下，于大湾设立了情报站，为后来的剿匪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5 月中旬，全县土匪暴乱，当时除田寨区外，已全被土匪占据。县人民政府根据上级指示迁往丹洲。在此动荡不安的关键时刻，大浪乡相继发生三件事。一件事是下到大浪工作的徐举和另一名姓冯的（桂林地区人），在大浪塘向土匪交出一枝七九步枪。第二件事是大浪乡长刘锐（与我和谢景夷是同乡，系县委书记柳林介绍我们在河南省开封市经考试录取参加工作，随军南下来到三江）因贪生怕死，做了可耻的逃兵。第三件事是大浪乡恶霸地主、反动分子罗×福（依稀记得）组织武装暴乱，于 5 月下旬围攻田寨区政府。

第三个事件的发生是这样的：一天晚饭后，在区政府主持工作的区委朱光君同志（县委书记柳林爱人）召集当时留在区里的十多名同志（除朱光君同志和我是北方人，其余都是本地刚参加工作的少数民族同志）在区政府二楼厅堂开会。会议主要内容，一是通报全县土匪暴乱情况；二是明确指出大浪乡阶级敌人已有蠢蠢欲动迹象，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武装暴乱，千万要提高警惕。事情真凑巧，就在这时，大浪乡粮食仓库主任吴子宏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气喘嘘嘘地急忙跑上楼来报告：“土匪来了！快跑！”朱光君同志对突如其来的情况还想问个明白，但吴子宏同志急得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吴一手拉着朱光君同志到临街的栏杆边往外一指，果然见到街上乱哄哄的手执粉枪、大刀、长矛的有一二百人逼近区政府来了。在无法组织有效抗击的情况下，朱光君同志当机立断一声令下：“撤！”于是我们十多名同志立即冲下楼底，从后门撤出，直奔背后梯田、山坡路，才幸免于难。

我们刚撤出，土匪随即拥进区政府，发现人走楼空，这帮穷凶极恶的乌合之众，不甘扑空，于是气势汹汹，嗷嗷叫的从后追来。这时我和朱光君同志掉队在后尾，因为她怀有身孕急走慢跑极为不便，只有我紧跟在后，保护她的安全，边阻击边后撤。这时敌人可能认出我们两人是“北方佬”，因为唯独我们两人与众不同，那是刚到地方不久，还是身穿黄绿色军装，腰扎皮带，打着绑腿，头带军帽的装束，并且各自佩带手枪。朱光君同志佩带“勃郎宁”，我佩带驳壳手枪，另有一支六五马枪，还有一颗手榴弹。凶残的土匪尾追在我们身后，狂呼乱叫：“捉活的！活捉得一个‘北方佬’奖赏 500 块大洋！”朱光君同志是经历过战火考验的老战士，在面对土匪尾追迫近，情况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她虽然气喘嘘嘘，却临危不惧。她神色镇定地对我下令：“卧倒！”我们便利用脚下的田坎、路基等有利地形掩护，两人同时使用手枪阻击敌人。土匪不敢追我们了，她又叫我用六五步枪向土匪集中隐蔽的坡地、田头，砰！砰！啪！啪！的猛烈射击一阵子，顿时有效地把敌人刚才那种嚣张气焰压下去，匪徒们一个个象乌龟一样缩头缩脑地躲在田埂地头不敢露头了。

我们稍松口气，自知寡不敌众，撤为上策。我们爬起来又急走慢跑往后撤，可是这帮忘命之徒仗恃人多势众，不甘罢休，又一次死追不放。虽然不敢再逼近我们，但在保持一定距离下，我快敌快，我慢敌慢，我停敌停，我走敌追，想要甩掉尾巴，势必很难。这时，朱光君同志见天色渐黑了，她神色凝重地对我说：“看来土匪是绝对不会放过我们的，我也实在走不动了。”她命令我把六五马枪和手榴弹留给她，说要在后面掩护我快跑回去报信。她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把活下去的希望让给我，我为她这样一种舍己为人，舍死忘生的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感动得泪如泉涌。我毫不犹豫地说：“真的要死也要死在一起，要活只能一起活下去。”我想到了严重的后果，我要是回去报信，留下她一个女同志，肯定是凶多吉少，甚至必死无疑。这叫我怎么向县领导，向柳政委（当时称书记为政委）交待呀！我死不从命。朱光君同志沉毅地说，难道活下去一个回去报信不好，要一起死嘛？在她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激励下，当时由于我年轻（18 岁）气盛，又是一名青年团员，对党可说

忠贞不二，对敌斗争有一股蛮劲，我气昂昂地向土匪大声叫喊：“孬种的土匪听好，我们就是‘北方佬’，谁不怕的就上来领奖赏 1000 块大洋吧！”这下子土匪听到了北方口音，又掀起一阵子嗷嗷叫，口出狂言：活捉北方佬呀！我们面对狂呼乱叫，并不害怕，使我们担心的是天色越来越黑了。土匪之所以既不敢近又死不放我们，就是妄想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时再偷偷摸上来。这时朱光君同志和我都横下一条心，万万不能被活捉，在万不得已情况下，就抱紧土匪不放，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

天色越来越黑，我们也越撤越远。这时，我们发现脚下的羊肠小道，两旁都是石砌的较高的坎，根据一般情况判断，在这段路上，不大有可能突然遭遇敌人从左右两侧夹击，我们的注意力可以集中于防后。这样狭长的羊肠小道，对尾追的敌人来说，尽管他们人数很多，但地形对他们很不利，而我们却可以集中火力射击，把敌人置于死地。这时山野一片漆黑，逐渐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朱光君同志叫我将白衬衣脱下来，罩在上衣的外面，要我在前面走，让她借助我背影微茫，蹑手蹑脚地跟着走。我们心急如火，步履维艰地不知摸黑走了多少时间，终于来到了大德村，熟悉地叫开了老住户的家门——即荣部参谋邓鲁之爱人的家。主人对半夜三更到来的不速之客感到诧异，待我们说明原委，连声为我们庆幸。

稍事休息，并受到主人热情款待宵夜后，我们婉言谢绝主人留宿，继续赶夜路。这是因为考虑到，若在白天通过经常有土匪出没的“滴水岩”（地名）这一带，比不上黑夜通过安全。我们就这样马不停蹄、通宵达旦地赶路，终于在次日上午七八点时安全回到县委会（设在李凤琴家）。组织部长李仁一见到我们，连声说：“安全回来就好了。”这时我们才知道县领导昨晚已接到情报说大浪土匪暴乱，田寨区政府告急。在家的主要领导政委柳林，县长何俊，公安局长姜肇初，县大队长夏永海等人，已带领县大队战士速奔大浪、白云镇压土匪暴乱。后来听说组织武装暴乱的罪魁祸首是大浪乡恶霸地主罗×福，已在剿匪中被镇压了。这是我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所写的亲历的史实。

2003 年 8 月 24 日

往事悠悠 烈士千古

刘森廷

1949 年 11 月 18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解放三江，12 月 18 日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1950 年 5 月，土匪暴乱。由于地处湘黔桂交界处，邻县黎平有杨标、石竹修，本县有潘懋、伍英等乌合之众，土匪活动极为猖獗。5 月 14 日，奉上级命令，县人民政府撤下丹洲，环洲深挖战壕固守。当时我在丹洲地方干部训练班学习，我家就在对岸的板江街，虽想过河探亲，但怕受害。县人民政府将干部集中丹洲的目的，一是为了保存干部力量，以利于日后使用和开展工作；二是担心土匪通过干部亲属策反意志不坚者退缩回家或为匪。因此，

除留下一部分坚持工作外，其余分两批乘机动船送去柳州学习培训，提高素质。6月28日，由长安启航，当晚留宿融水。次日，由副县长伍延秀带队的第一批，当天安全抵达柳州。

随后的第二批85名地部分乘利安、东兴、天泰三艘机动船，并各拖两条装满稻谷的大驳船，因故于6月29日留宿柳城县大埔。当时，得知大埔下游有股匪聚集，我们不敢贸然下柳。1950年7月4日，经柳城县委朱书记同意，指派一个连队武装沿途护送。当船行至大埔头塘的悬崖峭壁，河床狭窄，流水平缓，欲快不能的石壁坳河段时，突然被早已埋伏在有利地势，居高临下的河床两岸的国民党残军死硬派和地方股匪伏击。当时虽有县大队一个排的武装分乘于三条船，并在船棚顶上奋勇反击，也只能且战且行，力争脱险，减少伤亡。

现就我所乘坐的处在最后面的天泰号机动船的伤亡情况简述如下：

一是曾秉益同志（高基人）坐在我的右对面，不幸被一梭机枪子弹击中半身，只听他喊了一声，就壮烈牺牲。

二是悬挂在曾秉益同志铺位上的一束手榴弹，被土匪枪弹击中，幸好在旁的同志快速地把那束手榴弹抛下河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三是湖南东安县人，年仅17岁的胡继尧同志正坐在我的上面一层铺位。在此之前我曾邀胡下来与我排坐，胡说下面床位机器弹动得厉害又不凉快，不愿下来，谁知被一枪击中头部，也不幸牺牲。

四是融水县大顺村的骆启泰同志坐在我前方的上层铺位上，一枪弹击中木板，碎弹片迸入骆的腹腔，至今尚未取出。

五是紧靠在我左侧的融水县大德村的韦昌琴（注：三江文史资料第六辑35页将“琴”误为“庭”）同志，听见枪响时，好奇地伸头出窗外察看，竟被一枪弹擦伤脸部流血。韦将头缩回，问我穿不穿，我替他擦拭后说不穿。

六是与排坐的融水县白云村的曾俊同志，当听见我的脚前被枪击中木板的响声和看到飞扬灰尘时，当即对我大叫“来了”，我慌忙挪动身子并缩脚，其实枪弹已过后，我才挪动。当时我和大部分乘船的同志仅用发下来未经浸泡湿水的两斤半棉被挡避枪弹。在我的右前、上、正方和相临的部位都有伤亡的同志，幸运的是枪弹未击中我所在的部位，方才幸免于难。

当船行至凤山，停船在河中歇息清理伤员时，我走出船舱伸手摸伤员背部（当时身穿发的大蓬白衬衣），满手都沾着血，我还很幼稚地伸手探入其衬衣里面，看是否背上有洞，这真是无知笑话了。这时土匪竟猖狂沿路追至凤山，我们立即决定砍断锚索开船，黄昏时才到达柳州。

当时，在柳州经清点，这次遭匪伏击壮烈牺牲的干部有4人，他们是：曾秉益、郑淑琴（女，原名郑月芝，丹洲人，是我同学）、杨光雄（高秀村人，年仅17岁）、胡继尧。县

大队有 3 人牺牲，他们是，班长卢有先（寨准村人），战士王荣、曹业修（古皂村人），总共牺牲 7 人。牺牲的同志全部安葬于现在的柳州军分区和地区公安处一带的土坡上。遭致枪伤的干部有：骆启泰、卢兰芳（寨准村人）、韦昌琴、何杰（寨准村人）、梁运通、戴明杰（永福县百寿人）、梁振环（周牙村人）、曹骏章（西游村人）、曹俊杰（斗江人）、卢有才（寨准村人）。经多方了解，现仍有 3 名负伤的县大队战士不知姓名，共计 13 人。

往事悠悠，烈士千古。深情缅怀革命烈士，将更强有力地鼓舞着、激励着千千万万的后来人，高举光荣的五星红旗，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前进，再前进！

富禄重点剿匪侧记

赖守基

富禄地处湘黔桂交界处，镇上住着约 500 户人家，主要从事商业、小手工和饮食服务等行业。过去，这里曾是土匪盘踞作乱的地方。1949 年 11 月 18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三十九军一一五师解放三江。是年十二月，溶江区人民政府成立。

当时，在湘黔桂边界，还流窜着少数国民党残兵败将和企图复辟的官僚、土豪、散匪等社会渣滓，他们纠合在一起，组成土匪武装，在边界地区骚扰作乱。为了地方的安宁，当地进步人士组织成立了“富禄乡治安委员会”，主任赖智基，副主任赖广基，总务温富勋，委员赖光太、赖兴基、梁梅森、李芳林、赖焕春、郑权德、孔昭宣等。治安委员会成立后，积极开展活动，分头下到各村、屯筹集军公粮，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重点剿匪，与民兵一道，持枪昼夜巡逻，保卫地方安宁。

1950 年 6 月初，以贵州黎平县土匪杨标为总指挥的“湘黔桂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派副总指挥兼第二纵队司令石竹修，第三纵队司令陈志鸿，带领匪众 400 多人窜至富禄。当时，富禄股匪龚裕斌，高安股匪王松林，平卯股匪廖国卿，从江县大年匪首伍文涛，融县匪首沈志扬等人纠合在一起，组成第九纵队，司令伍文涛，也活动于从江、三江、融县边境一带。土匪盘踞富禄后，四处打家劫舍，横征暴敛，无恶不作。地痞杨响、谢启珍也趁机出动，与盘踞土匪互相勾结，敲诈勒索，开设赌场、烟馆，镇内一片乌烟瘴气。

为了随时掌握盘踞土匪的活动情况，以利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重剿，富禄乡治安委员会经请示县人民政府同意，安排温富勋，以教职员身份，在富禄为人民政府作情报联络员。当时情报接头负责人是赖智基和郑怀德（县大队干部），通过富禄、长安的商人朱国先、伍传远，船民梁甫响，将情报安全送抵丹洲（当时为三江县人民政府临时驻地）。

1950 年 11 月 7 日，赖智基（是年 11 月任溶江区人民政府代区长）随同解放军铁道部队一个营，到富禄抢运枕木。当时盘踞富禄的石竹修股匪不敢交战，逃离富禄，铁道部队走后又卷土重来。赖智基派吴光耀通知温富勋，到陈道荣家二楼汇报匪情近况，同时告知，中国人民解放军很快就要进剿富禄股匪，并交给新任务，要求密切注视匪情变化，扩大情

报网，加强联络，搞好内应。

1950年12月初，解放军一八六师五五七团从贵州榕江出发，乘船由溶江顺流而下，于是年12月7日下午三点钟左右，到达富禄河边。到富禄后，一部分继续乘船往富禄下游开，一部分则停泊在高塘河岸，对富禄形成包围，石竹修一伙匪贼顿成瓮中之鳖。解放军所乘船只的船头全部用麻袋遮蔽着，化装成货船。其时，游荡在街上的匪兵，看见从上游开下来那么多货船，顿时欣喜若狂。地痞杨响在大街上狂叫：“弟兄们，想要烟酒钱的，跟我下河边收船头税去！”瞬间二三十个匪兵，一窝蜂地跟着跑下河边。走在前面的匪兵往高塘河岸走去，走在后面的匪兵，则对着正往下游开去的木船，高声喊道：“把船靠拢岸来，收船头税！”但是，船上毫无反应，土匪哪里知道，船上装的全部是解放军战士。匪兵站在河岸边，眼看几十艘木船一艘也不靠岸，便乱哄哄地在那里瞎骂一阵，掉头一齐拥上高塘河岸。走在前面的匪兵刚到船头，就开口喊道：“收船头税！”话音未落，从船仓冲出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对准匪兵命令道：“举手投降，缴枪不杀！”匪兵被吓得发抖，万想不到，解放军来得这么神速，一个个乖乖地束手就擒。走在后面的匪兵刚跨过小溪，见事不妙，慌忙转身，没命地往“弄省坡”（山名）方向逃跑，潜入深山密林之中。

此时，匪首石竹修正在设宴招待从贵州雷山县逃窜到富禄来的原国民党副县长赵某。石在酒席上得意忘形地向客人吹嘘，说其防御工事坚固，哨所林立，戒备森严。而且，上至贵州从江，下至洋溪，沿河几十里，都有杨总指挥（匪首杨标）的屯兵，他们坐镇富禄可以高枕无忧。酒席中还陪伴着匪首石竹修新近在贵州榕江县强娶为妾的一位19岁姑娘，几人沉浸在花天酒地之中。众匪兵则大部分混在赌场、烟馆和酒店里。解放军犹如神兵天降，瞬间枪声四起，猛烈的冲锋枪、机枪、手榴弹、六〇炮响声，震动山川。土匪措手不及，顿时土崩瓦解，匪兵们慌乱地四处潜逃，有的逃入深山密林，有的躲进街边阴沟角落，有的窜入民众家中，有的在解放军“缴枪不杀”的命令下缴械投降，少数顽抗的匪兵与解放军在镇内发生巷战，结果被解放军一个个击毙或俘虏。解放军接着攻进匪首石竹修指挥部，除匪首石竹修及其副官田仰山外，其余顽匪全部被俘。

在镇内搞情报联络的温富勋和民兵赖和松，在枪声稀落，战斗接近尾声时，即去寻找解放军首长。他俩从小溪边油榨房返回的路上，在外吉街口郑权德屋坎码头下面，遇上几名解放军。解放军见有来人即发出命令：“什么人？站住！”俩人回答：“我们是富禄的治安民兵。”解放军战士上前继续盘查：“你们是干什么的？”温富勋回答说：“我是富禄治安委员、富禄小学校长，名叫温富勋，有情况要向你们团长报告。”当时，杨克勤团长和几位解放军干部，就站在周围，杨团长得到该战士的报告，听说温的姓名，即上前仔细观察后说：“好！你来得正好，我们正派人去找你。”于是，杨团长便叫二人一同进镇内。在赖家太的屋楼下，温富勋将搜集掌握的匪指挥部内情，匪首石竹修和溃匪潜逃的山路方向，匪部在后龙山设置的暗堡等情况，一一向杨团长作了汇报。杨团长急召连以上干部，作了追

歼部署，同时叫赖和松作向导，带小分队抄山路包抄追歼溃匪。事后才知道，解放军进剿富禄残匪之前，五五七团曾派侦察员化装进入富禄侦察敌情，观察地形，并了解到温富勋在镇内搞情报联络。

解放军部队在高塘弃船登岸，打出进攻信号弹，发起攻势时，曾向匪部阵地轰了三炮（落在后龙山），并迅猛突破匪徒在富禄外围设置的第一道防线，接着全歼哨所之敌，打开了进入富禄的通道。匪首石竹修在指挥部亲自掌握一挺机枪，指挥众匪负隅顽抗。后来感到解放军来得突然，攻势凶猛，难以抵挡，指挥部很快被攻破，自己有被俘的危险，于是便随带副官田仰山逃跑了。潜逃途中，石匪臂部中弹流血不止，行动不便，于傍晚时分，在富禄后龙山油茶林中，被解放军小分队活捉。潜逃入山林里的其余溃匪，凭借山峰林立，小道弯曲，森林茂密的有利地形，企图逃脱。解放军小分队勇猛顽强，紧追不舍，一直追至贵州交界的岑胖、大旁山腰，溃匪精疲力竭，无奈缴械投降。从贵州雷山县逃窜来富禄的原国民党副县长赵某，被石竹修丢下后，也跟着向外潜逃，但在指挥部旁边即被解放军击毙。有一小部分没有逃离的残匪，则在镇内四处躲藏。为了不让一个残匪逃脱，解放军在镇内所有地方，包括街头巷尾、柴棚茅厕、夹缝草堆、阴沟角落，进行全面搜捕，凡发现形迹可疑的人员，全部关在“联发商店”的栈房内，并通知温富勋前去协助辨认，逐个进行盘问，是老百姓的当场释放，企图蒙混逃脱的残匪，一个也跑不掉，全部成为俘虏。

夜幕降临，战斗胜利结束，解放军小分队从各处押着俘虏凯旋而归。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共歼匪二百余人，缴获枪枝弹药若干。对富禄剿匪卓有贡献的温富勋、赖和松等人，应邀参加了晚宴，受到部队首长的盛情款待及表扬。

（据温富勋口述整理）

解放初期光辉民兵参剿点滴

杨振光

1951年农历3月18日（公历4月23日），解放军征剿三江土匪。赵立信连奉命驻扎光辉，连长赵立信任光辉乡人民政府主席。不久，赵立信连调走，由谷显风连进驻，连长谷显风继任乡人民政府主席。

当时，盘踞在三江为霸作恶一年的伍英、石世佑、潘懋等股匪已被歼灭。为彻底清除匪患，连部将全连兵力分到石眼、黄排、引木、文大、文村、大光、小光、马湾、桐木、寨更等十个村去组织发动群众，成立农会，并在农会领导下建立民兵、儿童团等组织，配合解放军搞好清剿工作。乡农会主席曹廷仁，副主席侯家武。农会成员杨通林任民兵队长，马福祥任儿童团长。在民兵中又抽出比较精干的侯顺才、侯邦清、曹廷光、荣逢六等12位青年组成民兵基干队，由侯顺才担任队长。基干民兵与普通民兵的区别是，普通民兵拿粉枪，基干民兵用七九步枪。民兵的主要任务是参加清剿。

1、继续搜查漏网隐藏的土匪。县里在清查中发现，尚有匪县长潘志强、马坪龚裕斌等匪首尚未落网。光辉从基干民兵中抽侯邦清参加县里由杨廷瑞带领的清剿队。

2、广泛宣传剿匪政策。笔者当时负责管理全乡自新人员档案与清匪情况上报工作。在清匪中发现，尚有文大村文段屯侯永昌仍在网外，按剿匪政策规定，侯永昌的匪职当处死罪。由于民兵以标语、广播、黑板报、墙报等方式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等清剿政策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又兼大军重剿、全民参剿的压力，侯永昌经过深思，觉得这样下去是“活罪难逃”，按政策办也许还“死罪可免”。侯永昌当时与匪首潘懋一同逃隐在罗海大山，有立大功的好机会。于是侯永昌以拆洗枪支为引，将潘懋活捉，押送光辉乡人民政府交与驻军。将潘懋交政府与部队后，部队、政府给侯永昌以完全的自由，他的行动不受半点限制。当晚，侯永昌不在政府部队食堂进餐，而是独自到光辉村其姑父荣焕铭家吃饭。在吃饭中，侯永昌从口袋拿出八块银毫（俗称东毫）放到桌面说，阿姑，按为匪的职务来说，我该处一死，趁现在未死之前交待一下，我不知哪天死，如果我死了你就拿这八块钱买板埋我。但政府和驻军除了开饭时派人叫其进餐外，其他时间出入自由。过了三天，连队派三名战士到荣焕铭家叫侯永昌，说连部叫你去。侯去了一下即转回姑父家说，我以为喊我去做什么，原来是喊我去连部领五百块大洋作为捉潘懋的奖金。我说不要，能留我一条命就行了。果然实现了“死罪可免”。

溶江区举办土匪自新学习班追忆

梅品彰

1950年初，湘黔桂边区土匪暴动，妄图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各地股匪集结于三江，气焰十分嚣张。县政府被迫作暂时转移，由古宜撤下丹洲。1951年4月15日，柳北剿匪的最后一战“三江合围”打响，仅经三个小时的战斗，这群乌合之众便不堪一击，四处逃命。溶江区是我县西北与贵州接壤的地区，情况复杂，散匪或躲进深山密林，或潜入山寨，或化装流窜，惶惶不可终日。为了彻底肃清散匪，清缴匪枪，转变参匪人员思想，溶江区于6月举办一期土匪自新学习班，约一百多人。

学习班地址在富禄镇民强街下面朱绍先（富禄商人）已经停用的油榨房内。学习班由区公安特派员莫明同志全面负责。当时，我在区中队任文书，被抽去协助报名登记、整理材料及后勤事务。区中队轮派全副武装的战士守门，实行全封闭式的管理。学习内容是形势教育和讲解剿匪政策，号召参匪人员与匪首划清界线，放下包袱坦白交待，悔过自新，立功赎罪。通过学习，参匪人员普遍提高认识，纷纷诉说自己受匪首欺压和受苦的身世，消除了顾虑，积极坦白和检举，使我们掌握了不少材料。记得有一姓罗的参匪人员，出身贫寒，无田无地，父亲早逝，专靠放排度日，因局势动乱，交通阻塞，无排可放，为了谋生不得已参匪，想弄些钱供养重病老母。参匪数月间奔波于各地，仅能自己糊口。有一次

随匪首进入西山（贵州地界），众匪强抢群众鸡鸭及棉被衣物，自己也违心地抢了一床棉被，想带回家给老母保暖，谁知突遭解放军袭击，慌乱中个个抢先逃命，抢来的财物洒遍山岗，棉被遍地，鸡鸣狗叫好不狼狈，跑回家中时，老母已撒手西去。我们觉得这一典型很有代表性，就让他在学习班上发言。他边讲边哭，说到伤心处更是放声大哭。其实，绝大多数参匪人员都是贫苦农民，他这一哭诉，引起匪众同感，满油榨里哭声一片。学习班地处高处，下为福兴街，哭声传出，上下可闻，不少群众误以为是共产党对土匪搞刑逼口供。第二天我到姑姑家（赖光太的母亲），姑姑对我说：“阿光（我的奶名），做事要积德行善，不要强人所难。”我知道是误解我们了，便向她解释：“共产党光明正大，决不做缺德的事，这是诉苦。”而在当时，“诉苦”是怎么回事，她不理解，直到学习班结束约十天，参加学习班的土匪释放回家，个个眉开眼笑，一身轻松，并亲口叙述诉苦经过，误解的群众这才恍然大悟，叹道：“共产党真是有办法，硬是叫你心服口服。”

这期学习班进一步甄别了被迫参匪，坦白悔改的人员，每人发给一张盖有区政府红印的“自新证”，让他们回家安心生产。后根据学习班掌握的线索，区中队在郑立保队长和莫明的率领下，开赴梅林，收缴了不少枪支弹药，并兑现了“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为彻底肃清散匪，收缴匪枪，安定民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匪首石世佑的穷途末路

周 瓮

走马上任杀人如麻

石世佑（1915—1951），临桂县宛田乡瓮沅村人，汉族，桂山中学及黄埔军校第八期毕业，1933年加入中国国民党，曾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副师长。北平和平解放后，于1949年6月逃到广西义宁，得到国民党义宁县县长李世中及其弟李建华收留。

1949年7月，石世佑走马上任国民党义宁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后，对我游击区展开了疯狂的进攻，实行大清乡、大扫荡，大批关押和杀害游击队员及无辜群众。其中受害最深的游击村是茅山、西南、大塘口、林嘉寨、中江等村。在此期间，石世佑先后杀害了游击队员12人，无辜群众30多人。

石世佑倾尽全力先后与游击队多次较量，例如在都留、玉岑、塘底凉亭、宛田东长岭、樟村等战役，他都以失败而告终。特别是在塘底凉亭一战，石世佑一败涂地，险些被俘。

拒绝投降反动到底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进入广西，11月20日解放了义宁，22日解放了桂林。国民党桂北军政区司令周祖晃投降我人民解放军。但是李世中与石世佑拒不投

降，他们秘密潜回义宁，继续与人民为敌。义宁县人民政府曾派民主人士苏永彰与之谈判，劝其放下屠刀，但石世佑一再拒绝，坚持反动到底。

1949年12月，石世佑自称国民党37师师长。1950年1月4日晚，石世佑率匪众百余人，乘新政权刚建立之际，袭击我宛田区人民政府，被我县武装大队一分队，区政府八位干部，以及附近民兵予以迎头痛击，打死两名土匪，并击溃土匪的进攻，石世佑逃之夭夭。时隔七天，即1950年1月11日，石世佑又纠集匪徒百余人夜袭我保宁区人民政府，被我区政府干部与征粮工作队来个内外夹攻。土匪以为我方援兵来救，赶快逃跑。1950年元月末，桂林军分区独立团、县武装大队、区中队、宛田区人民政府干部共同配合，对盘踞在樟村匪巢的石世佑实行清剿，并获大胜，抓获土匪数十人，缴获机枪一挺。石世佑偕其子带领所余匪众逃入黄沙、大罗等地。时值除夕，抢食充饥，十分狼狈。然后取道拉旦出斗江，又一路为害人民。

盘踞三江扩充匪部

1950年春节后，石世佑逃到三江县，由部下李长年、李文庆介绍，化名左公迈混入杨俊部作文书，其人枪编为特务中队，后被发觉图谋不轨，于是又跑到湖南绥宁县双江，勾结邓维海为匪。邓被扣留后，石世佑又纠集唐浪萍、石荣山在青茱洲成立“湘桂边区反共游击司令部”，石世佑任司令，唐浪萍、石荣山为副司令，占据了绥宁、通道、靖州三县。1950年5月1日，又占据三江。石世佑自以为得志，在三江县改番号为“湘桂边区反共救国突击队”，石世佑自任军司令，把各路土匪武装分为15个支队，扩充为18个纵队。总的活动范围：包括广西义宁、龙胜、三江、临桂、百寿、恭城、融县、罗城，贵州黎平，湖南绥宁、城步、通道，对外则联系港澳台湾，设置电台，派遣特务去香港、澳门、台湾联系。石世佑盘踞三江一年多的时间，进行反革命活动，到处造谣惑众，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同时石匪在三江，还不时派遣匪徒窜回义宁、临桂县境，多次杀害我军政人员、农会干部、无辜群众达数十人。

四面楚歌死路一条

1950年10月，湖南绥宁、通道、靖州三县之匪被我人民解放军全面围剿，石世佑所辖之第四、第八、第十一、第十二纵队，全部被打垮。自11月起，石匪内部起了矛盾，突击队改由伍英和龚裕斌控制，不到两月内江又起，大权重由石世佑执掌。

1951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146师、147师441团、广西柳州军分区、湖南会同军分区等部队和民兵，对三江境内的石匪匪部实施分割合围。4月13日起，以风卷残云之势奔袭合围踞于三江县城古宜及西游、大洲一带的伍英、石世佑匪部。匪众四散奔逃，有的被打死，有的藏于江边石缝中。4月15日，经三个多小时的战斗，土匪完全被打垮。解放

军接着进行搜山追捕，活捉了匪首石世佑。这家伙身着女式大襟铜扣破棉衣，装聋作哑，问话不答，但终被解放军战士认出。

这次合剿取得了彻底胜利，其中击毙第二纵队司令龙章密，第三纵队副司令唐浪萍，第二参谋长龚裕斌以下 119 人。生俘突击军司令石世佑，参谋长雷法非、第一纵队司令周瑞，第八纵队司令李国英，第四纵队司令梁汉三，副司令李青，第十一纵队司令李之中，第十八纵队司令龙云，第九纵队司令唐达，第十纵队司令王强，政工处主任韦世聪以下 654 人，投降 35 人。缴获各种炮 3 门，机枪 2 挺，长短枪 113 支，子弹 3000 发，战马 5 匹，收音机两部，电话机一部，文件一部（此载 1951 年 5 月 8 日《广西日报》）。

石世佑罪大恶极，民愤极大，1951 年 7 月 24 日广西省公安厅批准判处石世佑死刑，9 月 4 日被绑赴旧义宁县城执行枪决。

我所知道的土匪杨标的一些情况

陈进文

见《三江文史资料》第一辑 57 页杨大彬所写的《招抚杨标始末记》一文，我反复读了几次，觉写得很好。但认为有些地方与事实有所出入，现将我所知道的情况叙述如下。

一、杨标在黔东南七个县发动种烟的事实。

为什么在日本侵略，国家危亡时期种大烟呢？原因是土匪杨标想乘机霸占西南，割据一方。事有凑巧，因为三江县溶江区区长周文敦搞明团暗匪、杀人、搜刮民财而被撤职查办，逃去黎平同关参加杨标活动。杨标得周文敦投靠，如鱼得水，高兴得很。杨标和周文敦早晚在烟床密商种烟和烟的销路问题，后由周文敦负责到丹洲找广西省参议陈志鸿和其父陈绍虞二人，介绍到桂林两江找李宗仁第五老弟人称五老爷的李炳先。五老爷先到梅林周文敦家，再由周文敦带去黎平同关与杨标接洽。商定收得的烟土，不论多少，概送到两江给五老爷，五老爷拿枪弹兑换。枪弹转运到梅林周文敦处再密送同关。为使转运顺利，杨标派周文敦、周文钊兄弟二人，在柳州沙街，开设一个佑生行庄口，专门招待行商和代行商转运货物，以此掩盖他们偷运大烟和枪弹的活动。

二、杨标被贵州省保安团打伤，逃躲至富禄医治，不是省保安团被杨标驱逐而苦无应付。

国民党独山张专员兼保安司令，为了杨标在国难时期发动种大烟的事亲到黎平视察，督促铲烟禁种。当晚杨标带二三十名匪徒进黎平县府，抓住张专员，打了张专员两记耳光，并把张专员礼帽摘下来戴在杨标自己的头上，炫耀一时，但终不敢杀张专员。事后，自觉不妥，便向张专员俯伏请罪，还派人送张专员回独山。

黎平县周围石城坚固得很，又有保警队防守，杨标何以轻易进城，一直钻到张专员寝室去呢？原因是黎平保警队兵由各乡抽调来，大部分是杨标亲友。另外，杨标早已安排亲

信陆鸿儒混在保警队当分队长，全分队兵有百分之九十是杨标的人，是他们偷开城门放杨标进城的。

贵州省保安司令部接到张专员报告，立即指派保安处处长刘鹤鸣兼任黎平、黔东南铲烟剿匪指挥，并调保安一个团（团长陈精亮）听命于刘。陈精亮团有三个大队，留一个大队守营房，带来两个大队，第一大队长沙盈璜，第二大队长梅子龙，共六个中队，七八百人枪，到黎平配合黎平县保警队，铲烟和围剿杨标。

保安团和黎平保警队，不独围剿杨标和铲烟，连人民的财物也都铲光。当时流行在黎平人民嘴上的一句话是：“兵梳，匪篦，保警队如剃刀剃。”

1943年秋末，在平天山遭遇战中，梅子龙大队长亲提捷克式机枪上前，从侧面扫射，打中杨标，匪方顿时乱了阵脚，向干团方向逃跑，追击未获。次日从富禄获悉情报，才知杨标负伤逃躲至该地医疗，并投诚三江方面，准备抗日，于是免于追捕。保安团铲烟剿匪任务完成，即开回贵阳。

三、杨标负伤逃躲至富禄医疗，富禄乡长谭敏是周文敦血表，他们是一丘之貉，包庇杨标，帮杨标去请上级批准投诚，予以自新，抗日立功赎罪，不是招抚。

四、当时杨标仅有五六十人，并没有什么五百、八百人，成立抗日联队后，陆续招来人枪才约有五六百人，时三江属的平卯，拱洞、梅林、高安、富禄，岑旁各处都有人参加。队伍开赴黄金、龙岸、融县一带抗日。当时板江、桐木、合水、板榄一带，是威南部队罗正芬司令带王松龄、石雄山、梅林罗成连等负责抗日，但都是乌合之众，见日本鬼子，不敢打一枪，没命逃跑，五六百人后来只剩百多人。

五、日本投降后，柳州方面欲把杨标人枪改编，杨标看情况不妥，便带周文瀚、钟英、李登奎等几个人挟捷克式机枪二挺，驳壳手枪十多枝，逃回三江，躲缩在板江，不敢回黎平。而陈志鸿家是广西省参议的府第，于是就成了杨标的防空洞。久躲不能解决问题，考虑到杨标是贵州人，于是，由陈志鸿以广西省参议的身份代到独山专员公署请求批准杨标投诚，予以自新之路。独山专员王以仁带杨标回黎平，向黎平县府承认错误，请予谅解，解决了杨标的问题。

当时我在黎平县当保警中队长，在县金库主任甘显仕办公室，王专员介绍杨标与我认识。事后，王专员回独山，杨标下柳州跟周文敦搞点木头生意，等待时机。

六、1949年全国解放，黎平、从江两县枪枝无人掌握，恐流为匪患。陈佩琼奉党委派抓从江县枪枝。杨标回到黎平，挂起“中共黎平县人民自卫总队部”招牌，火速通知全县各区、乡公所，所有人枪逐一造册呈报，进城点编。黎平县原有保警队七八百枝步枪，捷克式机枪十二挺，高射机枪三挺，连同区乡人枪约二千余枝。杨标以为自己掌有雄厚的人枪，可以造反，于是把“中共黎平县人民自卫总队部”招牌摘下，挂起“国民革命军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的牌子，策划积极反共。

而此时，陈佩琼抓从江县保警队和区乡公所人枪，不过四五百而已。由于陈不肯反共，杨标便派人到从江将陈佩琼打死。陈佩琼的妻子肖怀玉，也被他们一伙豺狼野兽惨无人道地轮奸而死。

1951年，由于杨标反共反人民，猖狂顽固，我驻湘、黔、桂边区人民解放军开进黎平围剿。杨标一伙不堪一击，全部灭亡，只剩下杨标只身逃到三江县属大湾乡乡境（今属融水县），被民兵擒获，押解到黎平县城西门正法。

另外，我补充写一点。杨标兄弟三人，大哥杨国参，三弟杨国武，杨标排行第二，人都称为二哥，原居黎平佳所，他的祖坟，都葬在这里，已被国民党保安团挖掉几座祖墓。

杨标小时去同关给杨再朝、龙耀三两匪首当勤务兵和养马。在这个土匪学习班学习，长大后拿枪做匪，劫抢民财，有丰富的经验。杨、龙二首匪死后，连人带枪归他掌握，几十年土匪生涯，杀害几多好人，几多好人为他累死。

解放初期斗江区征交公粮工作回忆

覃安民

1951年剿匪时，我任桐叶村武装基干民兵队长。剿匪胜利结束后，便是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春耕生产运动。时任桐叶村农会副主席的覃继斌同志到县民族干训班学习，结业后分配到县减租押退工作队，我便接任他的职务并兼武装基干民兵队长。7月，高基乡长曾芝美同志通知我和覃继诗（白郡人）、覃彩英（桐叶人）、覃显义（河村人）到县民族干训班学习，结业后我们四人被分配到高基乡工作。副乡长郭坤同志（时曾芝美已调任梅林乡乡长）召集我们开会分配工作任务，主要是抓好征粮和当前生产，并宣布征粮工作主要由我负责，同时配发给我一支七九步枪和30发子弹。

为了搞好征粮工作，经郭坤副乡长同意，我用一天的时间在乡政府召开了各村农会主席会议。会上，我结合抗美援朝的形势向大家讲清了征粮的目的、意义和政策要求以及工作方法。并提出把4万斤公粮任务按田亩分解到各村，要求在15天内完成任务。经讨论，与会人员均同意，并表态一定按时完成任务。为了明确职责，更好地完成任务，会后，我们搞征粮工作的同志经过研究，决定实行分片包干。我负责丘冲和弓江两个边远村寨。此后，我便背起简单行囊深入到瑶村壮寨。我的第一站便是瑶村平见屯，第一晚我住进了赵明高家。赵家待人热情，见我到来，杀了一只大公鸡，还炒了瑶山腊肉，配上当地土特产冬笋、香菇等，加上自家酿制的红薯酒，象过年过节一样接待我，叫我难忘。饭后，我顾不了路途疲乏，立即召集村民开会，向大家宣传抗美援朝的形势，要求大家要搞好生产，积极踊跃交爱国粮，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会议结束时已近半夜，村民们住得分散，散会后都各自点起竹篾火把回家。第二天检查，发现他们都已把要交的公粮准备好了，粮食晒得干，且风得干干净净。

七天后，负责征粮工作的同志回到乡政府召开碰头会。大家都认为，广大群众交公粮的积极性很高，交粮准备工作都已做好，只等上级政府通知交粮。随后，我参加了区政府召开的征粮工作会议，汇报了高基乡征粮工作情况。我提到，高基乡征粮工作之所以做得好，一是领导重视，分工有专人负责；二是思想发动充分，各村都召开各种会议宣传征粮的目的、意义和政策，做到家喻户晓；三是把公粮任务落实到户并公榜于众；四是各村都成立检查组，有检查员深入农户检查公粮是否做到一干二净三饱满。我的汇报受到了区财粮助理曹积杰同志的高度赞扬，梁同泽区长也表扬了我们的做法，并在会议总结时作为经验推广。

区征粮工作会议结束后，我被调到九区（斗江）政府。

到九区（斗江），区财粮助理曹积杰同志安排我负责检查征粮工作进度。曹积杰向我和荣光明同志（负责做好粮仓检查清理和接收公粮入库的各项准备）通报了全区征粮进度情况，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要求。

明确了工作任务，我便到福安乡会同梁庆荣同志到广牛、凤凰、沙宜等地。检查中发现，这几个村征粮工作进度缓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马上召开农会干部会议，做好思想发动工作，把公粮任务按田亩分解到户。此做法群众比较满意，纷纷准备交粮。接着覃安鼎同志从扶平、白言等地传来消息说，有些群众反映当地公粮任务分配不够合理。为此，我和梁运民同志（农会干部）便到这些村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不厌其烦地讲明征粮的意义和政策，指出按田亩分配公粮任务基本是公平合理的。通过我们进一步做工作，扶平等村的群众怨言少了，交公粮的积极性提高了。

扶平村的问题解决后，我紧接着又到和平乡板坡村。当晚我召开农会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覃瑞生、章扬明、覃荣生、覃美生等十多人。会上，农会干部汇报说，分配的一万斤公粮已落实到户，群众基本接受，没有意见，交粮热情很高，都已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交粮。听完汇报后，我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肯定。接着大家对送粮的做法也作了研究。农会干部说，今年是解放后第一年交公粮，又是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中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意义重大，送交公粮要大张旗鼓，要声势浩大，振奋人心，要充分体现出农民爱国之心。我认为这样很好。会议对送粮队伍作了安排：首先是红旗排前头，其次是舞狮队，第三是吹锁呐，敲锣鼓，放铁炮、鞭炮，最后是送粮队伍。送粮队伍每对箩筐谷子上要插红、蓝、黄小三角旗，旗上写“送好爱国粮，打倒美国佬”，“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标语。第二天我到村上走，看见各家各户都在做准备工作，心里很高兴。

从板坡回到和平乡，我向曹琇乡长作了汇报。他很赞同，并表示要将板坡的做法带到和平、六溪、板六三个村去。我建议，送粮时，板坡第一天送，和平、六溪、板六三个村接着第二天送，这样就会影响全区，对完成全区公粮任务会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我回到区政府又向梁同泽区长和曹积杰同志作了汇报。他们听后都很满意，认为板坡

的做法值得推广。接着研究各乡村具体送粮入库时间。

1951年10月下旬，板坡村第一批送公粮。送粮当天很热闹，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铁炮、鞭炮声不断，除了送粮队，还有舞狮队、腰鼓队、秧歌队、山歌队，共400多人，浩浩荡荡，十分壮观，途经白言、扶平、牙林等村，每到一村，当地的村民们都自发地聚集到路边迎送送粮队伍，非常热闹。送粮队伍到达斗江粮库时，区长和区直机关干部以及斗江寨的群众都出来迎接，为送粮群众送水递烟。万斤公粮就这样顺利入了库。第二天便是和平、六溪、板六送粮。由于是三个村一起送，送粮队伍超过1000人，所以这天送粮队伍更壮观，锣鼓声、鞭炮声、山歌声不绝于耳，100多华里的送粮路热闹非凡，令人振奋。由于这几个村送粮造成了声势，打响了第一炮，后来各村都依样进行。最后，在征粮工作评比中，和平、板坡、六溪等村被评为全区公粮入库先进单位，得到红旗和物资奖励。三江县人民政府通报表扬了九区（斗江）征送公粮的做法。

2002年7月4日于柳州

回忆周春鸣同志

杨通山

周春鸣同志是三江县解放后的第二任县长，1951年6月来到三江。当时重点剿匪刚结束，转入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支援抗美援朝，组织群众大搞生产等等。工作任务多，条件比较差，县领导和其他干部一样，经常穿草鞋下乡，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1952年又搞民族区域自治，加强政权建设，让少数民族当家作主。民族区域自治刚结束，县里还未召开庆祝大会，周县长就调走了。他在三江工作一年多，我和他接触也少，然而就是那么一两次，他的高尚品格和高大形象，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那是1952年初夏，广西省民族工作队组织若干小组到各地区去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我们柳州小组的同志到三江时，周县长亲自接见，具体安排我们下乡。当时我们组有莫汝勤、覃永琛、梁新庭等10人，又分为两个小组，一个小组到四区和六区，一个小组到七区和八区，每区工作时间半个月，重点检查投资粮的发放情况。当然，其他工作也要顺便调查了解。工作安排完后，周县长说，你们离家蛮久了，如果哪个有实际问题需要回家的请提出来。我们没有一个人要请假，都按时下乡。通过这件事，县长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没有架子，平易近人，体贴干部，对于我们这些刚从“革大”毕业的年轻人来说，真是学习的榜样。

我们下乡一个月，和群众实行“三同”。深入田间地头，了解到许多真实的第一手材料。我们回县时，因县长不在家，便向其他负责同志汇报。我们如实地讲了，既讲成绩，也讲存在问题，且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是一般情况，不算得什么。然而，我们回到柳州专署汇报时，领导同志却问得很详细，广西日报的记者也在场。第二天记者又来找我们商量，打算

以广西日报柳州记者站和省民族工作队柳州小组的名义写一两篇报导，我们给他提供了所需要的材料，稿子由他去执笔。回到南宁不几天，真的看到广西日报登出来了，一篇是表扬三江发放投资粮搞得好的，另一篇是批评三江某些地方侵犯中农利益的。当时有人赞扬我们，我们也感到高兴，认为下去也能看出一些问题，却不懂得将会带来什么别的影响。

6月，省里召开民族工作会议，贯彻政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省民族工作队组长以上人员参加。当我去南宁饭店报到时，首先遇见三江县委文教科的秦振武科长，他拉我到他的房间问我：

“广西日报上的那两篇文章是你写的吗？”

“不是，是记者写的，不过我们商量过。”

“你们真的不够慎重，不考虑到这会让县里多为难。周县长在全县干部大会上作了检讨……。”

我听他这么一说，心里感到很难受。怎么办呢？二人商量之后认为：好在周县长也来开会，我们去向他当面解释，表示歉意，就说我们年轻人头脑简单不懂事，请他原谅。

我们走进周县长住的房间，刚坐下，我还来不及开口，周县长就滔滔不绝地说，你就是那个小杨，你们的文章我看过了，写得好呀，你们如实反映情况，该批评的批评，该表扬的表扬。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就怕有些人发现问题不敢说，或者是报喜不报忧，那种自由主义对革命事业不利。你们把存在问题写在报纸上，我就拿报纸在干部大会上讲，要求大家认真对照检查，发扬成绩，克服缺点错误，工作就会前进一步，这有什么不好，这就是鞭策帮助，我就喜欢敢于负责，敢讲真话的干部……。

周县长在讲，我和秦科长在听，二人不时又互相对笑。我心里明白，我们原来的估计错了，本来是想向县长道歉的，反而受到县长的表扬，顿时，一股暖流流遍全身。这时才发现，我们的认识水平和思想境界还远远赶不上眼前这位高大的南下干部哟，因而，从心底感到敬佩。

最后周县长说：“过去政府送你们去学习，目的是培养提高民族干部，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现在你们毕业了，应该到民族地区去工作。听说你们省民族工作队要去百色地区搞区域自治，我们三江也要实行区域自治呀，家乡需要你们，我也欢迎你们，回去吧，怎么样？”我没有太多的想法，当场表态愿回三江。也许由于县长的提议，省民委很快帮我们办理了调动手续。

当我们一行七人回到古宜时，周县长一见面就说，真的回来了，欢迎，欢迎！我现在宣布一件事，给你们放假七天，各人回家看看，一周后回来参加全县干部大会，宣布分配名单。”周县长很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又很关心干部的生活，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长者。

从那时起，我们先后参加区域自治工作队、普选工作队、土改工作队，走遍山乡。后来又相继在区乡人民政府，在县直机关单位，一直工作几十年，再也没有离开过三江。虽

然三江条件较差，生活较苦，但我们无怨无悔，人各有志，能为家乡工作一辈子也是一种乐事。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曾经在三江战斗过、工作过、生活过的外地同志，比如尊敬的周县长等领导，他们都对三江作出过很大的贡献。

2003年9月18日于古宜

三江侗族自治县成立前后

杨通山

民族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只要世界上有民族存在，就会有民族问题。如何处理民族问题，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政策。在旧中国，不论那一代统治者都是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所推行的都是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民族掠夺的政策，制造许多民族矛盾和民族纠纷，甚至民族战争，给人民群众造成极大的灾难。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真正实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共同繁荣的正确政策。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第六章“民族政策”第五十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人民友好合作的大家庭”。该章第五十一条还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

可以看出，党和国家非常重视民族问题，并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大国，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民族政策是符合国情的，是非常正确的，因而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如今，全国已成立5个自治区，31个自治州和86个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成立于1952年，在全国侗族自治县中是最早的一个。作为当年三江县区域自治工作队的一名队员，半个多世纪后再来回忆并记述当时的情况，真的感到幸运和欣慰。

三江县位于湘黔桂三省交界处，历史上一直是个著名的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的县份，少数民族在政治上一直被歧视。国民党统治时期实行保甲制度，在民族地区，除了甲长是当地人外，村长、乡长基本上都是国民党政府派来的外地人，本县劳动人民不但根本无法参政，而且还要受反动政府的政治压迫。1949年4月，以莫虚光、荣成礼、欧文光为首的民变武装举行暴动，摧毁了国民党的乡村政权，赶走县长。不久，国民党地方势力又卷土重来，占据县城，而乡村政权却处于瘫痪状态。

1949年1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贵州的洪州进军三江的独峒、八江、古宜，解放了三江县。在部队首长的主持下，成立了县治安委员会及各乡镇治安委员会，临时负责维持社会治安和筹粮支前等工作。1949年12月18日，三江县人民政府成立，并委派各区、

乡人民政府的区长、乡长，但此时村级政权尚未健全。1950年4月，以石世佑、伍英为首的土匪武装暴乱，县人民政府从古宜撤下丹洲，全县绝大部分地区成了匪占区，土匪建立了县、区、乡三级匪政权，并勒索百姓，杀害农会干部，为非作歹。直到1951年5月重剿结束时，才把纠集在三江境内的约五千名土匪全部肃清，重新建立区、乡、村三级人民政府，群众称之为“第二次解放”。

1951年夏，党中央派出访问团到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慰问。8月，以费孝通为副团长的中央民族访问团莅临三江，并带来一个文工队和一个电影队，多次在体育场表演歌舞和放电影。电影中有一部国庆一周年庆祝活动的纪录片，当在影片中看到侗族代表莫虚光向毛主席献礼（礼物为一张虎皮）的镜头时，观众们边指边喊。因为他们是第一次看电影，第一次看到侗人也上了电影，怎不令人高兴呢。访问团在三江期间，多次召开大会、小会、座谈会，传达中央的指示，讲解《共同纲领》，宣传民族政策，当讲到三江也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时，大家拍手叫好。访问团送给三江县一面锦旗，上面绣有毛主席的题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锦旗挂在县人民政府最显眼的地方，让同志们经常看到毛主席的号召，以激励大家做好民族工作。访问团还到县中与师生们举行联欢。通过访问团的活动，充分体现了民族间平等友好、团结和睦的精神，给三江的干部群众上了一次生动的民族政策的教育课。

1952年2月22日，政务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草案）》发到省、县，并要求各地通过试点，总结经验，逐步铺开。县委宣传部部长雷剑亲自带领几十名机关干部到第四区的和里、良帽等乡进行区域自治的试点工作，还派3位同志到大瑶山参加省级试点工作，学习外地经验。6月，在南宁召开广西省民族工作会议，学习贯彻《实施纲要》，布置全省的区域自治工作。三江出席会议的周春鸣县长和秦振武科长回来向县委传达汇报后，县委立即指定专人着手各项准备工作，写出县里的区域自治工作方案，主要内容是撤大乡划小乡，组织工作队分期分批进行。方案制定后，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征求意见，协商通过。

8月，报纸公布了《实施纲要》全文，还有如下命令：

中央人民政府命令

兹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公布施行，此令。

主席 毛泽东 1952年8月8日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的社论。这对于三江无疑是极大的鼓舞，同时也使全体干部更加明确了区域自治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县委研究决定，立即组织“三江县区域自治工作队”，从县区两级抽出机关干部和一批农干共有250多人，集中县城学习、训练、编队。县委成立“区域自治工作指挥部”，由县委副书记何俊任主任，组织部长张瀛和宣传部长雷剑分别任副主任，指挥部和工作队一起，转战农村第

一线。指挥部内有办公室主任 1 人，调研员 3 人，还有宣传、文印、会计、警卫、炊事等多人，由雷、张两位部长坐镇指挥。指挥部下设三个中队，十八个小队，共 250 人（到开展第五批工作时，小队调整为 19 个，人员调整为 212 人）。十天的学习内容除了《共同纲领》、《实施纲要》外，主要是学习县里的“工作方案”和试点工作经验“一个乡的具体做法”以及“宣传提纲”，还将有关内容编成侗歌发给工作队，入村后同群众一起演唱。学习结束的当天，两百多名工作队员，个个配带徽章，背上行李，浩浩荡荡奔赴农村，和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第一批铺开的是第四区（后改为良口区），共有十八个小乡，每乡一个小队，我们第十八小队分配在同乐乡。当时，指挥部也驻在同乐。

工作队入村后的做法大体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忆苦思甜，搞新旧对比，整顿组织，发展农会会员。在此基础上，召开乡农民代表会议，选举乡农会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建立、健全农会、民兵、青年、妇女等组织，发动群众掀起生产热潮。整个过程自始至终结合进行民族政策和革命艰巨性、长期性的教育，让农民懂得翻身解放仅仅是开始，要过好日子必须选好带头人，才能真正做到当家作主。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召开乡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乡长、副乡长和政府委员。在工作中强调，选举时要掌握一个原则，即乡长必须是由本乡主体民族的人担任，副乡长和委员必须照顾其他民族和村寨、界别，以利于团结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最后召开庆祝大会，举行干部就职仪式。当时，根据基层工作情况的需要，每个乡设有 4 个半脱产干部，即乡长、农会主席、文书、民兵营长。这些干部每月由财政发给生活补贴。

每个乡的工作大约半个月时间，乡级工作完成后，则召开区人民代表会议，选举区长、副区长和政府委员，当时区级也称“人民政府”，后来改称“区公所”，再后来就撤区并乡了。

第一批工作结束后，全体工作队员集中于良口总结工作，评比表彰。然后开展第二批，在五区（时为勇伟，现为洋溪）和六区（富禄）铺开，我们第十八小队分在裕民乡，前后约经 20 天。第二批工作结束后，又开展第三批，工作队转到七区（现在的八江、独峒）。我们十八小队在平流乡。指挥部也移驻平流。第四、第五批是八区（林溪）。全县区、乡一级的区域自治工作从 1952 年 8 月上旬开始，至当年 11 月下旬胜利结束。每当工作队离村时，经常出现群众集队唱歌送到寨外，依依惜别的动人场面。通过区域自治工作，不仅密切了干群关系，而且促进了生产，增强了民族团结。如当时七区的孟寨乡，有两个大寨子，一寨是苗族，一寨是侗族，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两寨群众很少往来。两寨中间相距十多米的小河，夏天涨水不能过，冬天下雪卷衣裤涉水过，就是不肯共建木桥。别寨的人对此议论纷纷。在区域自治工作队的教育帮助下，终于建成一座木桥，命名为“民族团结桥”。从此侗苗同胞交往频繁，亲如兄弟，形成一种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

区域自治工作开展后，将近四个月的时间，共完成五个区 94 个乡的工作，选出正副乡

长、农会正副主席、民兵营长、妇女主任、文书等小乡干部 570 人（其中半脱产乡干 376 人，不脱产乡干 194 人。按民族分为：侗族 427 人，苗族 121 人，瑶族 13 人，壮族 6 人，汉族 3 人），选出乡人民政府委员 693 人（其中侗族 548 人，苗族 127 人，壮族 7 人，瑶族 7 人，汉族 6 人），又选出正副区长 11 人（其中侗族 9 人，苗族 2 人）。乡长、区长都是由本乡、本区主体民族的干部来担任。在民族区域自治工作中，还培养出了一大批少数民族积极分子，其中有 90 多人被吸收为国家干部。

在此应该说明两点：一是当时的一、二、九区（古宜、丹洲、斗江）为汉族聚居区，不派区域自治工作队去，其区长由上级任命。乡级政权机构的整顿和选举工作，由本区人民政府负责结合减租退押工作一并完成。二是当年已将苗族聚居的老三区（白云、大浪）划归大苗山，次年才从七区划出一半成立新三区（独峒、平流），所以这里没有三区的情况。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于 1952 年 11 月 28 日，召开三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有 321 人。代表们经过充分酝酿和民主协商，选出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 31 人，其中侗族 9 人，苗族 3 人，瑶族 2 人，壮族 2 人，汉族 15 人。秦振武（侗族）当选为县长，韦昌孚（壮族）和曹蔓山（汉族）当选为副县长。12 月 3 日，在体育场召开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会上宣布三江侗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同时举行政府委员和县长宣誓就职仪式。庆祝大会召开时，县城各路口都扎起松门，机关、学校、街道和公共场所处处张灯结彩，红旗飘扬。来自区、乡及县城附近村寨的各族群众，穿着节日的盛装，放鞭炮，吹芦笙，唱六甲歌，敲锣打鼓，舞龙舞狮，从四面八方涌向会场。会后又进行芦笙踩堂、唱桂戏、对唱山歌等文娱活动，活动通宵达旦，热闹非常。

中央人民政府发来贺电，广西省委和省府的领导以及柳州地委和行署领导亲临指导，龙胜各族自治县、大苗山苗族自治县（今融水苗族自治县）、大瑶山瑶族自治区（金秀）和融安等兄弟县都派代表莅会祝贺。

1955 年 9 月 17 日，根据宪法规定，县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将三江侗族自治区更名为三江侗族自治县，并决定每年的 12 月 3 日作为自治县成立纪念日，到期总有一定规模的纪念活动。

1953 年 10 月 1 日，结合普选工作，成立同乐苗族自治区，1959 年该区改为同乐公社，《民族区域自治法》公布后，1984 年更名为同乐苗族乡。同年，又成立富禄苗族乡和高基瑶族乡。如今，自治县下属有三个民族乡。

三江侗族自治县成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三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民族干部成长很快。1951 年，少数民族干部仅占全县总干部数的 21.2%，1961 年，民族干部占全县总干部数的 34.8%，1985 年，少数民族干部已占全县总干部数的 64.39%，到 2005 年，这个比例更是上升到 85.37%，县乡两级主要领导多为民族干部所担任。如今，少数民族群众政治上当家作主，全县社会团结稳定，交通方面大改变，火车过侗乡，

乡乡村通公路。经济方面大发展，1952年的财政收入为137.9万元，2002年的财政总收入为4588万元，五十年增长32倍，2005年财政总收入达到6080万元。文化教育方面更有显著的进步，1952年全县只有一所中学，在校学生204人，如今已有20所中学（其中两所普通高中，一所职业高中），在校高中生2500多人，初中生16000多人。1952年以前三江全县只有8名大学生，都是解放前到外地求学的，解放后，每年都有人考取大学，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每年录取高等院校的都有几十人。2000年以后，每年录取几百人，最多的是2005年，共录取531人。从1952年至2005年，全县录取高等院校的学生为3383人（不包括成人大学生）。如今，已有侗、苗、瑶等少数民族的研究生、留学生、博士、教授以及各种专业技术人才，这真是一个极大的飞跃。过去贫穷落后的三江，现在已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往后的三江，一定能够跟随祖国前进的步伐，走向更加繁荣幸福的明天。

民族区域自治工作回忆

杨文朴

1952年4月下旬，我从广州南方大学学习毕业回县，恰逢县里开展民族区域自治工作，并在良口区搞试点。我被派去参加试点工作。当时，县工委指挥机关设在南寨乡杨家商店“义合成”楼上。工委副主任雷剑部长坐镇具体指导，工作安排很细致，从入村宣传政策，发动群众，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培养骨干，到开好两个大会，成立政府，都作了具体安排。我分在三小队，任副队长，杨玉萱同志任队长，全队有十多位同志。三小队负责和里乡，到乡后，队长住和里屯，我住欧阳屯，其他同志都分下各户。经过一系列工作，最后选出了农会主席和乡长。指挥部决定，南寨、和里两个乡共同在杉木坪召开庆祝大会。和里乡选出杨日谋为乡长，南寨乡选出杨有树为乡长。大会宣布两乡乡级民族区域自治政权成立。和里乡试点工作结束后，三小队奉命进驻良帽乡，队长住良帽，我住寨盘的吴富荣家。这时又新来一名队员杨昌铎同志。试点结束，工作队全部集中于县城，总结试点工作，部署全县铺开。当时全县共抽调二百多名干部，集中训练。根据点上经验，进一步作出具体部署和安排，分期分批进行，要求每个乡在15至20天内完成，年底全县结束。工作队分成3个中队19个小队，按照计划开赴全县各乡村，开展声势浩大的民族政策宣传活动。我们三小队调整为8位同志，分到同乐的高岷乡。我住在培良秀屯，队长住在高岷屯，中队长秦振武同志也住培良秀屯，和我们一起深入到群众中去走贫访苦，扎根串连，培养骨干，工作很活跃，很有起色。高岷的工作结束后，我们又转战富禄，在富禄又完成了仁里和寨明两个乡的工作。仁里是个苗族乡，工作队在那里经过15天的工作，认真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苗族同胞对党的认识和感情进一步加深了。工作队离村时，群众送糯米和红蛋给工作队，农会主席滚日盛、乡长滚老王带领群众将工作队送到大年河边。寨明乡的群众还唱歌将工作队送上船。工作队离开富禄后，又先后转到八江布代乡和林溪的弄团乡。在布

代，培养出了苗族骨干，选出龙兆贵同志为八江区副区长。在弄团，培养出了一批妇女干部，如杨培凡、杨炳姣等。在民族区域自治工作中，第三小队共完成了7个乡的建政任务。全县区乡政权建设任务完成后，工作队集中总结工作，表彰先进，筹备成立自治县。1952年11月下旬，召开全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秦振武同志为自治县县长，12月3日召开庆祝大会，宣告解放后三江第一次建立起以侗族为主体的自治政府，各族人民终于以主人翁的地位身份选出本民族的代表人物，参与国家大事，管理本民族事务。自治县的成立标志着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真正实现了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共同繁荣，民族区域自治的意义重大而深远。

我们小队的15位同志，他们是：杨玉萱、杨昌铎、曹德彰、韦国胜、谢维斌、杨开德、吴廷秀、潘玉英、曹绍新、胡万忠、张秀芳、吴家耀、杨正英、梁家义、杨文朴（面上工作铺开调整后调整为8人）。当时，这些同志基本上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人，正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都有一腔拥护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的革命热情。他们服从组织，遵守纪律，深入群众，艰苦工作，宣传、执行民族政策，同群众一道，以主人翁的精神来建设自己的新政权，组织新生活，活跃在三江农村，共享共和国的春天。50多年后的今天，这些同志均已年届古稀，有的已离开了人世。如我们的小队长杨玉萱同志就已经离开了我们。杨玉萱同志是丹洲人，她为人庄重诚实，工作负责，踏实认真，深入实际，作风民主，平易近人，是个好队长、好同志、好大姐。自从民族区域自治工作结束以后，不管在团县委，在县妇联，还是在县委组织部，她的工作都体现出了她的优秀品质和美德。这些同志的革命业绩将永载史册。

2003年5月

独峒武装匪徒团伙的覆灭

颜 谷

独峒是地处湘黔桂三省交界的少数民族边远山区。解放前，这里交通闭塞，人民贫困，以种大烟为主，赌博成风，社会治安混乱，系土匪滋生出没之地，是三江出名的“杨梅毒”（即程阳、梅林、独峒的贬称）之一。民国初年，八江至独峒“三把叉”山顶上，就树有石碑，告诫行人商贾过此山要结伴同行，当心土匪抢劫。

解放后，虽经剿匪、清匪反霸、民族区域自治、普选、土改等一系列民主改革运动，但由于时间短，工作量大，对残存的反革命分子、刑事犯罪分子的清查打击不够彻底，致使一些残匪漏网。他们仍隐藏有枪支，并流窜于三省交界地，抢劫案件时有发生。特别是1955年春开展粮食“三定”（即按各户所拥有的田亩来核定其产量，核定收购数量和定给销售粮数量）时，由于宣传不够深入，加上独峒又属严重缺粮地区，春节过后，群众存粮所剩无几，一时粮食紧张，以致产生抵触情绪，认为政府“早不抓米袋口，粮食吃完了才来

抓口袋底”。残余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乘机造谣，煽动群众反对政府的粮食“三定”政策。他们到处串连，互相勾结，大肆进行抢劫、抢粮，甚至发展到有组织地抢夺乡民兵、干部枪支，攻打供销社，杀害我武装干部和社干，还扬言要抢银行，攻打区公所，气焰十分嚣张。

1955年春，匪首杨神福、李维昌亲自策划，并提供枪支，由独峒岫团匪首带领10余名匪徒攻打贵州黎平县六区化名供销社，杀害我武装干部及供销社干部各一人，抢去驳壳枪1支，步枪2支，现金1600万元（当时的新币）及布匹等物资一批。接着，他们又策划抢劫乡干部枪支，由孟寨匪首杨老庆、谢老二为首，共十余匪徒，夜袭平流乡，抢走民兵队长吴秋成、贫协主席杨华成两支步枪，并将二人押下八协带路抢枪。土匪冲进转业军人覃香隆家，在门背将枪夺走，发现枪内没子弹，逼覃交出子弹，并要覃带去乡政府夺乡长的枪。覃香隆急中生智，下楼梯时，从衣袋内拿出子弹往牛栏内一丢，趁匪徒去抢子弹时，覃挣脱往村外的乡政府跑，与乡长梁钱文汇合，紧闭楼门。土匪随即将乡政府包围，喊叫缴枪，并欲纵火烧供销社（乡政府设在供销社楼上）。家在对河的治保主任吴堂燕发现情况，就伏在菜园内向匪徒开枪，击毙匪徒一名。这时转移到守昌的胡安隆副区长在鼓楼击鼓召集群众捉匪，土匪慌忙逃跑。当晚，平流、八协干部民兵赶到岫团报信（笔者当时负责岫团、平流、八协、唐朝这一片的工作）。我即组织武装民兵扼守各个路口和保护粮食，并向区里汇报。区里的公安、武装干部带领岫团、平流、八协等村汇合起来的民兵立即赶往八协，在八协村后抓获匪徒一名，其余匪徒窜往林略方向。

时值大雪封山，电话线也因结冰坠断，交通、通讯断绝。区里即将各乡武装民兵分片联合防匪，区干部也集中区政府，随时准备出击匪徒。

鉴于独峒匪势猖獗，县里及时组织公安局、法院、武装部等单位领导班子成立剿匪领导小组，并从地、县公安队调来两个班及公安、武装干部10余人，又调动本县转业军人30余人，组成共有60余人的剿匪队伍开赴独峒。县里还秘密派遣当地干部杨再超以请假回乡为名，暗中争取参匪的老表杨永保过来，从而获悉了以杨神福、李维昌、莫转成为首的二十余匪徒的名单及作案的经过。杨永保后被继续留在匪内作内线，通过内线充分掌握土匪的动向。在掌握匪情的基础上，与贵州黎平县公安局共同商议，统一部署，分工负责，于5月11日拂晓进行全面搜捕。当天即抓获杨神福、李维昌、莫转成等匪徒13名，投降4人，缴获步枪6支，左轮、八驳手枪2支，手榴弹4枚，赃物一批。

漏网土匪谢老二等7名匪徒携枪逃往贵州黎平八区一带，杨老庆等数名匪徒则逃往与贵州交界的干冲一带。经过一个多月的追捕，击毙杨老庆，其余匪徒均被逮捕归案。

至此，独峒区剿匪基本结束。经广西人民法院批准，于1955年8月22日在独峒召开公判大会，将杨神福、李维昌、莫转成执行枪决。

注：《三江文史资料》第四辑60页所刊杨开禄《侦破李维昌反革命纠合案》一文，对

此案的定性是不准确的。该案不能称为“反革命纠合案”，上级法院已予否定，只能称武装匪徒团伙（查自三江法院 1955 年莫转成案卷）。

2003 年 11 月 1 日于龙城

独峒区农业合作化工作回忆

覃安民

1956 年秋天，中共三江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定。会后，独峒区委、区人民政府组织工作队，深入农村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我当时在该区任区委书记。具体分工是，我到八协，副书记兰衍标到岜团，区长杨开禄到干冲。入村后，大张旗鼓地宣传毛主席指示和中央决定，宣传我区农业合作化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讲明办农业合作社的具体做法和有关政策。经过动员，在两个月内，全区报名入社有七千多户，占总户数的 99.8%，形成一寨一社、一村一社、一乡两社、两乡一社的局面。

1957 年春节过后，正当农业社准备组织群众投入春耕生产的关键时刻，却有部分富裕农民要求退社。当时，闹退社在全县各区都不同程度出现，最突出的是独峒、良口、富禄、八江、同乐、林溪等区。特别是我们独峒区，闹退社达 1000 多户。全区最突出的村又数独峒、牙寨、盘贵、林略、玉马、干冲和高旁（1961 年划归同乐）。有的农民把耕牛、农具拿回去，有的上山砍杉木拉到家里存放，有的公开到田埂上号自己的田地，插上写有“此田是我的，不准农业社种”的牌子，还有的公开阻拦、殴打、辱骂前去解决问题的工作人员。如独峒农业社韦××等就曾组织代表到县人民政府找吴县长申请退社。1957 年春，独峒区委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副县长兼区委第一书记杨雄秀（1957 年春下放，1957 年秋回县）、书记覃安民、副书记兰衍标、区长杨秀伦、县工作组长王忠富（县统战部长）、副组长李汉林（商业局长）、副组长杨培志（县妇联主任）等人。大家学习了毛主席指示和中央决定，专门就退社问题讨论研究，分析原因，制订对策。大家分析认为，闹退社的主要原因有：

1、思想发动工作不够充分，农业合作社的思想基础不牢固。从上到下都存在过快、过急的错误，仅两个月时间宣传发动，在一两个晚上报名入社，所以思想基础不牢固。独峒地区属于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上比较贫穷，群众思想落后，大多数农户未经过互助组、初级社，再过渡到高级农业社的过程。而凡是经过逐步过渡的八协、守昌、里盘、岜团、具河等农业社，基本没有人闹退社。

2、工作方法上个别领导人有失误，带来严重的影响。如副县长兼独峒区第一书记杨雄秀同志，下独峒、牙寨、盘贵等农业社工作时，有人申请退社，杨雄秀同志简单回答说，你们要退社是可以的，但要交公积金。杨以为群众拿不出钱退社，就会卡住。谁知农民到处找钱退社，没有钱的就出卖金银首饰、布匹、好衣服。结果在独峒、牙寨两社就有 50%

的农民要退社。此事对全区影响很大，以致闹退社的人越来越多，受到县委通报批评。

3、确有部分富裕农民不肯入社，也有少数坏人煽动闹退社，暗中搞破坏。如牙寨杨××闹退社，工作组和社干去动员教育也不听，说就是要退社，还到田里号上自己的名字，插上牌子，不准社员耕种。又如林略社杨××和杨××在闹退社中，上山砍杉木拿回家存放，并把耕牛拉回去，还放火烧山。高旁社有一户富裕农民吴奶××（寡妇）更是闹得凶。当兰衍标和社干上门去做动员教育工作时，竟把衣裙脱光，并用污秽的语言对干部进行侮辱。

4、在生产上存在单一观点，缺乏全面安排。独峒区田地少，劳力多，过去有大批劳动力到过县内各地和贵州、湖南一带搞生意或帮工度日。而入社后集中劳力搞农业，没有安排人去搞多种经营，社里没有经济收入。如玉马乡的玉马社 100 多户中，有 65 户会打铁，常年靠外出打铁谋生，入社后集中搞农业，不安排外出，收入减少，所以闹退社。

针对上述情况，采取了如下对策：

（一）大力宣传毛主席指示和中央决定，打消干部群众的顾虑，坚定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二）认真总结宣传本地农业社的先进典型，大讲八协、守昌、里朝、岂团农业社的优越性，说明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是对的。

（三）根据山区特点，因地制宜，合理安排，既抓农业生产，又组织现金收入，实现全面发展，增产增收。

（四）加强劳动管理和财务管理，全面实行长计划和短安排，推行劳动定额和按件包工或是定产包工超产奖励办法，充分调动广大社员劳动积极性。同时搞好财务管理，做到日清月结，兑现年终分配。

（五）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继续宣传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说明在剿匪、区域自治、土改中，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不法地主。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仍然要坚持这条阶级路线不动摇。并明确指出，在合作化高潮中，是经过宣传发动、自愿报名、社委批准、张榜公布的，不是强迫入社。但是，闹退社的人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还是要用教育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决不能简单从事，用阶级斗争的办法去解决问题。

在具体贯彻落实时，主要抓了如下几项工作：

（一）集中召开全区闹退社的户主大会，下乡工作组全部参加，在圩场开会时有 1000 多人。会上，由县工作组副组长、县商业局长李汉林作动员报告。由区委书记覃安民作形势工作报告。会议开了一天，但很成功。参加会议的社员普遍反映看清了形势，领会了政策，分清了是非，提高了觉悟，坚定了信心。一些人还检讨了错误，并表示退回拿走的农资、木头等。在这场运动中，各级干部始终采用教育的方法，取得了较好效果，没有一个

干部犯错误，没有大事故发生。

（二）区委召开的闹退社户主会议结束后，各乡、村、社接着召开各种会议，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进一步做好思想工作，稳定农民情绪。同时经县委批准，责成牙寨杨××和林略杨××在群众大会上检讨并退回耕牛、农具、杉木和田地，还将这一情况通报全区。闹退社风由此止住，巩固了合作化成果。

（三）1957年春，全区解决闹退社后，组织大批工作队深入农村指导春耕生产，帮助农业合作社制订各种规章制度，全面安排农业生产，狠抓农林牧副渔发展。如推广稻田养鱼、鱼塘养鱼、养母猪等，还安排65户打铁师傅到县内各地和贵州、湖南等地去打铁。

1957年，独峒全区粮食实现大丰收，总产量达900多万斤，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增产粮食300多万斤。各农业社收入增加，年终分配兑现，每个劳动日分值在5~8角钱。玉马社工分值更是达到1元，在全区中最高。

三江公社化初期的回顾

曹积尧

一、到河南参观考察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

1958年5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指引下，神州大地掀起了一股“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浪潮，全国各地大放各种各样高产“卫星”，制造一个又一个神话，以“共产风”、“浮夸风”为标志的“五风”错误在全国泛滥成灾。

1958年8月23日至9月3日，中共柳州地委组织各县农村部长到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参观考察中国第一个集体农庄——人民公社。笔者时任中共三江县委农村部副部长，参加了这次考察活动。

8月26日，参观团一行10余人先后考察了他们刚组建成的磨面厂、妇产院、滚珠轴承厂、幼儿园、敬老院、养猪场，以及青年拖拉机站、红旗实验场等。大家感到很新鲜，很激动。

新乡县委书记向我们介绍了该县公社化情况：全县24万人，69万亩土地，从7月22日至25日，三天时间将228个高级社合并成10个人民公社。他说，人民公社有八大优越性。

9月2日，我们将考察情况电报地委，要求各县选点试办人民公社。谁知我们回到柳州，正碰上地委召开三级干部会，一打听，各县都已经公社化了。

三江是8月24日至26日实现公社化的。三天时间将全县220多个高级社，42000多户，18万人合并成10个人民公社，并在和里召开庆祝大会，给各公社命名，宣布成立三江县人民公社联合社。

二、侗乡苗寨刮起一股“共产风”

1958年6月中旬，大竹办起第一个集体食堂。集体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前奏，也是刮“共产风”的先锋。为办好食堂，在物资缺乏的情况下，必须集中口粮、口油、酸肉、酸鱼、蔬菜等，宣布鸡鸭鹅鱼归食堂，自留地、饲料地统一经营，为创造“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思想革命化，行动战斗化”准备条件。

9月9日，我回到程阳（县委重点），为拟在我县召开的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作准备。

9月10日，我上林溪，召开公社首届社员代表大会，通过《公社章程》，选举社管委领导，研究机构设置及人员安排，把公社，大队两级架子搭上。

9月20日，地委召开首次人民公社工作会议，传达区党委会议精神，研究解决公社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地委根据中央、自治区指示精神，制订了10条政策，并在会上宣布：

- （一）公共财产、公积金、公益金一律归公社所有；
- （二）鱼塘、自留地、饲料地一律归公社所有；
- （三）入社的股份基金（指高级社）一律归公社所有，多者不退，少者不补；
- （四）山林一律归公社所有；
- （五）超支户、分空户（指高级社）一律转账进公社，将来不了了之（对外不宣传）；
- （六）私人养猪已归公社了的，记在各人名下，属困难户贷款养的由公社归还；
- （七）家禽已入社了的就算了，未入社的允许不入社，但要限制；
- （八）房屋不要宣布入社，多余的可以借用；
- （九）财贸部门暂且不动，可采取柳城办法：一个摊子挂两块牌子，记两本账；
- （十）今年实行公社统一分配，实行等级工资制和粮食供给制，工资总额80%为固定工资，20%为奖励工资。

地委十条传达后，侗乡苗寨刮起一阵阵的“共产风”，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笔者当时主管农村分配工作，在处理具体问题时遇到巨大的阻力和困难。

三、纠正共产风，调整公社内部核算制度

1958年11月21日至12月1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全会审议和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会后，全国各地农村开始纠正“共产风”，整顿人民公社。

1958年1月16日，笔者在林溪公社召开三级干部大会（当时兼任该公社党委第一书记），传达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到会540人。会议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统一思想，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在总结五八年工业、农业、思想三大丰收的基础上，纠正“一平二调三扣款”的“共产风”。开展整风整社。经过研究，大会决定整改几条：

- (一) 没收的银链、首饰、废钢铁等，按价付款给社员；
- (二) 猪、鸡、鸭、鹅入社的，分三期付款给社员，春节前先付 30%，六月底前结清；
- (三) 不准再搬家、并户；
- (四) 口粮指标不够的，可在食堂内部调整。

当时，县委为了保住先进县旗帜，防止大面积疫情发生，精力主要集中于抓核产，安排好群众生活，因而无法顾及纠正“左”的错误，克服“共产风”。所以，在各公社三级干部会结束时即召开电话会，强调当前整社要以粮食工作为中心，第一书记要亲自抓核产和运粮，防止食堂断粮饿死人。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后，中央又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并下发全党。

1959年3月上旬，自治区党委召开四级干部大会，传达贯彻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明确“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的原则。变公社统一核算为大队统一核算。地委也出台 15 条政策予以落实。

3月下旬，县委召开五级干部大会，时称“万人大会”，生产队小组长以上参加。以大队为单位吃住，县城附近村寨都住满了人。大会有两个内容，分两个阶段进行。一个内容是传达毛泽东主席“六条指示”（即毛泽东给全党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开展民主运动；另一个是粮食第三次大核产，解决食堂断炊问题。地委主要领导坐镇指挥。大会于4月20日结束，会期长达一个月。

毛泽东“六条指示”内容是：包产不要太高，密植不要太密，要节约粮食，播种面积要多，要机械化，要讲真话。

毛泽东言简意明的“六条指示”，广大基层干部听了震动很大，感到毛主席讲出了他们的心里话，毛主席给了他们抵制“五风”的思想武器。从而大大激发了到会干部的政治热情。他们通过大鸣大放指责五八年“五风”的严重泛滥，分析五八年全县大丰收为什么出现大缺粮。在总结大会上县委负责人说，群众鸣放有 15 条不满：

- (一) 对搬家、并村不满；(二) 对家禽家畜大集中不满；(三) 对劳动力大调动不满；
- (四) 对妇女剪头发、炼钢铁不满；(五) 对大收银链首饰不满；(六) 对大收款、扣发社员工资不满；(七) 对收废钢铁把锅头、鼎罐、三脚架搞光不满；(八) 对无偿借用社员房屋搞食堂不满；(九) 对集中睡觉，夫妻分居不满；(十) 对无偿调拨生猪、耕牛、木材、茶油不满；(十一) 对在核产中乱搜家、盘点不满；(十二) 对贫富一拉平搞分配不满；(十三) 对禾苗大搬家放“卫星”不满；(十四) 对公社化后死猪多、死牛多、农具损失多不满；(十五) 对干部作风恶劣，强迫命令不满。

民主运动是密切党与群众关系，克服“五风”，扭转被动局面的重大措施。可惜，由于粮食紧缺，指标偏低，疫情上升，不得不中止深入贯彻。5月开始，转到以抢救病人为重点

的生产救灾运动。

为了战胜自然灾害，扑灭疫情，克服经济困难，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于 1959 年 5 月 7 日至 6 月 11 日，连续发出三个指示：决定恢复自留地、饲料地，允许社员喂养少量家禽家畜，退还房前屋后零星果树，以及根据群众自愿原则，允许没有条件的食堂散伙。

6 月 28 日，县委召开电话会，传达贯彻中央三个指示，广大干部、社员听后无不拍手称快。县委号召全党全民认真贯彻落实，大种蔬菜，大养猪鸡鸭鹅鱼，贯彻“城乡并举”、“公私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特别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养猪、种菜。

四、大地春雷，公社取消

实践已经证明，人民公社不适应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中央作了两次调整，即由公社统一分配退到大队再退到以生产队为统一核算单位进行分配，但还是达不到农民要求。1961 年农民一致要求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然而，农民这个要求在当时没能实现，因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当时确定的最后“底线”。

1961 年 12 月 8 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传达贯彻党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开展整风整社，反对两个平均主义，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大会通过鸣放，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鸣放结果出乎意料，到会的绝大多数基层干部都主张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县、区干部口头不敢讲，但内心是同情和支持农民的。

出现这样一边倒的情况怎么办？当时县委主要负责人只好耐心细致地做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回忆对比，进行阶级教育，宣传公社优越性，划清平均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限。会议延长五天，于 12 月 18 日结束。在总结大会上，县委领导说：单干思想是资本主义性质，解决单干问题要开展两条道路斗争，否则无法巩固集体经济，也无法落实“基本核算单位”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二十年，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愿望不但得不到允许，还不断地遭到所谓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批判和斗争。

历史潮流不可阻挡，经济规律不能违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展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除迷信，冲破禁区。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党中央于 1981 年 9 月下发了 75 号文件，允许农民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生产责任制形式。这样，联产承包到户便迅速在全国各地推行。至此，人民公社的模式实际上已被彻底否定。再后，公社作为一级行政机构的名称也被取消了。

（2003 年 6 月 27 日于柳州）

参加自治区射击运动会的经过

欧邦玉

1959年（具体时间已记不清），自治区在融水县举办射击运动会。这次运动会，由各地、市、县各派一个代表队参加。一个代表队分两个小队，每队由5人组成，分别参加打跑鹿和打飞碟。集体和个人各取前三名。

我县由各乡和驻军选拔优秀射手，最后由县里确定人员。副县长梁治安亲任队长，并带领4位猎枪手参加打飞碟，县民警中队指导员王明德任副队长并带领4名步枪手参加打跑鹿。队员有县民警中队小队长韦明正、欧邦玉，其他6名队员记不清了。

当时，我县尚未通车，由县里包一条小木船由古宜沿江而下。到丹洲时，停船上岸吃饭，并参观了古怀远县城遗址。饭后，继续乘船下融安。在融安住了一夜，第二天到融水。

在融水休息一天后，即开始比赛。比赛时天刮着北风，下着小雨，气温很低，但比赛照常进行，地点在现融水火车站一带。

所谓打跑鹿，即首先把鹿画好，在它的胸部均匀地画上5个环，挂在100米远、20米宽的开阔地面，拉靶人要求在4秒钟内拉靶跑完这20米路段。射手自带步枪或者借用都行，每人发给25发子弹，其中有5发试射，不记成绩，20发正式射，记成绩，以命中环数多者为优胜。射手要求在4秒钟内连续完成举枪、跟踪、瞄准、击发等射击动作。

打飞碟，我没有参加，我县代表队没有获得名次。我是抽空观看了一下。大体情况是，将一个小碟子若10公分左右大，用抛碟机将碟子抛上约30米高的空中，射手用双管猎枪举枪、跟踪、瞄准、击发，一枪不中，可连续打第二枪，以命中多数者为优胜。

我县打跑鹿被安排在早上8~9点钟进行。当时天气对我们相当不利，雨越下越大，北风越刮越冷。尤其是轮到我射击时，突然下起了阵雨。我打完5发试射全中之后，经指挥台同意，王指导员亲自为我撑伞（整个运动会中唯我一人需要撑伞）。由于天气很冷，加上第一次参赛，精神有些紧张，所以，虽然命中发数最高，达到18发（有两发中靶不进环），但成绩很不理想，总环数很低，排在第十名之后。

这除了技术、天气、情绪等主客观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对命中精度影响较大的因素就是几个轮换位靶的人，他们身穿雨衣，在新挖且很滑的战壕内奔跑，时快时慢，使射手很难把握提前量，不是打前了，就是打后了。当然，关键还是射手的技术。尽管我们五位队员中，有三位是民警中队骨干，有两位是复退军人，但我们的射击技术都不很过硬，尤其是我。所以，我们五人的名次均在第十名左右，然而，从总的成绩上来看，我队却一直处在领先地位。

在我射击时下了阵雨之后，天气逐渐好转，到下午3点多钟时，竟然出了点小太阳，真是天助别人。然而，除了柳州地区代表队紧靠我们排在第二名之外，却一直没有那个代表队超过我们。最后是梧州地区代表队参赛，该队最后一名女射手虽只命中17发，但环数

最高，不仅为个人争得了第一名，而且以高过我队一环的成绩，为梧州地区代表队夺得了第一名。这样，我队荣获第二名，柳州地区代表队荣获第三名。

我队能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是我们原先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临时组建，没经过训练，而各地市代表队据说多是专业射击运动员参加。所以，我们只能力争打出较好的成绩向三江人民汇报就不错了。尤其是在射击时，天公不作美，更不敢想。但一队又一队参赛之后，我们却发现，我们的成绩还不错，居然没有哪个队超过我们。当时，地区代表队的朋友们，每赛完一队下来之后，他们都为我们高兴，以为我们两个队可能要稳坐一、二名了。就是在梧州地区代表队最后一名女射手快要射完时，大家都还这样以为。没想到那名女射手最后一枪，竟打出个最高环——五环，人们这才拍胸口，为我们感到惋惜。当然，我们能获得第二名也是不错了。在颁奖时，区领导还表扬了我们三江代表队，说我们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能打得第二名，确实了不起。

我们回来后，向县里作了汇报，受到了县委领导的表扬。当年，在原“江西会馆”旧址举办展览会时，我们获奖的奖状被摆在进大门正中最显眼处，桌子上蒙着大红布，奖状摆在红布正中，两边摆放着几盆鲜花。每一个来参观者，一进大门，都会被美丽的鲜花和金黄色的奖状所吸引，非看一眼不可。

三级书记上苗山

梁 谊

上个世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由于多种原因，我国处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为迅速扭转局面，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采取各种有力措施，率领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从而战胜了困难，摆脱了困境，恢复和发展了生产，我们的事业又不断向前发展。

1960 年冬，三江侗族自治县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在运动中，县委发现富禄公社苗族聚居的大顺、龙奋、仁里、纯德、归述、岑洞、匡里等七个大队，灾情是全县重中之重，遂决定把上述七个大队，从富禄公社分出来，成立匡里人民公社，并将县委办公室主任下放至该公社担任公社党委书记，以加强这个地方的救灾工作。

1961 年秋，天气晴朗，两艘木船从县城出发，船上载着区党委书记安平生，地委书记朱渭川，县委第一书记姜肇初，书记处书记张胤等三级书记。同行的还有二十多名工作人员。他们是专程到匡里公社及其下属的大顺大队检查救灾工作的。由于匡里公社刚刚成立，还暂时住在匡里寨的一栋小木楼里，条件差，吃住都很不方便。书记们有备而来，他们从县城带来了铺盖，吃住都在河边的两条木船上，生活十分艰苦。

第二天上午，区、地、县三级书记在公社书记梁谊的陪同下，一行二十多人，从匡里寨背爬山，沿着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走路到大顺大队，受到大顺大队党支部书记杨忠温和

驻队工作组的欢迎。

三级书记到达大顺后，稍作休息，就投入紧张的工作。工作队分成两个小组，由大队干部带路分别到该大队的大顺、高业两个自然村，逐户进行调查。调查内容是：一、非正常死亡情况；二、现有病人情况；三、各队土地种植情况。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调查，三级书记对大顺大队的灾情有了比较具体的了解，认为大顺大队的灾情有三多。即：非正常死亡多；病人多；荒田多。

这“三多”是如何产生的，又怎样去解决？这是三级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但是他们听取调查组的汇报后，并没有作什么重要指示，而是采取询问的方式来解决救灾工作中的关键问题。于是，就出现了三级书记又主要是区党委书记安平生与公社书记梁谊的对话内容。

米病就用米来医

安书记：老梁，匡里公社特别是大顺大队的灾情这样严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梁谊：安书记，因为少数民族卫生条件差，一旦发生疫情，容易传染蔓延。

安书记：以前少数民族卫生条件也是差的呀，为什么不出现这样严重的灾情呢？

梁谊：因为匡里公社医师少，据了解全公社只有三名草药医师，公社卫生所也只有五名医师和护士，所以，一旦发生疫情，因缺医少药，一时难以控制，便发生严重疫情。

安书记：以前这个地区同样缺医少药，为什么不发生严重疫情？

梁谊：安书记，你要听真话还是假话？

安书记：我当然要听真话。你不要有顾虑，请讲吧。

梁谊（思考片刻，因为疫情不能涉及粮食，这是当时三江的禁区，所以要委婉地回答）：安书记，群众讲这是米病，就是吃不饱才发生的疫情。

安书记：这就对了，米病要用米来医嘛！你们既然知道是米病，为什么不很好解决呢？

梁谊：匡里公社的疫情，我们是清楚的。公社成立后，我们已把实行粮食补助的病人数从原来的占人口百分之六十多增加到百分之九十多，但县委考虑到粮食指标问题，要我们从严掌握。

安书记：从大顺大队情况看，现在活着的人百分之百是干瘦病人，你们应该百分之百地补助，即使病好以后，还需要继续补助3个月，让病人把身体恢复好。

这时，县委第一书记姜肇初和书记张胤插话：你们匡里公社要按安书记的指示办，我们全县的救灾工作也一定要按安书记的指示办，不要受指标限制，该补助的一定要补助。

安书记的指示，解决了全县病人的粮食补助问题，解决了病好后继续补助3个月的问题，使全县大批病人的身体逐渐得到恢复。

改供应玉米为供应大米

安书记：老梁，你们实行粮食补助的病人已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为什么现在疫情还是得不到控制，非正常死亡还时有发生呢？

梁谊：我们虽然补助百分之九十以上，但供应的都是玉米。这里的少数民族历来习惯吃糯米和粘米，没有吃玉米的习惯，更不会加工，所以从仓库领回玉米便直接煮吃，本来身体就干瘦，吃了玉米就腹泻，病情反而加重，甚至死亡。

安书记：老梁，你们知道病人吃玉米不但治不好病，反而会加重病情，为什么还要供应玉米给病人呢？

梁谊：县里调给我们供应病人的粮食都是玉米呀！

安书记：老姜，你们为什么要调玉米给匡里呢？

姜书记：我们是缺粮县，地委调给我们玉米，我们也只有往各公社调了。

安书记：老朱，你们地委为什么要调玉米给三江呢？

朱书记：我们地委靠从来宾、忻城两个县收购粮食。这两个县是玉米产区，收购上来的都是玉米，所以我们也只有给三江供应玉米了。同时，我们也不知道三江少数民族没有吃玉米和加工玉米的习惯啊。

安书记：老朱，如果你们停止供应玉米给三江，你们需要多少大米呢？

朱书记：我们估计要 500 万斤粮食。

安书记：我决定从自治区增加 500 万斤大米给柳州。老朱，请地委立即停止调玉米给三江。老姜，你们通知县粮食部门立即停止供应玉米给病人，因为供应玉米不但不能治病反而害了病人啊！老梁，你们匡里从今天起就停止供应玉米。

于是，全县便由供应玉米改为供应大米，病人的身体也不断康复。

抛荒田谁种谁收好

安书记（叫大家往外看）：你们看，大顺大队门前和周围的禾苗长得很好，你们生产救灾工作还是有成绩的嘛。

梁谊：这些田大部分是个人种的抛荒田，只有少数是由生产队种的。

安书记：老梁，你们是怎样考虑允许个人种抛荒田的呢？

梁谊：安书记，我们公社党委根据荒田多和病人体质弱的实际情况，经过多次讨论作出了允许个人种抛荒田的三条规定：一是允许每人每年开抛荒田两分；二是谁种谁收；三是个人种植三年后收归集体耕种。

安书记：你们允许个人开荒田，谁种谁收，这个办法好嘛！不过，只允许种两分少了，有荒田多的生产队，个人可以多种嘛！这对恢复和发展生产有利，对恢复身体健康也有利。

姜书记：我们县委也同意匡里公社允许个人种抛荒田的做法，全县也有部份社队作出

了这种规定。

就这样，三级书记上苗山，仅仅用一天时间，即解决了大顺大队乃至全县病人的粮食补助、改供应玉米为供应大米、允许个人种植抛荒田的三个救灾工作中的关键性问题。这不仅是匡里公社大顺大队救灾工作的重大转折，同时也是全县救灾工作的重大转折。此后，全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广大人民群众身体逐渐康复，生产也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三级书记在大顺住了一个晚上。吃的是用少量糯米与南瓜混煮做成的饭，菜是炒南瓜煮南瓜苗汤，住的是从县里带来的被子、席子，在大队楼板上摆大铺。三级书记与工作人员共同睡在大铺上。

三级书记上苗山的事情，虽然过去 40 多年了，但是，他们不辞辛劳，深入实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不讲空话只求实效，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却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里。他们上苗山的事迹，至今在匡里和两边苗山仍广为传颂。

以史为鉴，莫让悲剧重演

梅 岭

1958 年，是大跃进的疯狂年代，“五风”泛滥，席卷全国。当时，在交通闭塞的偏僻侗乡三江县，风暴甚嚣，怪事百出。笔者当时在三江农民报（后改为三江卫星报）工作，拍了不少纪实性的照片。现从旧照片中选上四幅，作为那个年代的见证，也许能引起人们的一番思考。

“天下第一田”。1958 年 8 月，为夺取粮食高产，我县大放“卫星”，提出了赛广东潮安超湖北孝感（两县是全国粮食高产县）的口号。林溪卫星人民公社程阳钢铁大队，为迎接中央民族工作现场会在三江召开，在村寨背后的田墩上搞卫星试验田，不惜把山冲长势好的禾苗搬来卫星田，以展示夏收景象，在田中竖起了高 5 米宽 1 米的大牌子，上书“天下第一田”。（见图一）此举引得国内外参观者络绎不绝。由于高度密植，好景不长，禾苗发烧，急派几个老农日夜护理，搭起木架铺上木板，高空射水降温。一个多月后，终于还是回天无术，禾苗霉烂，只好放火烧掉，损失惨重，老农在田头哭了好几天。

钢铁放“卫星”。当时，不仅放粮食卫星，还要放钢铁卫星，要东风压倒西风，口号是：“三年超英国，七年超美帝。”各公社遍建高炉，遍搜强缴农民好端端的农具家具，砸烂回炉再铸。大榕树底（今林业局门前）烂铜烂铁堆成山，集中近两千民工在老堡公社平辽大队建县钢铁厂，土法上马用泥砖砌起高炉，民工日夜奋战，浓烟滚滚，烧掉木炭木材近六百万斤，结果只炼出一堆烧结铁，劳民伤财以失败而告终（见图二）。

报喜不报忧。为了保住三江“头苗亩产超千斤”的大红旗，尽管粮食减产，公共食堂面临断炊，仍抽调机关干部、学生组成报喜队于 9 月 17 日到柳州向地委报喜，在中山中路

当时最繁华的市中心“五角星”，敲锣打鼓游行，大造声势（见图三）。还在街头贴上大幅墙报，口号是：“乘风破浪赛潮安超孝感夺取全国冠军（粮食）；志雄四海超英国压美帝硬要世界第一（钢铁）”，横批“钢铁三江”，向各县挑战，口号震天，雄心勃勃（见图四）。结果浮夸风导致国民经济走向崩溃，三江成为重灾县。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但那段自欺欺人，啼笑皆非的历史，总是让人感到辛酸。作为宣传媒体人员，笔者感到十分内疚，愿人们以史为鉴，莫让悲剧重演。

2003年4月25日

华练救灾的日日夜夜

梅 岭

1958年，大跃进的风暴席卷全国。地处偏僻山乡，交通闭塞的三江县，一举夺得“头亩亩产超千斤”的大红旗，9月，组织报喜队到柳州向地委报喜。当时，锣鼓喧天，雄心勃勃，在柳州最繁华的中山中路街头，张贴大幅墙报向全国挑战。口号是：“乘风破浪赛潮安超孝感夺取全国冠军（粮食，注一）；志雄四海超英国压美帝硬要世界第一”（工业）；横批为“钢铁三江”（有照片作凭）。为实现这一目标，“五风”（注二）泛滥，导致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经济困难，食堂断炊，群众体质衰弱，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多，一时先进县红旗倒地，三江成为柳州地区的重灾县。

在1961年6月的关键时刻，柳州地委从各单位抽调人员，并从地区卫校抽师生多人，组成“生产救灾工作组”，组长何达天（地区水电局长，后另有任务提前回柳），副组长梅岭（跃进日报记者），共20多人。工作组下到三江后，各人即背起行李，翻山越岭来到八协公社华练大队。由于断粮和长期的“瓜菜代”（注三），华练大队疫情严重，300多户1600多人，基本上是干瘦、浮肿、闭经、腹泻，情况触目惊心。如不采取紧急措施，后果难以预料，遂决定办病院将重病人集中治疗。工作组抽部分同志进驻病院，留部分管面上。大队抽卫生员吴德兴，保管员吴大文以及吴奶银妹（妇女主任）、吴月明等七八位中青年妇女为护理员，利用寨后14队杨国仁的两间空禾晾作病院，大家动手打扫，铺床，架大锅，搬炊具……开始接收重病者。由于人数太多，后又在附近找了两间禾晾，住院病人约130多人。

病院是办起来了，但根本的问题是缺米，群众说这是“米病”。好在上级已采取应急措施，住院病人每人每天补助四两米，二两黄豆，二两古巴糖及医药用品，每天造册送大队盖章后到公社审批。时任公社书记的覃安民同志，急病院之所急，随到随批。然后分别到粮所领米、豆，到供销社领糖，到医院领药品，每天有两担货物到病院。工作人员早晚给病人探体温，打针服药，晚上轮流值班到天亮，任劳任怨。说实话，病人多是三四十岁的中青年，已饿得饥肠辘辘，四两米只是杯水车薪，但指标有限，病院只好一餐吃干饭（黄

豆作菜）一餐喝糖粥（增加热量）。一天晚上，一位年老的病人腹泻不止，昏迷过去，衣服裤子沾满大便，情况危急，得转送公社病院。大家用木椅改装成担架，要几个人轮流抬，加上前后四个人打电筒照明，前呼后拥。一上培风桥的长廊，桥板响起了急促的“叮咚叮咚”声。大家都心急如焚，但走在狭窄的山路上，弯弯曲曲，一上一下，为了安全，一伙人只好缓慢前行，从华练到八协只不过六七里路，却走了个多小时，累得大家汗流浹背，筋疲力尽。

病院办了两个月，病人病情基本得到控制，但效果不明显。一天，我到大队汇报工作，看到三楼屋梁上挂有不少牛皮（当时是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各小队牛皮都存放在大队），我突发奇想：侗家染布常用牛皮煮浆，也许牛皮有些营养。我即向支书杨代远，大队长杨华刚提出要牛皮。他俩很支持，说：“只要病院用得着就拿去嘛！”我们要了一张牛皮拿去试，先用火烧，接着刮毛、洗净，然后用斧头砍成一块块，放进大锅里煮软，再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约二公分宽三公分长）拌上盐，最后用茶油炸，每人分两块尝尝。病人说，别看是黑呼呼的牛皮，油一炸还是有点肉香味，好吃。多年闻不到肉味的病人，这下算是“开荤”了。结果，大队存放的十余张牛皮，全给病人“开荤”了。

快到年底了，经过近半年日日夜夜的病院疗养，绝大部分病人逐渐恢复了体质，陆续出院回家了，工作组也就收兵回县。在县委二楼的会议室，吴仕德县长主持会议，对工作组的工作作了肯定之后，传达了地委的决定，为了继续支援三江救灾，在工作组中抽调部份同志留在三江工作，并让大家座谈。对这一决定，工作组的同志没有一点思想准备，除我之外，都是外县人，感到很突然，许久无人发言。那年代政治空气浓，组织需要是第一位的。我是三江人，表示服从组织分配，接着也有二三人表态。回到柳州后才知调动名单有9人，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最后到三江报到的有：廖德田（后分到县财税局）、张怀祥（后分到木材厂）、刘道春（分到税务局），梅岭（后分到县委宣传部），共4人，廖、张、刘3人在三江尽力工作几十年，直到退休，张、刘两同志已相继逝世，长眠于侗乡。

斗转星移，时光飞逝，43年过去了。今年5月，我趁柳州市摄影家到侗乡采风之机，特地到华练旧地重游，但时过境迁，走进寨子人面陌生，都以为我是外地游客。在鼓楼下见不少老人在闲聊，信步进去，一老者冲着我喊：“老梅！你何时来？”我记忆模糊依稀，问道：“你怎么认得我？”他笑笑：“在病院呀！”一番寒暄，才知老者叫吴文言，今年78岁了。他说：“那年头全靠上级给救命粮啊！要不早就到寨后‘守山’（指死亡）去了”。看上去老者脸色红润，身体硬朗，而且健谈。我不想勾引他对辛酸往事的过多回忆，随便问道：“现在生活好多了吧？”他答“那时饿了没饭吃，现在有饭不想吃，一个地一个天啰！”“那就吃好一点，保重身体延年益寿”我说。“咳！什么好不好？天天有酒有肉就够了”，他指向附近的肉摊，又指向后山“你看看嘛，变啰！”我举目四望，寨后漫山遍岭都是茶林。乡亲们说，早上上山采茶两小时少的也有七八斤（生茶叶每斤3元），回家洗手后又搞宝石

加工（不少农户有二三台），每人每天可有十多元收入，按此估算，收入不菲。过去买一斤盐一根针，要跑独峒墟，现在不少农户起了砖房，开商店当老板的有 20 多家，每天杀三头猪还不够卖。真是今非昔比了。

注一：广东潮安、湖北孝感当时是全国粮食高产县。

注二：“五风”即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浮夸风和强迫命令。

注三：“瓜菜代”，因当时无粮，提出以瓜菜代替填充肚子。瓜即南瓜、冬瓜；菜即青菜、野菜；代即代食品，如猫豆、山薯、红薯等。

2004 年 6 月 30 日于柳州

郭沫若为程阳桥赋诗追忆及“层”“寻”辨正

吴炳金

程阳桥本名永济桥，1911 年倡修，1924 年竣工，因其独特的建筑艺术和雄伟身姿被列为世界四大名桥之一。

195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把程阳桥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2 年邮电部以程阳桥为图案，制作一枚 20 分邮票发行；

1963 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程阳桥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1982 年程阳桥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程阳桥从此“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时，广西以程阳桥为原型，制作大型木雕“同心桥”，作为礼品送给香港特区政府。

以程阳桥造型作为重要景观的旅游景点和以该桥为素材创作的工艺美术品、画作、摄影作品，更是不胜枚举，遍布全国各地。

程阳桥之所以能名播天下，主要靠其建筑本身的特色与壮观，但也离不开郭沫若先生的题字与赋诗。

郭沫若什么时候到过三江？如若未到，又怎么为程阳桥题字赋诗？人们常有这样的提问。其实，郭老并未到过三江，诗中“何时得上三江道”就是诠释。促成郭老为程阳桥题字赋诗，完全是“四清”工作队搭的桥。

1964 年，程阳被选作面上“四清”工作试点。工作队主要来自区统战部和区民委。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点工作后，1965 年下半年面上“四清”铺开。当时，我随中央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学院、广西民族学院（时称“三院”）师生一起回三江参加“四清”工作。因我是本地人，有语言上的优势，一开始便被安排在分团办公室工作。

来自祖国各地的各民族师生来到侗乡后，被侗族建筑的艺术风格深深吸引，区统战部和区民委的同志对风雨桥更是怀有深厚的感情，还出点子，要请名人为程阳桥题写点什么。

“四清”工作总团采纳了这个意见。总团团长、区统战部副部长、原柳北人民解放总队司令员兼政委莫矜征求“三院”和区民委领导意见后，决定由中央民族学院领导牵线，请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著名书法家郭沫若先生为程阳桥题字。于是，总团把此事当作为地方办实事，为民办实事，由当时县委宣传部的陈世裔、颜谷执笔写成程阳桥简介，并配上梅岭拍摄的照片派人送到中国科学院，请郭老题字。郭老看到照片和信函后，对程阳桥赞叹不已，欣然挥毫，题写了“程阳桥”三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并赋诗一首。诗曰：

艳说林溪风雨桥，桥长廿丈四寻高。
重瓴联阁怡神巧，列砥横流入望遥。
竹木一身坚胜铁，茶林万载茁新苗。
何时得上三江道，学把犁锄事体劳。

关于郭老题字赋诗的消息，当时只隐隐约约听到一些，没有见到真迹。此消息很快不胫而走，加上莫矜是融水县人，区统战部和区民委也有其他融水人，很快，融水也知道了。融水人知道这个消息后着急了，因为1962年郭老曾到融水考察并看过“老君洞”却没有让他留下墨迹；郭老未到三江，反而得到了题字和赋诗，融水人因此心理很不平衡。于是，在地委的指点下，融水县委宣传部于1965年底将融水县况和“老君洞”修膳情况配上照片，以“军邮密信”寄往北京中国科学院转郭沫若同志收启。郭老果然不负众望，取近音写了“劳军洞”三个淋漓酣畅的大字寄回，并作了说明。

郭老题字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些题字的命运可想而知。

1970年，我调到县委宣传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为推介三江，我想到了程阳桥，从程阳桥又想到了郭老的题字赋诗。可是，在县委宣传部、县档案馆、文化馆、文化局等单位均未发现郭老手迹。那时，唐志宗、杨通山、颜谷、梅岭等同志也十分关心，都四处打听和查找。直到1974年才获得手迹已流失到柳州的线索。经过几番周折，最后终于从收藏者手中取回了题字和赋诗（编者注：此事见梅岭《郭老手迹失而复得记》）。因此，我们要十分感谢那些在“文革”劫难中敢冒风险将郭老的题字赋诗保留下来的朋友们。没有他们，或许郭老给三江程阳桥的题字和赋诗，也同给融水的“劳军洞”题字一样，至今难觅踪影。

郭老的题字和赋诗失而复得并予以公开后，程阳桥的身价顿增，对程阳桥的宣传也顿时增色不少。

但是，由于我们本身学识的浅薄，特别是对郭老流畅书法的自以为是的辨认，竟误将诗句中的“寻”字当成了“层”字。这从表面上理解含义和句子文字构成也觉顺通，于是，在宣传、抄写、推介时一直都沿用“四层高”。

1978年，自治区成立20周年，参加庆典活动的中央代表团要到三江进行慰问。为推介三江，县里组织专人编写了“三江侗族自治县简介”，其中对程阳桥的介绍仍然使用“桥长廿丈四层高”。

1979年，为推介三江，我将侗族建筑艺术一稿配上程阳桥和郭老的题诗寄给《民族团结》和《民族画报》。在稿件刊用前，收到了《民族画报》的回信，信曰：“程阳桥一稿有二处须改正，（一）文稿中说是国务院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应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笔者注：1982年国务院才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二）郭老诗中‘桥长廿丈四层高’应是‘四寻高’，我们误把‘寻’看作‘层’”。

同年，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向全国征集郭老著作和手迹。我于5月13日将郭老的题诗拍成照片，配上程阳桥简介寄给编委，在文字表述中，也是写“四层高”。7月4日，编委给我回信：“程阳桥简介和程阳桥照片以及郭沫若同志为程阳桥题诗（影印件）都已收到。这些资料将留存备用”。信中还询问墨迹原件现在何处。7月18日我又回信作了答复。11月27日，编委又第二次来信：“炳金同志，7月18日来信收悉，迟复为歉！郭沫若同志七律《题三江程阳桥》已收集在《沫若诗词选》内（见第315页）。诗的第二句是‘桥长廿丈四寻高’，请参阅。专此函复”。

至此，将“寻”字误认、误读、误写为“层”字达15年之久的错讹，才得以辨正。“四寻高”才由此在社会上传开（注：寻为古度量单位，一寻为八尺）。

1998年，我在县基层办工作，与自治区工作队接触比较多，通过总队长、区语委主任覃耀武和李勇等同志牵线搭桥，从农工民主党这条线，请到时任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为独峒鼓楼题写楼匾，并于当年9月在独峒举行了隆重的挂匾仪式。还以独峒鼓楼为模型，制作了一件精致的工艺品赠送卢嘉锡副主席作为纪念。

两位国家领导人、科学界泰斗、著名书法家先后为侗乡风雨桥和鼓楼题字，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关怀，使侗族建筑艺术的价值和魅力更加增辉。我们要万分珍惜这些特殊的荣耀，努力发展三江的民族旅游，加快三江经济的发展。

2003年6月25日

郭沫若手迹失而复得记

梅 岭

在程阳桥桥头，悬挂有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的程阳桥桥名的牌匾，在桥的中部，存放有郭老题赋的赞美该桥的七律诗。题匾与题诗使得这座著称于世的侗族建筑犹如锦上添花，更具魅力。但鲜为人知的是，郭老的手迹是劫后余生，失而复得。这全赖具有慧眼又有收藏意识的侯中鸣、胡擎元两位先生，（注①）。笔者在手迹面前驻足凝视，睹物思人，勾起对往事的一段回忆。

那是1965年秋，郭老为程阳桥亲笔题匾和题诗手迹原件送到三江后，领导非常重视，第二年派县委宣传部的颜谷将郭老的“程阳桥”题字及一块长约1.6米，宽约0.8米，厚0.05米的樟木板送到柳州市工艺美术厂，将字放大刻匾。后“文革”、“三江事件”（注②）

叠起，柳州市工艺美术厂亦以“破四旧”为由遭查抄。时在工艺厂的侯中鸣先生倍感痛心，便偷偷在乱纸堆中翻找。当惊喜发现郭老的题字时便细心收藏起来。直至“四人帮”垮台后，县委宣传部和文化局的杨通山、颜谷俩人才又到柳州市工艺美术厂寻找郭老的题字。当时工艺厂尚未恢复，几经访询，方知樟木板已不知去向，郭老题字为侯中鸣先生好心收藏。杨、颜俩人不认识侯中鸣先生。后杨通山想到他的老同学，时任市委宣传部部长的洗光位，便请洗出面邀请侯先生见面，感谢侯先生为三江县保存了郭老题写的“程阳桥”真迹，并送上内装24元现金的一个红包作为薄礼表示酬谢。侯先生也很乐意地将“程阳桥”题字交还给杨、颜俩人带回三江。郭老墨宝“程阳桥”题字是物归原主了，但遗憾的是郭老的题诗却仍然石沉大海。

1971年1月，笔者调到老堡公社搞文教工作，经常下到各校，结识了从柳州耕师分配到老堡小学任教的胡会纯老师（现在市二机幼任教）。她年轻活泼，能歌善舞，与同事相处甚好。我酷爱摄影，闲聊中得知，她哥哥胡擎元亦迷恋摄影和篆刻，在柳州小有名气。为广交影友，我总想找机会与他结识和向他请教。但在公社工作的那个年代没有机会到柳州。1975年我调回县文化馆。1977年夏天我因公到柳，恰逢胡会纯老师回柳度假，在她的引荐下，才有幸初次与胡擎元先生会面。一见面他就对我说：“三江有件珍贵文物在我这里，现在应物归原主了。”“什么珍贵文物？”我惊喜地问。“郭老不仅是卓越的政治家，又是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和书法家，他的墨宝难得啊！”胡先生侃侃而谈。我问“是不是郭老的题诗？”“对了，郭老六十年代正是书法盛期，他那鲜明生动的诗句，洒脱俊逸的书法，是国宝啊！”“郭老的手迹怎么到你手上呢？”我不解地问。胡先生叹口气说：“说来话长了。”接着叙述了经过。1975年，他在市工艺美术厂裱字画，当时厂仓库被弄得一片狼藉，却未能清理。出于爱好，他常在这堆“废物”中翻翻找找。一天，意外地发现了郭老的题诗，他带着敬惜的心情，冒着政治风险带回家。这在当时是要有勇气的（他父亲被划为右派），他相信总有一天郭老的题诗会重放光彩。十年动乱结束后，他才抽空装裱。当我手捧郭老手迹，真是百感交集，一时不知如何感谢胡先生才好。我对他说：“你为三江做了件大好事，待我回县向领导汇报后，再给予奖励。”胡先生忙说：“这就不必了，郭老手迹能躲过劫难，就是万幸，现完璧归赵完全应该。”

郭老两件墨宝，先后失而复得，全赖侯中鸣、胡擎元两位先生保护和回赠。笔者写此文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一事实印证那个年代的历史，让世人得知，尽管“文革”年代十分疯狂，而有胆有识的知识分子，敢于冒着政治风险为三江做了好事，这怎不叫人肃然起敬。

注①：侯中鸣先生原在柳州市工艺厂，后调第三印刷厂，美工师，已退休。

胡擎元先生，对篆刻很有造诣，曾为《邓小平文选》线装本的扉页和藏书篆刻红色印章，1995年被聘为中央工艺美院教授。

注②：“三江事件”，1966年8月，中央民族学院在三江参加“四清”运动的师生二百

多人，要求回京参加文化大革命，未获批准，即揪斗“四清”总团书记莫矜，造“走资派”的反。区党委副书记安平生到三江劝解未果，区党委不得不罢莫矜的官。于是，民院学生又会同三江中学造反派学生，在县委门前静坐绝食，“四清”工作团被迫撤离。事件当时轰动全广西。

2003年4月20日

组建三江民兵独立团 支援枝柳铁路建设

肖玉书

1970年下半年，在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思想指引下，中央决定加快“三线”建设，修建枝柳铁路，以解决大西南通道问题。为了支援枝柳铁路建设，在上级的领导下，成立了枝柳铁路建设兵团。三江县地处枝柳铁路沿线，上级指定我们组建三江县民兵独立团，配合修建铁路大军修建沿线公路便道，以解决人员、物资的运输供给问题，我被分配去独立团负责八江至马胖、水团至牙屯堡路段的修建。水团至牙屯堡路段正是彭莫山隧道通过的地段，山高坡陡，工程艰巨，这对我们刚组建的队伍来说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根据上级的指示，我团的组建人员由县直机关单位和人武部抽调，团部设在八江公社八斗大队（后搬至林溪公社水团大队）。团部配团长一人，团政委一人，以下各配政工、财会、后勤、施工技术人员若干人，整个团部加起来不足15人，但要负责整个工地的宣传、组织领导、施工工作。由于民兵团人员主要是来自公社的社员，所带工具简陋，技术力量薄弱，没有修路的经验，修路基本上是靠人力，手挖、肩挑、背扛，开山打石方也主要靠打钢钎，放炮，工作十分艰苦。但当时由于有总指挥部、分指挥部的强有力领导和全体指战员的冲天干劲，大家都抱着同帝国主义争时间抢速度，争取枝柳铁路早日建成的坚强信念，为巩固国防，加快大三线建设，解决好大西南大通道而艰苦奋斗。

我团的组建工作由于得到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的支持，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组织起了四千多人的队伍。由于按部队团、营、连、排的建制进行管理，搞的是军事化，因而尽管是几千人的队伍，工作起来还是比较顺利的。尽管开工期间天气很冷，但大家的情绪都非常饱满，争分夺秒，大干快上，保证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任务。遇有需突击的路段，甚至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因而整个工程，从开工到通车，仅用了91天（时间从1970年10月14日在马胖开动员大会到1971年1月16日在林溪举行通车典礼），可称得上是高速了。

为了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觉悟和修路的积极性、主动性，我们不断地向广大指战员宣传建设大三线，修建枝柳铁路的重大意义，宣传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思想。在工作上则要求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对每一个工地，每一个路段都要认真地勘察、设计好。特别是对安全和技术问题不允许有丝毫马虎，一定要按规程作业，按规定办事。各级领导都要亲

临第一线，亲自指挥，亲自参战。如我们团部两个主要领导每天都要上工地，从路段的起点到终点检查一至二次，及时发现问题并就地解决。在一些难度大的路段，我们则采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办法。如，当路修到彭莫山中段时，有一个大填方，工程量有五千多立方米，由于山高坡陡，两边容纳不下很多人，而挖、填土方和修砌边坡又要同时进行，操作起来十分困难。为了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任务，不拖整个工程后腿，保证全线按时通车，我们就组织了林溪营的尖兵进行大突击，每天 24 小时人换工不停，挖、填、砌同时进行，团、营、连主要领导都到第一线亲自指挥，分工负责，经过 6 个昼夜连续苦战，终于把这个硬骨头工程拿了下来。

为了提高民兵打钢钎，挖、填土方和砌石方的技术水平，林溪营还举办了打钢钎竞赛，各连都挑选打钢钎的尖子参加，全团各营连都派代表参观。竞赛中有的一气能打三百多锤，有的做到一两个小时不换人。通过参观交流打钢钎的经验，全团各连队的水平都有了较大提高。此外全团还召开了打边坡、干砌石的现场会，指定各级领导和技术骨干参加，看完后要谈经验体会，然后回自己的工地亲自操作指导，从而保证了工程的进展。由于我们采取了各项切实有效的安全措施，保证了整个工程从开工到通车，没有发生重大责任和安全事故，即使是轻伤、小痛也很少，这样既保证了广大指战员的安全又使整个工程能够顺利完成。

在工程建设中，上级对我团非常重视和关怀，除分管领导经常下来检查指导外，我团在水团段施工期间，省军区、地区、县也都先后派出文艺宣传团（队），到我工地慰问演出。尽管当时天气很冷，一般都在摄氏一、二度，但我们广大指战员总是热情欢迎，踊跃观看。有时甚至演到深夜，演出结束时还有人迟迟不肯离去。慰问团（队）的同志也十分辛苦和卖力，尽管天寒地冻，在极其简陋的露天场地演出，有的节目因需要穿着很单薄，但他们总是干劲十足地把一个个节目演好，不打折扣地奉献给大家，这使我们全体指战员非常感动，大家除了对慰问团队致以谢意外，还表示决心，一定要把路修好，按时按量完成任务。

我独立团除了修建八江至马胖、水团至牙屯堡路段以支援枝柳铁路建设外，后来又修了区国防工办交给的从板壁到呈祥的专为“七一一”工程而建的公路，再后来又修建了同乐至产口的公路。通过这几段公路（便道）的修建，为我们三江县培养了一批干部和基层技术人员，为此后三江的公路和农田基本建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附注：严弟才任民兵独立团团团长，肖玉书任民兵独立团政委，石素华负责政工工作，卫祖余负责宣传工作。

溶江公路修建前后

杨文朴

1988年8月，受县委委托，我和县交通局局长贲政林同志上北京，到国家交通部汇报，请求投资修建321国道富禄至梅林接从江路段。

20世纪50年代，国家曾筹备修建“册三公路”，即从贵州省的册亨县至三江县城古宜。当时，由于两省区未能就线路走向问题达成一致而搁置下来。到60年代中期，国家修建322国道线时，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覃应机指示，这条路一定要经过富禄镇（红军时期他曾住过）。所以这条路定为从靖西到环江经融水县的大年下富禄到三江再上桂林。自治区交通测绘队于1965年到三江测量，1966年准备动工，全县准备抽调九千民工上马，并号召沿途的群众做好种菜等后勤准备工作。但由于当时文化大革命爆发而被迫停止。这条路以后改道经过罗城、融安过泗顶上桂林了。到了70年代，我县的西北面山区公路都已建成通车，因此，古宜至梅林的溶江公路就再次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我县公路建设资金来源主要是林业部门的投资和县内民工建勤，已建成的公路基本上是这种情况。这时，自治区林业厅拟在塘库办贮木场，为此要修建进场的江（荷）塘（库）公路。林业厅的想法是，先修塘库到老堡接铁路便道而上古宜，然后再修溶江公路。而当时我县溶江片四个公社都未通公路，群众要求十分迫切，想先修溶江公路。由于我县当时的领导与林业厅在思想上未能统一，林业厅就只修江塘公路。与此同时，县里也应群众要求上马连接同（乐）产（口）公路的良口至富禄公路。这样，我县在林业厅修建江塘路时未能在劳动力上给予足够支持。由此又导致了我县溶江公路的修建未能得到上级林业部门在资金上的全力支持，而仅靠自治区民委的民族补助金和我县林业局本身资金，采取民工建勤的方式修建。在修建过程中也曾向林业厅请款，但只得到不定额不定期的少量资金支持。这段路在资金投入不正常的情况下，工程打打停停，前后修了7年，换了7个指挥长才基本完成，勉强通车，而且要绕道同乐、八江到达古宜。这是我县公路建设历史上最窝囊的一项工程，应该深刻反思。良口至富禄公路修通以后，余下两头尚待修建，即富禄至从江和古宜至产口。按当时情况，应该先修产口到古宜的一段，以使溶江片群众能尽快直接通达古宜。当时，区统战部拨给三江少数民族补助资金用于修路，县统战部意向是用来修建产口至和里上燕茶至三团的公路。1979年春，县委在县委小礼堂召开领导班子会议就此事进行研究。我当时是主管工交的县革委副主任，在会上我首先发言。我说，产口至三团的路也是应该修建的，只不过应该考虑孰先孰后。当前最主要的是溶江片群众要求直通古宜，缩短到县城的时间。所以，我认为应先修产口到和里出泗里接铁路便道，直通古宜为好。可是我9月份被安排去北京读书，到1980年7月回县时，产口至三团路已决定修建并准备动工。1980年冬天，自治区在我县搞选举试点，我被选为县长，而这条通过我家乡南寨的路正值修建当中，于是人们就叫这条路为“文朴路”。虽然当时，我对建这条路有不同看法，也不管人们叫“文朴路”的含义

是什么，但这两条路在当时都没能完成，总是问心有愧的。1985年，国家用粮棉布以工代赈的形式修建古宜至产口公路。当时我已到人大工作，县委决定我到公路指挥部当总顾问，王全军任指挥长。古宜至产口公路全长30.5公里，自1985年动工，至1987年竣工，仅用两年时间即建成通车，是三江修路史上最快、民工受益最好的工程。此项工程得到自治区表扬并因此被评为自治区以工代赈先进县。自治区交通厅的同志很满意地对我说，老杨，你们三江的“米桶”倒了很久，现在又树起来了，祝你们继续前进。从此，古宜至富禄的70公里的路程可以走直线了。随着形势的发展，从江、三江两县人民要求修通接边路段的呼声越来越高，两县领导亦为此多次碰头开会协商，并分别向各自的上级汇报。1985年10月，在贵州凯里召开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广西柳州地区首届经济技术交通协作会议，并结成姐妹地州。双方共同提出修建321国道富禄至从江公路，各自做好前期工程，分别向省区汇报。这次会议，三江方面是我和贲政林同志参加。从江县方面是潘全孙副县长和交通局刘彦副局长参加。会议决定由三江、从江两县共同派出代表一起赴京向国家交通部请示汇报。会后两县领导曾多次深入现场，进行实地勘察，组织技术队伍测量设计。富禄至从江全长36公里，三江境内33公里，从江境内3公里，按四级路上线设计。我和贲政林同志带设计预算材料向自治区交通厅汇报，得到交通厅的支持，同意我们上北京汇报。我和贲政林两人从南宁乘飞机飞往北京，在天上飞了3个半小时。我是第一次乘飞机，心情很激动，于是随手写下一首诗：

长空高处览神州，无限风光眼底收。
山河壮丽多欢乐，经济腾飞跃大秋。
为通富路京城上，继把强邦国道修。
同机喜有丹丹爷，一路欣情进燕幽。

我们到北京时，从江的同志也已到达。我们于是就联合向国家交通部有关部门作了汇报，得到交通部的支持，同意投资一部分，自治区扶贫口和区交通口也要投资一部分，但要求我们修改设计，把原先的四级线路改为三级线路。这样，我县又组织设计人员修改设计。这段路于1992年1月开始动工，到1997年12月建成通车。这样，盼望了40年的321国道古宜至从江全长108公里的公路终于全部建成通车。我于1991年退休，未能亲自参加富从公路的工程施工，但我为能亲自参加这段路的各项前期工作，并亲自上京求援落实这项工程，在离岗之前还能能为三江公路建设做了这么一件有意义的事而深感自慰。

2004年9月

回顾重新工作的第一步

何汉昌

1977年3月27日，根据林溪公社办公室通知，我到中共三江县委组织部报到。接待人邓义贤同志将中共柳州地委关于我的重新处分决定念后并交给我看。此文发于1976年9月20日。接着邓义贤转告说：“县委已研究决定安排你到同乐公社为工作员”。让我等待和期盼多年的日子终于到来，使我感到高兴和激动。

因多年未回家，我需要看望年迈的父亲，于是请假两周，没有马上赴同乐。待我从柳州返回再次到组织部时，邓义贤则告知：因工作需要调我到溶江公路指挥部工作，但工资关系及粮、油供应在同乐公社。

从地委发文决定对我重新进行处分半年后，县委始给恢复工作，可以想像阻力还不小。为此，我必须迈好重新工作的第一步，要经得起考验，用事实来证明自身的价值。

1977年4月15日我满怀信心地从古宜乘船到良口（公路指挥部驻地）。安顿好住处后，17日我带了有关手续步行30华里到同乐公社报到，领取当月工资和粮、油票并于当日返回良口。

当时指挥部的领导为钟玉湘（县革委副主任）及宋庆海（县财办副主任）。工作人员有：秘书潘坤志，会计梁庆锡，出纳兼总务朱金屏。施工组负责人严第才（县人武部副科长），工程技术人员除县交通局数人外，主要来自县森工局，如夏福成、梁世忠、荣国义、小赖、小管以及小何、小刘、小张、小周等几位年轻姑娘。后勤组负责人韦献达（县森工局长），人员有：黄绍隆、荣国清、廖可山、张怀祥，我亦分配在该组工作。至于公路医务室人员则由县人民医院派医生轮流担任，如周玉琼、曾建莲、温美兰等均到那里工作过。

为了弥补多年未工作的损失，一到工地，我的心就沸腾了，无论份内份外的工作均主动去干。不少人对我调来溶江公路指挥部工作表示高兴。可是也有一些同志不理解，有的冷漠相待，有的趾高气扬，用一种看犯人似的目光审视我。但我不在乎别人如何，对我这个刚恢复工作的人来讲，难免别人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何况当时“文革”余毒还没有彻底肃清，只要自己把工作搞好，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人们的误解是会逐步消除的。

不久，宋庆海交给我一项任务，到老堡火车站盖一座临时仓库，并要求在半个月内即水泥运达之前完成。接受任务后我立即带上良口大队民工连梁连长直赴老堡火车站，仅用两天时间就把仓库地点及相关手续办妥。接着从良口大队民工中抽调15人前往，到老堡后借住在火车站附近榕树坪村的群众家里。我与民工们一起吃住、劳动，经过大家一周的辛劳，一座可容纳100吨水泥的临时仓库终于提前建成。当水泥运抵时，我还组织民工将水泥卸车入库，为公路节省了一笔费用。由于任务及时完成，宋庆海还特地给予表扬。

为加快筑路进度，我建议使用人力车代替人挑肩扛的落后方式。领导也认为这个办法好，但担心人力车购回后无人会安装，车子坏了没人懂修理。我被开除期间曾在林溪开过

修理店，那时正值农业学大寨，大搞造田、造地，几乎每个生产队都有人力车，凡安装修理均离不开修理店。所以，我早就熟练掌握这方面的技术。我当即向领导表示：可在筑路民工中抽调几个人，由我教他们。所抽来学习的青年民工均有些文化而且肯学，只半个月时间，就把有关安装修理的技术学会了。当时学得最好的吴家文，后来成为民工中的骨干，长期留在公路指挥部做保管工作。技术骨干培训之后，工地即用上了人力车，对加快施工进度起到一定作用。

同年6月，潘坤志擅自作主，调我接替廖可山搞公路仓库保管。此举因未经公路指挥部领导研究同意，因而廖有意见。我除了服从并把仓库管理得井井有条外，还抽出时间协助韦献达管理好后勤工作。当钟玉湘抽回单位工作后，公路指挥部也从良口搬到洋溪，不久宋庆海也调回县里。此时，溶江公路指挥部由韦献达负责。而公路后勤组的工作则由韦献达决定交给我负责。

溶江公路属民办公助性质，经费主要来自林业部门。自治区公路交通管理部门每年虽拨一点资金和数量有限的钢材、水泥指标，但这只是杯水车薪。公路上用的大量物资主要靠自己去找或用木材进行串换。但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要想搞到非常紧缺的钢材、水泥谈何容易。当时公路指挥部物资采购员是黄绍隆和荣国清，而荣是县政府办公室人员，缺乏这方面经验。为加强公路物资采购工作，黄绍隆提议调我搞采购，荣国清做仓库保管。从此，我和黄绍隆长期在外做公路物资采购工作。

黄绍隆和我彼此了解，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根据工作需要，我们有时结伴出差，有时单人独行，工作虽然辛苦劳累，但心里是愉悦的。当年我们常驻柳州、融安，还有柳州地区各县和罗城、玉林、北流，湖南省城步县也是常往之处。有时还到自治区交通部门恳求钱、物，忙得像车轴似旋转不停。在计划经济年代里，生产资料全凭计划指标供应，不仅钢材、水泥难以找到，连车、船票的购买及找投宿地点也非易事。由于我们有一股韧劲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又灵活地把握时机，筑路需要量最大又最难得到的水泥、钢材，我们都源源不断地采购回工地。有时我们到自治区或地区交通局请求拨给指标，有时则用木材串换钢材。在采购水泥方面则采取打时间差的办法解决。每年秋、冬两季各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水泥供应紧张，此时我们不忙于进货。待春、夏季时水泥供大于求，生产厂及物资局仓库爆满，此时我们却轻而易举地把水泥购回存于仓库待用。

1978年春施工正忙，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区交通厅求得水泥100吨、钢材6吨的供应指标。然而，当我们到北流交通水泥厂联系提货时，厂方却要我们先到南宁火车站办理计划外调运车皮，而到南宁办车皮计划时，又被告知必须得到玉林火车站进站货位许可方可行。当我们到玉林火车站联系时，该站则强调目前急需调运农药支援春耕生产，无货位供堆放水泥予以拒绝。

按当时规定，分配的水泥指标如过期不调货将作废，几次联系无功往返，真让我们心

急如焚。这批水泥如果运不回去，不但显示我俩无能，而且将严重地影响工地施工，怎么对得住三江人民。后来我们打听到区交通厅在玉林火车站有一位驻水泥厂干部，专门负责各地交通系统水泥调运工作。此人姓何，原籍广东，系一名复员军人，原则性较强，一般相求不易。因为当时铁路运输条条框框较多，车皮难要，尤其是计划外车皮，无特殊情况或一般单位基本不予批准。所以得指标无车皮运输亦等于零，那份调拨令只能是一纸空文。为此，求他办水泥运输者络绎不绝，什么样的采购员都接触过。我们此次求他相助仍按常规必然无门，一定要以一位比普通采购员身份更高的领导干部才行。于是，在与其相见自我介绍时，黄绍隆谎称：“何汉昌是三江县交通局及公路指挥部领导，原来还当过公社书记”。因我与其人同为何姓，而且又是广东同乡，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一下就拉近了。经过交谈，知其妻儿均在农村，目前需要购买一台缝纫机，当时缝纫机是凭票供应的，而此事对于我们来说却并不难，黄绍隆即高兴答应下来。回县后经宋庆海批准，在三江县百货公司购了一台并托运至玉林给他。结果，他不但把缝纫机款汇来，并连续给溶江公路指挥部发运两个车皮水泥，共计 120 吨，从而缓解了工地的水泥之急需。

筑路需用的另一项重要物资是炸药、雷管及导火线。此类爆炸物品均系计划专用，且管理非常严格，采购必须经县公安局审核批准并要专人专车运送。三江县物资局的爆炸物品主要供县内造田和修水利使用，公路用量大的时候县物资局就无法解决。幸好黄绍隆连襟张秉顺是融安县物资局长，该局辖下有一座化工厂生产炸药。在张局长的支持下，不仅保证了溶江公路爆炸物资的需要，还尽其所能提供了数量不少的水泥供公路使用。如 1978 年冬溶江公路搞大突击，杨文朴任指挥长，指挥部设于勇伟，近 2000 民工上马，需要大量的爆炸物资，时间又紧，此时黄绍隆却另有任务外出调运水泥，此任务落在我的肩上。我赶到融安找张局长求助，他不仅批准供货并亲自安排该局专车为我们送货，由我跟车负责押运。由于爆炸物不能同车装运，同时又需在长安、珠玉两处排队待渡，每天只能运一至两趟，共花了三天时间才将需要的爆炸品全部运抵麻石电站坝首，再由公路指挥部派船转运至工地，顺利地解决了施工中的一大难题，也可说是解了燃眉之急。

为感谢融安县物资局对溶江公路的大力支援，1979 年，溶江公路指挥部特制一面锦旗相赠，以示三江县各族人民的情谊。随着公路施工的进展，指挥部亦不断迁址，先是到洋溪，接着迁到勇伟，而后再上高安，最后到达富禄。在指挥部不断搬迁的同时，指挥部领导也像走马灯似一个接一个地轮换。我这个普通一兵，是在韦献达的工作交给杨坤德接任之后，于 1979 年 8 月离开溶江公路的。我共干了两年零四个月，终于迈出了重新工作的第一步。据我的记忆，在溶江公路任过指挥长的人有：钟玉湘、宋庆海、杨文朴、兰德茂、韦献达、杨坤德、雷通明、赵元姣、李剑飞等 8 人。历时 7 年才把这条由产口至富禄全长 39.6 公里的公路基本修完。

2003 年 6 月

在企业局工作的岁月

何汉昌

1978年10月，公社企业科改为三江县公社企业局，贲政林任局长。由于公社以下的手工业合作社全部划归企业局管理，故原手工业局副局长杨正安调企业局任副局长。同时县矿产公司亦划归企业局，原矿产公司经理张贤哲亦调任企业局副局长。当时除正、副局长外仅有秘书杨千益，毫无疑问企业局是急需增配干部的。

上世纪50年代我调到三江工作即与贲政林相识，后来他在林业科我在农村部，以后又都在基层工作，相互间比较了解。我恢复工作后，安排在同乐公社，实际上在溶江公路指挥部工作。当企业局需增人时他想到了我，贲政林就我的调动问题征询我的意见时，我立即就应允了。经分管该局的县计委同意后上报县委组织部批准，我于1978年11月由同乐公社调县企业局。由于当时正值溶江公路搞大突击，全县抽调近2000民工修路，指挥长由杨文朴担任，后勤工作任务繁重仍需留在公路工作。

经贲政林一再要求，1979年8月我始从溶江公路指挥部回企业局工作。由于我长期搞党群工作和在基层，加之被开除期间多年未工作，对于经济工作是非常陌生的，尤其是企业的经营管理在脑子里更是一片空白。恰在此时，地区企业局在沙塘农经干校举办业务学习班，让我有机会在那里学习了一个月。不久又到自治区企业局在百色地区田阳县开办的经营管理培训班学习一次，而后还到广西经济干校农经系企业管理班学习一期。经过几次学习，始初步懂得有关经营管理的一些概念。后来在工作中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业务才逐渐熟悉起来。

1979年12月13日中共柳州地委组织部第二次下文改变对我的处分后，即我调入企业局一年之际，经贲政林力荐，中共三江县委下文任命我为县企业局副局长。此前张贤哲调出。加上杨千益病休，局里只有正副局长共3人了。企业局成立之初仅有矿产公司，随着业务的发展，相继成立供销公司和建材公司。同时属企业局领导的尚有公社（镇）企办12个和良口栲胶厂，人员显得非常不足。于是1979年底及1980年分别从丹洲运输社、斗江木器厂吸收韦鼎勋、黄桂枝到局里工作。

1980年10月，我有幸第一次参加在四川成都召开的全国社队企业产品展销会。与我同行的还有三江县企业供销公司副经理曾文钦同志。这次展销会真使我们大开眼界。根据三江县油茶多的特点，在地区企业局的大力支持下，我们首次从万县江东机械厂订购液压榨油机10台，此举令地区与会的同行愕然。至1984年已在全县推广使用达60台之多，加上县农机局又从湖南吉首引进一批，这样，三江县原用的手工木榨基本被淘汰。

液压榨的推广使用，不仅使榨油进度大大加快，使过去排队等榨油的现象一去不复返，出油率也明显提高，每佰斤茶籽出油量达17至18市斤，比土榨多出油2至3斤，而且油

的质量也提高了。这一科技成果被评为三江科技二等奖和柳州地区科技成果三等奖。邓星荣、吴顺信、何汉昌为该项成果奖的主要获奖人。

1983年4月，应江苏省沙洲县（即现在的张家港市）、江阴市、泰兴县之邀，由三江县县长杨文朴率领，一行8人（计委熊振铎、林业局吴家英、企业局何汉昌、供销公司曹积干、古宜镇郑继先，古宜公社韦祖亮、丹洲公社罗权）赴江苏进行考察。经过协商，与沙洲和江阴月城分别签订了办针织厂和办红砖厂协议。

在建针织厂方面，由沙洲提供设备、原料及负责技术培训。此项目较为简单，投资亦不大，我们把企业局楼下空闲的房屋改建为厂房，当年即投了产。当时不仅安排了一批劳动力，还获得一些利润，产品畅销柳州、融安、宜州、贵州等地。

对于红砖厂的建立，由江阴月城派来技术人员，并投入购置设备的资金，三江县则以优先供应木材给月城作为补偿条件。此项目因投资较大，技术也复杂些，并牵涉到方方面面，拖至1984年秋始基本建成，于同年冬正式投产。

然而，社队企业的发展并不一帆风顺，改革开放之初社队企业刚建立时是受到限制和排斥的，市场上无社队企业产品一席之地。如供销公司出口寿板业务，先是按比例从外贸部门分到一些外汇，我们用外汇从广州购进一批华南牌缝纫机及台湾产的自行车。由于当时执行计划经济，这些商品非常紧缺，均凭证供应。得知社队企业从广州购回缝纫机、自行车时，三江轰动了，大家都想购买。但是县财办却下令要将这批商品全部交由县百货公司销售。为抵制县财办的横加阻挠，购入的缝纫机、自行车运抵柳州时，干脆放在柳州地区企业供销公司，欲购者凭三江企业供销公司开具的证明自行到柳州提货。后来县财办只好不了了之，由社队企业将这批商品销完。

为了发展社队企业，从自治区、地区到县，不仅有文件规定社队企业可以加工经营木材，而且计委还下达木材指标供社队企业加工使用。可是林业部门却死死卡住，从指标调拨到加工成品或半成品以及到销售调出均不予合作，给社队企业这一新生事物的发展增加一定难度。为缓解矛盾，我们除向县里主要领导汇报反映情况外，同时还利用县委、县府召开公社领导干部会议之机，邀请县有关部门领导就社队企业工作进行座谈，通报情况，反映存在的问题，争取大家重视和支持社队企业工作。

对于利益相关的部门或单位，我们采取利润均分的办法，将阻力变为助力。如寿板出口利润较丰，但牵涉面广，仅社队企业一家是无法完成的。不仅要让外贸得利，对林业部门也要在利润中给予分成。结果各方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比较顺利完成了出口任务，这是柳州地区其他县所不及的。

由于我们利用三江的木材优势及旧房改造之机，办了一批木材加工厂及出口了几批寿板，当时三江社队企业确是红火了一阵，并为企业积累了资金。在贲政林的积极努力下，克服诸多困难，不失时机地为企业局与供销公司建了一幢房屋。此乃为职工谋利的好事，

是累功积德，老贡功不可没。

在三江县党委政府的领导、支持以及社队企业全体干部、职工共同努力下，三江县社队企业由 1978 年的 208 个，总产值 218 万元发展至 1984 年的 474 个，总产值 582 万元，无论企业个数还是总产值均翻了一番。当时，虽取得一些成绩。但也存在许多不足。令我感到自责和遗憾的是，没有把良口栲胶厂处理好。为保住这个厂，贲政林同志花了不少心血，不知跑了多少地方，做了多少工作，吃尽苦头但仍屡屡败北。每次研究该厂问题，他均坚持要办下去。有利条件虽然很多，但困难并不少。经过我几次深入该厂调查，除技术问题外，诸如产品销路、原料收购均存在问题。设备也残缺不全，不配套。首先能源不足，产口电站所供之电仅够照明，不但要自备发电机组，还要添置一台 2 吨锅炉。至于管道、抽水设施、原料粉碎设备均要更换，这就需要一笔不小投资，银行能否继续给予贷款？其次，管理人员素质太低，也可说毫无管理能力，而且在经济和财务上还出现一些手脚不洁的蛀虫。尽管如此，贲政林仍信心十足。既然他从始至终热情不减，我也不便多说，使本应下马停办的良口栲胶厂仍盲目坚持下去。三江县农行也因处于骑虎难下之势，经协商并由企业局作担保，又再次借款 30 万元。

为解决良口栲胶厂技术上的难题，我不仅数次跑湖南吉首栲胶厂，还请侯顺清副县长及计委熊振铎主任亲自出马，希望通过吉首市政府获得支持。后来我又去了一趟湖南邵阳市栲胶厂，但仍无功而返。1984 年 7 月，我调出企业局，不久调离三江。现在想来，当时如能像对塘库陶瓷厂一样痛下决心，果断将良口栲胶厂下马，黄庆培同志接任后就可以避免重蹈我的覆辙。

2003 年 7 月

附诗两首：

友人感怀

彼此相识在三江，五十年来情未忘。
妻儿^①下乡居贵府，公奶^②关怀美珍^③忙。
含冤受屈知音少，唯有贤弟情义长。
力荐卑职为助手，共促乡企创辉煌。

贲政林同志 2001 年 1 月 8 日写于柳州

和汉昌兄《友人感怀》

亲如手足话沧桑，患难相携岂能忘。
寒舍结缘情永在，古稀勤作健身忙。
儿孙有志天伦乐，长幼同心福寿长。
回首当年成往事，唯期后起创辉煌。

贲政林写于 2001 年 1 月 15 日。

注①：1959年初我与妻子第二次下放丹洲，妻儿住七星屯贲政林家里。

注②：贲政林的父母亲。

注③：贲政林的妻子。

三江县粮食购销之变迁

赖守基

三江侗族自治县粮食管理部门，自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粮食购销、调存、加工等环节，在各个年代中也不断发展变化，现就解放初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购销经营业务，撰文简述如下。

一、粮食征购、双超、议购

解放初期，党和人民政府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减轻农民负担，废除了旧的田赋制度，合理调整了农业税征收政策，由以往的赋额征收改为按田亩常年产量依率征收。

（一）粮食征购

征收公粮是把农业税收变为征收粮食，俗称“交公粮”，由粮食部门代为接收实物，简称“征购”。然后作价划转财政部门，缴入国家金库。

我县公粮征收，建国初期依照中央颁布的《农业税暂行条例》规定，采取累进税率，以户为单位，每年征收一次。1950年，征集办法以地、富为对象，专事征集粮草，供过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机关工作人员之用粮。

1952年，开始贯彻执行“查田定产，依率计征，依法减免，逐步实现统一累进，并取消一切附加”。在经济恢复时期的公粮征收，采取一次计算，两次征收的办法，征收率最高为4.2%，最低为3%；对灾区农民，革命烈、军、工属，老弱、残废、鳏寡孤独，根据情况少征或不征。

1955年，全县推行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原来的个体经济，逐步走向集体经济，公粮征收方法也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采取了由农业生产合作社负担和分户负担，集体交纳的方法。根据“先公后私，兼顾私人”的原则，基本上做到减免合理，照顾得当。

1958年和1959年，公粮征收，废除累进税法，按常年产量规定税率计征。但是这两年由于浮夸风的影响，我县出现了追求“高速度，高指标，高产量，高征购”，实行“全购全销”政策，结果1958年征购粮食1642万斤，占总产的31.5%，比1957年增加1185万斤，1959年征购粮食1830万斤，占总产的35.7%，比1958年增加188万斤，比1957年增加1373万斤。由于这两年征得较多，购了“过头粮”，后来又实行全销。1958年，国家对农村统销粮食达2649万斤，1959年统销2801万斤。事后，总结了经验教训，纠正了浮夸风，使农业生产恢复了元气。

1965年，开始实行粮食征购“一定三年”不变的政策，至1971年改为“一定五年”

不变。1979 年进行调整，实行起征点的办法，把征购、双超，按前三年的平均产量计算，一并协商一次落实到生产队。人平均口粮在起征点 500 斤以下的，免征公粮实物，以扶持贫困和后进社、队，尽快发展生产。

1985 年，取消粮食统购，实行“合同订购”，公粮征收也纳入“合同订购”数内，除因灾和国家建设征用土地作部分调整外，其余依旧不作变动。

（二）双超、议购粮

1964 年，我县开始实行超产超奖（双超）和议价粮收购。自治区确定我县为山区县，并对山区粮食经济政策作了适当调整，不要求提供更多的商品粮，放宽了起征点，规定人均口粮在 600 斤以上，完成征购基数任务后，还有余粮者，通过协商，动员出卖双超粮。

国家对超购的粮食，实行加价奖励和奖售化肥的办法，从 1964 年起，生产队每交售 100 斤超购粮，奖售化肥 5 斤，布票 2 尺；1965 年按生产队人均提供超购粮超过 100 斤者，超过部分，按统购价再加 12% 收购；1968 年调整双超粮的奖励办法，每百斤双超粮，以 50% 奖售化肥，每 3 斤双超粮奖售化肥 1 斤，50% 按统购价加 30% 收购；1972 年，每 100 斤双超粮奖售化肥 25 斤，价款全部按统购价加 30% 收购；1979 年，每 100 斤双超粮奖售化肥 50 斤，价款全部按调整粮价后的统购价加 50% 收购。

我县双超粮的收购，重点放在生产条件较好，口粮水平较高的古宜、丹洲、斗江、林溪、良口的部分生产队。1970 年以前每年收购在 5 万斤以下，1971 年至 1972 年，达 7 万至 15 万斤，1973 年至 1983 年，除收购量最高的 1975 年达 71 万斤以外，其余各年收购量在 20 万斤至 40 余万斤之间。

议购粮。在征购和双超计划以外，粮食部门向生产队议价收购，价格上略高于双超粮收购价，最高不超过统购价的一倍。这部分粮食在县内收购甚微。为了解决三江粮食的紧缺，从 1963 年起，三江县粮食部门，组织一批采购人员，分别到江西、河南、湖南、湖北、贵州等省产粮地，购入部分议价粮食，作农村生活安排和调节市场需求。1963 年至 1972 年，年输入量在 1 万斤至 5 万斤，1973 年至 1981 年，年输入量在 10 万斤至 40 万斤，1982 年，议价粮敞开供应后，年输入量从 200 万斤增至 400 万斤，最多的 1984 年达 461 万斤。

二、粮食销售

1952 年以前，粮食管理机构虽已建立，但尚未健全。国营贸易公司，供销合作社，各集市私营商业，均经营粮食。1952 年下半年，成立三江县粮食购销组，并在县城古宜设立粮食门市部，开始粮食购销业务。1953 年，成立三江县粮食公司后，取缔私营商业经营粮食，县以下各区的粮食购销业务，委托供销合作社代经营，付给 3% 的手续费。1954 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收回由粮食部门统一经营管理，国家对居民口粮、农村统销、行业用粮等各项供应，制定了明确的供应政策。

（一）农村粮食统销

1954年，三江开始实行农村粮食统销，规定自产口粮不足380斤者，为缺粮户，按实有粮不足部分，经农户或生产合作组织评议，粮食部门审查核定，发给统销证，一年一定，按月供应。

1958年和1959年，由于按虚报产量征购粮食，购了过头粮，加上集体食堂初期实行“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不注意节约粮食，从1959年7月以后，农村出现粮食紧缺，致使社员身体素质下降，浮肿、干瘦、妇女闭经等病人日渐增多。

1962年，国家重新规定，人均口粮不达400斤为缺粮户，1971年又调为人均口粮不达420斤者为缺粮户。自足队人均口粮定为420斤至500斤；余粮队人均口粮定为600斤，从“一年一定”改为“一定三年”，后来又改为“一定五年”不变。属于人为缺粮的，如婚丧喜庆宴请宾客导致缺粮者，采用借销的办法，按夏季借秋季还或今年借明年还的原则，分户发证，按月供应。

1955年以后，农村人口参加国家组织的修筑公路、铁路，兴修大型水利等各项基本建设工程，按从事工种的口粮标准与实际口粮标准比照，差额部分由国家补助供应。到1985年底止，此项销售共计3400多万斤，销量最高的为1970、1972、1973、1985年，年销量超过400万斤，其余各年销量在100万斤之内。

（二）奖售粮

从1960年起，国家收购的部分农副产品，按收购数量、奖售标准，给予奖售平价粮食，三江收购的主要农户产品有：茶油、木材、生猪、桐油、毛竹、香菇、冬笋、木耳、中药材等。

1961年，奖售粮占农村统销口粮的5.7%，1972年增至22.9%，1979年超过统销口粮24%，1981年和1982年分别超过农村统销口粮18%和26%，1983年后逐步缩小奖售范围，降低奖售标准，所占比例下降。从1985年4月1日起，取消农户产品奖售粮。

（三）城镇居民口粮

从1954年起，城镇非农业人口口粮，开始由粮食部门供应，机关干部、居民凭户口簿，流动人口凭证明，每人每月限量供应30斤，重体力劳动者不超过45斤。

1955年，三江对城镇非农业人口，实行以人定等，以等定量，发给口粮供应证，凭证按月供应口粮的办法。

1956年6月1日起，对定量标准系统地进行调整，体力劳动者分三类九等，每月供应最低30斤，最高54斤；干部及脑力劳动者30斤；高、初中学生32斤；居民分十一等，最低为不满一周岁定量6斤，最高为十周岁以上居民定量供应26斤，统一由粮食部门核发购粮证，按月供应。

1959年，机关干部及脑力劳动者，高、初中学生，每月定量节减3斤，体力劳动者节减2斤。

1970年以后，体力劳动分三类八个等级供应，最低30斤，最高50斤，机关干部和脑力劳动者分县城供应29斤，乡级供应30斤，高中学生供应33斤，初中学生供应30斤，居民定量标准不变。

1993年6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经济、市场起了新的变化，粮食部门干部、工人开始下海分组承包经营。与此同时，取消了城镇居民粮食定量供应，改为议价粮食敞开供应，粮食自由经营辐射到每一个乡间角落。

此项粮食销售，放开前经营量最高为1972年，达1636万斤，最低为1955年，为223万斤。其余各年在1000万斤以下。

（四）行业用粮

从1955年11月起，工业、手工业、酿酒等行业用粮，由生产单位根据市场情况，编制生产计划，经主管部门审查，粮食部门核准后，按月凭证供应。熟食、糕点、食品等行业用粮，分为县城按非农业人口，集镇按非农业人口和农业人口，以上级核定的人均供应量由生产单位编造用粮计划，由县统一核准，粮食部门按月定量售给生产单位，作铺底粮。分凭票供应和免票供应小食品两种，收粮票供应的食品共有12种，如：米饭、米粉、面条、烙饼、馅饼、饺子、馒头、花卷、米粽、发糕、饼干、面包等。城镇工商行业用粮中，以熟食行业最多，其次是副食品、糕点、复制和酿造行业。

供应量最高的为1983年达253万斤，最低的为1960年26万斤，从七十年代起，年供应量在150万斤左右。

（五）饲料粮

1955年以后，对国营良种场、畜禽场、食品公司、外贸公司、供销合作社收购的商品猪、家禽、专业饲养场饲养的家禽，农民饲养的种猪，以及国家以粮换购生猪，均由粮食部门按照规定，以统销价格供应饲料量（原粮），或以原粮折杂粮、米糠粉、地脚米。

从1985年4月1日起，我区取消生猪派购，放开购销价格，除对食品公司库存的部分猪禽，按平价供应饲料粮外，其余一律供应议价粮。

此项粮食供应数量，由1956年至1970年，为1万斤至4万斤，从1971年至1985年，为7万斤至28万斤，其中最高的1984年，达53.89万斤。

悠悠侗乡情

梁启雄口述

梅岭整理

说来话长，那是1968年12月，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浪潮，把我们柳州高中“老三届”毕业生60多人，送到桂北山区的侗乡——三江斗江公社牙林大队插队。在这里，我们向农民学种田，和他们一道挖山，修水利，打炮眼，进猪场养猪。尽管生产劳累，生活艰苦，半月不见一丁肉，但我们这批无牵无挂无忧无虑的俊男俏女，却像早上的麻雀，叽叽喳喳

没个停歇，生活倒也愉快，社员统称我们为“柳插”。1970年初，县里要举行文艺会演，消息传来，大家欣喜若狂。本来嘛，我们这批“柳插”中有不少人是班里的文艺骨干，有机会就想露一手，但演什么呢？一时又鸦雀无声。那年代，样板戏占上风，跟着演嫌雷同，大家一合计，要标新立异，演农村题材，于是就集体创作了表演唱《养猪场里炼红心》（下称《炼红心》）。白天尽管累得腰酸骨痛，晚上锣鼓一响劲头就来了，排练时社员也挤满四周观看，欢声笑语满山寨。

《炼红心》由于题材新，表演活，在县、地（柳地）会演中一炮打响，荣获优秀节目奖，并选送参加1970年11月的全区文艺会演。结果《炼红心》又脱颖而出，与防城县的歌舞《织鱼网》同获全区优秀节目奖。广西电视台还拍摄了专题片在全区播放，轰动一时，“柳插”的名声也因此传遍全区。

自治区会演后的1971年初，“柳插”中就有李冰、邱哲玲、黄光中、梁雅、罗地保、肖岳明和我（梁启雄）共7人，幸运地被吸收为“三江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员，走上了专业之路，正式开始了我的文艺生涯。这些往事，怎能不铭记于心呢。几年后，其他“柳插”先后调离三江，而我一干就是20多年，与三江的同行背行李，挑道具，走遍侗乡苗寨，青春的热血沸腾在艰苦的岁月里。当年专演丑角的我，“四类”、“兵痞”、“流氓”……非我莫属，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坏”印象，连乡下娃仔见了都喊我是“坏蛋”。其实“坏蛋”并不坏，台上演“坏人”，台下是好人，我曾多次荣获县、地优秀演员奖、导演奖，双人舞“捶布声声”还获全区优秀导演奖。1988年后我担任三江县艺术团团长，曾带队到北京、上海、郑州、武汉等地演出获得好评。直到1995年，我才调离三江，也是最后一个离开侗乡的“柳插”女婿。

2004年8月5日

关于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工作的汇报

龚 义

县农办并县委领导同志：

下来20天了，除到县和公社开会外，在大队实际工作只有十天，现将当前最突出的情况汇报如下：

全同乐公社19个大队，公社领导决定把它划分为三种类型并采取三种不同的做法。东边山和沿河8个大队为第一种类型，这一类型不准搞包产到户；条件稍差的3个大队为第二种类型，这一类型大部分队不准搞包产到户；西边山的8个大队为第三种类型，这一类型允许他们搞包产到户。公社的工作重点放在一二类型地区，元旦过后已把西边山的干部抽出，加强了东边山和沿河8个大队的干部力量。从现在的情况看，在这8个大队工作的成效并不好，除同乐八队同意搞专业承包，还有10多个生产队同意搞分组作业，联产计酬

外，其它大队绝大多数生产队仍坚持要搞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可以说，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有的群众说：“不给搞（指包产到户），你们（指公社）也让我们试一年嘛！”对此，公社领导的态度是：“不能放松。”因而，当前出现了公社干部和群众（包括大队以下干部）顶死牛的状况。公社干部今天扭，明天扭，扭到群众放弃搞包产到户，思想通了为止；群众则坚持要搞包产到户，死也不通。无奈，公社干部采取了威胁的办法，如公社某领导去归东大队某生产队做动员工作时说：“你们生产队要统销粮这么多，如果你们仍坚持要搞包产到户，以后政府就不管你们了（暗示不给统销粮）。”这一招果然厉害，这个生产队的群众只好口头上答应不搞包产到户。他们说：“公社领导要我们这样搞，我们有什么办法。”但他们并不积极行动，而是在那里观望。村看村，队看队，岑甲大队的干部、群众则公开和公社干部顶。一次开会，在讨论时有人发牢骚、讲怪话说：“讨×嫌，扯×淡，做人是你们，做鬼也是你们。”（注①）大队副支书×××去公社开会汇报情况时公开质问公社领导：“上级讲不搞一刀切，不搞一个模式，你们在岑甲对所有的生产队一律不准搞包产到户是什么政策？”现在总的情况是消极对抗。有两种对抗形式，一是口头上答应“政府实在不准搞包产到户我们就不搞了，还是要听政府的”，但搞其它形式的责任制又不行动，不制订方案，甚至不参加开会，一天拖一天，认为你们工作队总有一天要走；另一种对抗形式是，明搞包产到组，暗搞包产到户，如有的生产队把原来搞包产到户的田合并起来就算是包产到组的方案，其实各户分得的田不变，方案是应付上级的。同乐大队是搞落实生产责任制的试点大队，直到现在大部分生产队的责任制仍未落实，工作队宣布工作已经结束，撤离大队后，各队又各搞各的。由于以上情况，危害很大，第一种类型 8 个大队的干群思想混乱，生产无人搞，造林无准备，政府号召种马铃薯，群众说是“还不知道在哪里种，现在去种还不知道种给谁。”这与西边山 8 个大队轰轰烈烈的冬季生产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到同乐后，也想和公社干部一起，按县委和公社领导的意图，尽可能做些引导工作，在东边和沿河 8 个大队不搞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但现在看来，成效几乎没有。考虑到如果再这样下去，只会坐失时机，错过季节，今年的农业生产将难以设想，因此在公社党委会上，在和公社主要领导个别谈话中我都提出了这个问题。我的意思是，现在是当机立断的时候了，如果做工作实在不通，就不要再勉强，如公社领导不便决定就请示县委吧。他们都感到为难，他们说：“还是要保住这 8 个大队，这 8 个大队不管任何地方松动一点就全都完了。”这样我就不好多说。因为，尽管我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我确实不知道县委的真正意图，自林同志又是县委副书记。（注②）我和工作队已经处在进退两难之境，要我真正去“扭”吗，我有可能用软或硬的办法，以不同的外表做出一些“成绩”来。但是，这样做我确实办不到，是自欺欺人。过去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要我顺应民情，放手去干吧，这无异于在东边和沿河 8 个大队的心脏——高武这里放一颗重磅炸弹，不仅同乐

八队搞专业承包保不住，就是已建立的十来个作业组也难免于土崩瓦解（这是当时汇报讲的，实际上还有问号）。这确属事关大局，不能不使我考虑再三，情况就是这样，何去何从，切望县委指示。（注③）

1981年1月5日于高武大队

注①：县工作队下到同乐之前，公社某领导曾放手让群众搞包产到户，甚至不让下去的干部参加生产队的会议，说是好让群众放手搞，曾几何时，又要“扭”了，故有“做人”“做鬼”之说。

注②：即莫自林同志，当时任县委副书记兼同乐公社党委书记之职。

注③：这个报告是1981年1月5日上午赶写的，当时一边写一边由胡奉将誊抄，并叫他当天专程送往县农办转县委领导，可是这封信上送后却石沉大海。

丹洲书院的来历及其演变

杨大彬

现在丹洲南门外一处畚地水沟上，横架着一座石桥。这座石桥，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据丹洲书院碑记载，丹洲书院系于清道光三年秋八月，由上瓮，斗江、琶团，独峒，古宜，丹阳、沙宜等地区人士捐资建成，并刊有黎平学府石亮玉也捐色银折价六千二百文。从这一史迹看来，丹洲书院涉及的人事地区，相当广泛，也绘出了三江县的前身“怀远县”的大致轮廓。曾听丹洲的前辈说过，丹洲书院是怀远县的学府，它的任务，是培植科举人材。它有一笔固定基金，一直传到解放前的丹洲小学。据说1852年，太平天国石达开部经过怀远，取道龙胜去攻打桂林时，有丹洲盐务官欧阳氏前往迎接并助军需。及太平天国失败后，邑豪绅杨某欲夺欧阳氏之妻，遂向清廷控告欧阳氏通匪，结果欧阳氏全家被抄斩，将其遗产谷400余担，长安铺租四间充归丹洲书院作基金。到了清光绪末年，有郑姓县知事（即县长）在书院前建作大门二重。进入重门，又建筑对峙着的南楼与北楼，与原书院相衔接。到了民国元年，改名为县立丹洲高初两等小学校。首任校长杨德芳将原书院三间改建为大礼堂，并建后楼一座，教室六间，图书室一间。又于隙地建造厨房、仓库、厕所等在后楼左右侧，辟体育场二处，总计校舍及活动场所面积约占地五百平方米左右。在南北楼两廊下，陈列各种花卉数十盆，校内还栽有桂花、紫荆花以及梧桐、扁柏等，点缀有致，景色清幽。当荣寿柏任校长时，置备科学仪器、图表很多，各科参考书二千余册。当覃季和任校长时，体育设施日臻完备。如：篮球、足球、网球、台球、跳高、跳远、浪桥、秋千、哑铃、球杆、甩棒、铅球、木枪、翻杠等，都应有尽有。乐器方面有风琴、铜鼓、喇叭。由于该校有充足而固定的基金，因而具备了师资好、校舍好、设备好等优越条件。也因为如此，外地如浔、溶、孟江各乡村，以及邻邑融县及贵州之从江，均有青年来丹洲求学。民国七年，省督学李苏同到各县视察教育，称誉丹洲小学为柳州八属的小学模范。可惜在

民国九年军阀混战时，云南胡若愚所率领的滇、黔、赣援桂联军（当时我们地方称之为红边帽）经过三江，将丹洲小学的教学设备盗走摧毁殆尽。后来（1943年），南北二楼又遭日寇焚毁，从此闻名一时的丹洲小学就日渐衰退，学生人数也日日下降了。民国二十一年（1932），唐文佐任三江县长时，统一全县教育财政，将县立丹洲高初两等小学校改名为三江县第一小学校，并将校产收归县有，统一支配，旋又涉讼拨回。及民国二十四年（1935）广西军阀反蒋期间，又改名为丹洲乡中心国民基础学校。当命名为丹洲高初两等小学阶段，其学制为初级四年分八个学期，高级三年分六个学期，其所习科目，初级有国文、算术、修身、习字、音乐、美术、体操等，高级则加英文、历史、地理、格致等科。及命名为三江县第一小学校时，高级改为二年（四个学期），初级班增加自然、社会、园艺；高级班的格致改为理科，后又改为自然，并增三民主义（简称党义），也有园艺。在美术一科里，兼授图画、雕刻、纸剪、制花，女生并授刺绣。及更名为丹洲中心国民基础学校时，科目同前，但高级班已除去英文，美术科亦只限于图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推行五年一贯制，至于校产，则因田租地租均在融安县境内，遂属融安处理，不复存在。

明清民国时期三江教育概况

吴大贤

明代以前三江民族教育的发展情况，没有方志文献记载。明万历年间，苏朝阳任怀远知县时，曾倡社学之议，“惜当日未行耳”。至清康熙三十三年甲戌（1694），知县廖蔚文踵苏公志，于古宜梓潼阁，仍绅衿讲学会之旧，捐廉六两，延师会课，以为联属人心，振兴学校之本，取名“振兴会”。每月会课二次，文字亲自评改。斯即本县义学之祖。至清道光三年才设立丹洲书院。

清乾隆四十年（1775），高步阳烂屯（原为怀远属地）龙从云等10人集资办学，到湖南通道粟团屯延聘宿儒粟正旺先生来设塾讲学。乾隆四十二年龙从云参加岁试，以第二名的成绩录取县庠。此后侗族地区才纷纷办起私塾。明清两代怀远县有举人14人（其中武举2人），贡生93人，廪生41人，庠生384人。

光绪三十四年（1908），丹洲书院改为县两等小学。宣统三年（1911），为适应倡君主立宪的需要，在丹洲三王庙设立自治研究所，学习研究地方自治法规，民刑新律和警察等科目。民国元年（1912），施行新学制。第二年县知事赵元杰在丹洲设立塾师研究所，指令私塾教师前往学习算术、音乐、图画、自然等科。这对提高教师水平，冲击旧的教育体制，推行新的教育教学方法，有很大的促进。

民国十七年（1928）县长梁士祯、教育局长荣冠英创办县师范讲习所，招生50人，学制一年。把县立丹洲两等小学堂改名为县立第一小学。后来又在古宜、富禄、林溪各办一所小学。

民国十八年（1929），开始划分学区，区设教育委员负责本区教育工作，区下分团，每团设学校一所，大团设若干所。

民国二十一年（1932），县治从丹洲迁上古宜。县长刘瑞麟，教育局长黄光昌在古宜县立第二小学校内开办师范讲习所，第二年，县长唐文佐到南宁聘请蔡挺生来任所长。民国二十二年（1933）在古宜大洲建设师范学校校舍 7 座，招收师范生一个班，苗、瑶、侗特别班一个班，学生共 100 人，毕业后到各村从事教育工作。

民国二十四年（1935），师范讲习所易名为三江简易师范。简师毕业生 43 人，“边师班”（苗、瑶、侗特别班）毕业生 32 人。全县 32 个乡镇均有一所国民基础小学。县财政每年拨给东银 22400 元，村街校 308 所，每年给补助东银 1800 元。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三江县简易师范改为三江县立国民中学。先后共办 9 个班，毕业出去的学生有 300 余人。历任校长有何鉴然、梁立言、李承晟、况琇等。

从 1946 年起，国民中学改为三江县立初级中学，三江国中第 13 班改为三江县立初级中学第 1 班。三江县立初级中学至 1949 年共办到第 8 班，并毕业 3 个班。

1949 年，全县有中学一所，学生 200 多人，小学 132 所，学生 5200 人，教职工 390 人。

清朝民国时期的富禄镇

赖守基

富禄镇位于溶江河畔，面积约 0.5 平方公里，南与融水苗族自治县大年乡毗邻，东北与贵州省从江县贯洞镇和黎平县龙额区交界，距县城 64 公里。清同治年间已具城镇规模，是当时县境溶江流域第一大镇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至今约有一百多年历史。

初始概况

清嘉庆年间，富禄是一个相当贫困的村落，原地名叫“寨塘”，苗语叫“养雍”。最初为苗民开发（即现今岑牙村苗族人民），后来杂居着数十户苗、侗族人家（在今小溪拱桥桥头一带），仅有几家小铺子，卖些糖烟和山货之类，群众日常所需要的生活、生产用品，则需要过河到葛亮去购买，每遇洪水到来，只有望洋兴叹。后有粤东木商陆续到来采购木材，往来的人骤增，同治年间不少客商到这里开设商店，生意一年比一年旺盛。这就直接影响了葛亮商业，原在葛亮经营的大、中商家，于光绪初年相继迁过富禄，使富禄市场更形繁荣，面貌为之一新。民国初年，葛亮成为当时的木材集散地，木材成交后，经济则集中于富禄市场流通，商业更为活跃，大大吸引粤、桂、湘、黔、闽五省商人到此来开设商店和从事小手工，大量经营人民必需的生活、生产资料，于是形成三江一个繁盛的农村集市。当时建有五省会馆一座（在今富禄汽车站市场中央），会馆大门楹联书：“汉、满、蒙、回、

藏五族；粤、桂、湘、黔、闽一家。”随着市场的发展，国民政府在此设有团防局、邮政代办所、电话总机各一个，团防局长赖树卿，又名赖胡子，富禄街人，代办所的邮戳为“福禄”，后来不知什么年代改为“富禄”。

全盛时期

富禄商业日益发达，市场繁荣，吞吐量大，成为当时三江一个重要的经济中心。在 1930 至 1935 年间为全盛时期，大、小商号，从河畔的大码头到内八街田墩里面，计有 300 多户。当时富禄分为外吉、内八、仁让三条街，大的商号有：广鸿昌、天发祥、泗诚、贞利元、福安昌、兴发隆、朱怡成，联安隆、联发昌、恒兴利、馀福、天利昌、裕民生、诚利昌、广兴昌、同发祥、福利昌，大兴、高悦来、鼎兴昌、合兴昌、同安、广升、联发等。他们与柳州、梧州、广州等城市有往来，行情很广，信息灵通，竞争性很强。回忆全盛期的原因，主要由于 1930 至 1935 年间，长江一带，军阀混战，武汉到贵州遵义一段的水路阻塞，从沪、汉入黔的物资无法运往，因而，改由广州进货，经梧州、柳州，过富禄，上溶江，转运贵阳。当时每天上下经过富禄的民船，都在 300 至 500 艘之间，停泊在富禄的龙塘滩底到葛亮寨脚，长约二华里。不通水路的县，如黎平、锦屏、天柱、三穗等县，则利用人力肩挑，每天到富禄运货的肩挑工人，每帮在 200 人以上，每天都有两三帮。他们挑来的有大米、桐油、茶油、烟叶和辣椒，挑去的是生盐、棉纱、布匹、丝绸、百货，天天一样，市场非常活跃，当时有“小长安”之称。迨黔桂铁路通车后，富禄的繁盛随之低落下来。

（根据赖松龄、赖云芝、王冠环遗稿整理）

民国时期的富禄教育

赖守基

富禄地处偏僻山乡，在昔教育稍形落后。自民国初年（1912），由广东退职还乡的前清岁贡，原广东肇庆县县丞赖国刚，在自家屋开办私塾，内设蒙经混合学馆，招生执教，名曰：“富禄私塾馆”。学生有来自良口、梅寨、匡里、葛亮、平卯、拱洞、大年及富禄当地的富家子弟。凡 12 岁以下儿童初读，均就蒙馆，名曰启蒙。塾师教之识字及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传家训》。之后升入经馆，读“四书”，“五经”，练习作文，赋诗属对。

赖国刚开馆教学，为师执教，训生类者十数辈，门下弟子百余人。此即为三江县属溶江流域开办教学之胚胎。

民国十七年（1928），当地绅士，前任区局长赖衡模、莫时中、何耀琳等，有慨于心，集全区人士会议，创建小学一所于富禄，称曰：“县立第四小学校”。校址在“三王庙”处，除将庙宇庙产扩充，并筹巨大基金，建宏壮之校舍，成绩卓著，蒸蒸日上。此乃为三江县

属溶江流域学校教育之始。

学校后更名曰：“富禄乡中心校”，因地故名，实属全区（石碑、梅寨、喇陇、匡里、富禄、高安、勇尾、高培、洋溪、良口）共有。

民国三十二年（1943），将富禄“同善社”房屋拆卸，移其材料扩建富禄乡中心校。

富禄小学第一任校长李春林（丹洲人士），历任校长有：张庆勋、赖少匡、曹绍瑚、潘有奇、杨敬贤、赖松龄、杨荫、赖宝基、朱绍先、莫宏伟、赖美基、石中玉、陈世家、朱维先、温富勋。1937年至1945年间，共毕业学生9班，158人，仅次于古宜、丹洲。

民国三十三年（1944），抗战疏散时期，从柳州疏散到富禄的“大道中学”，在富禄坚持办学，学校租借八百街伍文明的油榨房作教室，招收3个班，当时被该校录取的富禄小学毕业生有：赖宏基、陈显华、赖景升、赖瑞明、赖菊明、郑桂凤、赖桂兰、朱慧兰、吴国贤、吴国光、黄碧琴、韦乾（现名龙添培）、侯祖光、王美英、赖巧珍、赖永昭等。1945年8月光复后，该校旋返柳州市鹧鸪江原来校址。这批学生大部分到柳州、长安继续升学。

富禄小学的老师，多数是从外地聘请。当时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先进分子受聘，并以教师职业作掩护，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如：莫矜（化名莫勉真），通过当年桂林干校同学、时任富禄乡副乡长赖广基的关系，于1943年5月，进入富禄小学任教。接着通过时任富禄小学校长赖宝基的帮助，又找到几个教师的空缺，将莫芷凡、曾绍庆（曾景）安排在富禄小学任教。他们以学校为活动基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上街出墙报、演讲、演戏、教唱抗战歌曲等。1946年至1948年，受聘在富禄小学任教的还有：戴自振，邓鲁芝、陈世家、陈世裔、杨千里。接近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政府面临崩溃，教育经费无着落，教师工资无保障。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教师们仍然坚持教学，因而深深地感动了广大学生和家，不少学生家长，给老师送粮、送菜，请老师到家里吃饭。老师被迫转移时，师生在河岸船边，依依不舍，洒泪而别。

1949年，因局势动荡，富禄小学被迫停课。是年，在富禄开办四所私塾学馆。一所为周鉴庭（桂林两江人氏）执教，学馆设赖庆隆家二楼；一所为王均安（富禄人氏）执教，学馆设赖文昭家二楼；一所为朱维先（富禄人氏）执教，学馆设自家屋；一所为陆鼎（丹洲人氏）为师执教，学馆设方海庭家。四所私塾学馆共有学生约50人，年纪在十二三岁，都是原小学高年级的学生，在私塾学馆就读《幼学》、《中庸》、《孟子》等经典和四书。约开办四月余，富禄解放，小学复课，学生旋返母校。

（据赖云芝、王冠环、赖松龄、赖宏基等口述，部分为笔者本人所经历综合整理）

民国时期三江县两大米市

赖守基

三江县地处桂北山区，历来缺粮严重，每年需从毗邻的湖南、贵州两省输入始敷民食。各乡镇市场上的粮食，除极少数为县内自足略余上市外，主要靠从湖南省的靖县、通道县，贵州省的三都县、榕江县、从江县、黎平县等地，通过木船运输和陆路肩挑分别输入。民国二十二年（1933）以前，全县每年输入约 25000 吨。地近湖南、贵州两省以及河运方便的富禄、林溪两集市，粮食贸易比较兴盛，运销量为全县之最，古宜、独峒、良口、勇尾、丹洲、同乐、斗江、八江、梅林、老堡、洋溪、高安等集市次之。

富禄谷米市场

富禄位于溶江河畔，为民国时期三江县经济较发达之城镇，是县境溶江流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镇内人家约 500 户，主要从事商业活动，大小商店约 200 家，其中兼营粮油的大小商店 100 余家。水路交通方便，上至贵州省从江、榕江、三都诸县，下至长安、柳州、梧州、广州等城镇；陆路通往贵州省黎平、永从、锦屏、天柱、三穗诸县。由于毗邻贵州省产粮诸县，故形成黔桂边界谷米交易运销之商埠，素有“小长安”之称。

富禄谷米来源，分为两路，水路由贵州省三都、榕江、从江诸县，用木船运来；陆路由贵州省黎平县的中朝、潘老、龙额、水口，从江县的洛香、龙图、贯洞、云洞等地，肩挑上市。运输船只每艘载重三至五吨，由水路运来之谷米较大宗，每日运销量约 4 万斤，每年的 9 至 12 月谷米运销旺季则更多。其时，肩挑上市之谷米，排列成近一里长的队伍，等候米商过秤收购。上市之谷米，除供本地和高安、勇尾、洋溪、平卯、拱洞（平卯、拱洞今属融水县）等乡村销售外，大量运往长安、柳州。

民国时期，粮价极不稳定，经常大起大落，新粮上市即压价，青黄不接却抬价。更显著者，如遇灾年和兵荒马乱年代，粮价扶摇直上。最贵的如民国十三年（1924），洪灾损田甚多，旋又 6 月大旱，粮价由银毫每毫得米二斤半，涨至每毫得米五两（十六两秤）。民国十四年（1925），兵匪作乱，贵州榕江封关，粮源中断，粮商改从长安、柳州输入，粮价由每担银元二元至四元增至每担大洋十余元。不少村民将少量米杂与“马斯汗”（野菜名）混食度日，因而饿殍甚多，黔桂边界苗族人民尤苦，卖儿鬻女，惨不忍言。

林溪谷米市场

林溪位于县境东北部，与湖南省交界，为县境谷米运销最大集市之一。市街人家约一百余户，主要从事商业活动，兼营粮油。谷米来源分水路和陆路，水路从湖南省靖县、通道县用木船运入平坦，从平坦改用肩挑，翻过科马界（山名）进入林溪。陆路从湖南省通道县的下江、临口、四乡、播阳，麻龙、陇城、牙屯堡、通平、桥寨和贵州省黎平县的洪

州等地肩挑上市。民国期间，林溪谷米集市很难分出旺季和淡季，每天上市运销之大米约三万斤。如粮价上浮，上市之大米则多于平时，俗谓“价高招远客”。上市之大米，以花红米为最。来往的客商与粮农，每天在千人以上，从中午 11 点开始登场，至晚上 10 点，闹市集中于沙街一带（现今汽车站），夜市灯火辉煌。谷米除供本地及运至古宜市场和程阳、光辉、寨准、八江等乡村销售外，大量运往长安、柳州，换购回食盐、片糖。柳州粮商常把林溪运去的大米称为“林米”，林溪的粮商也常虚夸说：“林溪一年产粮，三年吃不完”。

民国时期，林溪米价通常在银毫七至八毫一斗（折合市秤 20 斤），如以物易物，通常一斗米可兑换一斗食盐。林溪盛产茶油，一斤茶油可兑换大米四至五斤。湖南的粮农常在林溪兑换回食盐与茶油。

粮价最贵的如民国十年（1921），兵荒马乱年代，当时滇黔赣联军，俗称“红头勇”，由湘西通道县进入县境林溪，随意糟蹋粮食。时年路途常遭兵匪拦劫，湖南米因此大大减少，粮商改从长安、柳州输入，粮价涨至银元二至五元一斗。民国三十三年（1944），又复涨至五元一斗，不少村民到湖南境地挖蕨根度日。

林溪米市，常摆满量米之公斗（木斗），专代客量米，每代量一斗，收双方代酬劳米一茶杯（合市秤二两），每个公斗每天约收得米二至三斗。买卖双方为避免克扣数量，对公斗寄予信赖。

（注：根据富禄赖云芝、赖松龄、郑槐德、赖兴基，林溪陆秀峰、周志良、杨正茂、黄犹勋口述记录整理。）

我对魏任重的去思

杨大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没有集体领导制，一个县长，就是这个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其一言一行，都足以影响到全县人民的福祸安危。记得本县文史资料第一辑，我曾写过一篇《民国时期形形色色的三江县长》的文章，文中我侧重记载了唐文佐的政绩，却忽略了一位在艰苦卓绝的环境里，仍能恪尽职守的魏任重县长，兹特补述于后。

一、从容应变，咸得机宜

魏任重系 1943 年冬来三江任县长的。其时正值日寇侵华，由北而南，逐步向我广西进行蚕食，长江、珠江流域的难民官兵，纷纷疏散或溃退进入本县，使这个向来僻静的三江，骤然翻腾动荡起来。在那滚滚不断的人流中，有国民党的残兵败将，有新由贵州省招抚来的匪首杨标及其部从，有由桂北各县招抚募集的盗贼流氓组成的罗正芬游击队，有国民党军统少将曾坚及其爪牙，有广西绥靖公署高参王伯彦，有广西农林厅长马保之，有教育文化界知名人士张雪门、王鲁彦，有财政部属长洪盐运站的员警，有汉奸汪精卫的行政院要员黄季文，等等，真是鱼龙混杂，难以枚举。在这些溃退的军队与军队之间，招抚来的匪

众与匪众之间，以及不相隶属的个人与个人之间，有不少的利害冲突，在在可能酿成严重事件，危害到我县人民。魏任重以地方官、东道主的身份，周旋折中于其间，使他们消除摩擦，进而协作互助，虽在大敌当前，错综复杂的处境中，竟能相安无事，没有使人民蒙受国难以外的痛苦。至于对难民中的艺人，如桂剧名须生蒋金凯、名净生蒋金亮、名旦玉芙蓉、桂林四仙等，则组成三江戏园，既解决了艺人们的生活问题，又使各界人士有一个正当娱乐场所，调节精神，而利治安。

二、重视史料，修编县志

在那弥天烽火，国难当头，政务纷纭，忧心如焚的岁月里，他没有忘记一件与三江人民呼吸攸关，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长远影响的一件要务，即《三江县志》的编修。他抓紧时机借用外才，聘请疏散来县的前清进士、时任国府顾问的姜玉笙，及广西省参议会常驻议员陈学澧两先生，作正副编辑，并排除万难，在各乡物色人员，提供材料，终于在他的任内完成一部《三江县志》。虽然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内容稍欠充实，但对本县县志工作的承先启后，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重视教育，珍惜人才

由于日寇已经侵入邻邑融安，并曾几犯丹洲，乃致人心惶惶，百业停滞，中小学校，自动关门，县府各科工作，亦无法开展。魏县长深惜府内几位颇具才华的职员置于闲散，无所作为，因而授意大彬，组织一所临时学校，名之曰“匡时”，招收勇于求知的学生。所设科目类似初中，另加“应用文”一课。魏任名誉校长，以我为业务校长，教师有原任乡村甲长训练班的教育长莫宏伟，原任建设科长的刘文庆，原任教育科长的莫春福，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生，文化水平很高，学生领教容易。嗣因日寇投降，神州光复，一切机构也都还原，这所学校随之结束，时间既短，收获有限。但查现在的小学教师行列中，尚有当年匡时学校的结业生，是则它在三江教育的事业中，也曾开花结果，不负魏县长的苦心和期望了。

四、重视文体事业的振兴和手工业改进

在魏任前，历届县长执政期间，有关振兴文体事业和改进手工业的措施，向来不受重视，而在魏任内，连续举办过“儿童健康比赛”等各种体育运动比赛，还有论文比赛等活动。我尚记得丹洲的旋风队曾获得篮球比赛冠军，泗里的铁翅队获亚军。论文比赛的获奖者第一名为杨努哉，第二名为梁美，第三名为梁君杰。论文比赛的题目是“建设三江的我见”，足见魏县长在振兴文风之余，还殷殷求治，博采輿情。又曾派谢曙光主办三江周报，作为宣扬文教，沟通经济讯息的工具。他在卸任的一月前，购回数十架纺织机准备改良我县的家机布，可惜尚未配发到乡，他便调任玉林县长，继任者对他的计划，是否贯彻和是否收效，这在他的脑海中将永远留下一个的问号。

五、对进步人士寄予好感，心照不宣

国民党政府为对付共产党的地下活动，通飭各县成立一个秘密小组，后称五人小组。小组成员规定为县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县参议会议长，县府民政科长，县府警佐。在一次小组会议上，县党部书记长李应彬，县参议会议长韦建民，要求逮捕县中官剑平和丁某两位教师，理由是认定这两位教师属共产党地下分子。魏任重则说，逮捕人犯，须凭罪证，否则反而犯了侵犯人身自由之罪，现在暂勿打草惊蛇。会后，魏县长暗示国中校长梁立言转告这两位教师，离开三江，免遭祸害。再则魏县长对本县进步青年如秦振武、曹蔓山等，非常器重，对秦的苦学过程，尤多赞助。当1945年办理县参议会换届选举时，本县当年最反动最腐朽的代表人物，是韦建民、潘懋，他俩企图霸占县参议会正副议长两把座椅。潘懋假借油榨同业工会的议员名额，进行竞选，事为代表进步力量的曹蔓山等所反对，但却没找到法令依据。魏与我谈及此事，颇为叹惜，我遂将有关法令，以匿名信送给蔓山，结果韦、潘等丑恶面貌暴露于选民眼帘之下，而遭到可耻的失败。及魏调职玉林，韦建民、李应彬等勾结县长覃彩如构陷秦、曹等进步人士，秦振武曾避难到玉林与魏会晤，足见魏任重虽任国民党统治下的县长，而情感却倾向于进步人士。宜乎神州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安排他在荔浦中学任教师，以解决其生活，而保持其清誉。

至于魏任重性格风度，也值得一述。他态度和蔼，平易近人，热情奔放，有浩然正气。他毕业于广东省中山大学政法系，大半生在宦海中度过，自是长于政治理论和实践，但对文学、书法、戏剧，都很爱好。在酒酣耳热之余，每好一唱京剧；在朋友敦促之下，也好一挥翰墨；在触目感怀之时，则以诗联表达其情愫。有时因公务过忙，则嘱其属员捉刀，但必详述其意旨，使代笔者知所遵循。兹就我尚能记忆的胪列如后：（一）在抗日时期劝邑绅尹香林捐资救济难民，步尹原韵，诗曰：“战火熊熊照九天，山陬海澨俱骚然。倭胡师老呈三竭，黔首魂惊尚数迁。将士抱头抛甲马，宰官赤手负丁年。可怜到处号饥馑，泣血何曾是杜鹃”。“何须念念叹遭殃，公是钱囊亦智囊。卜式毁家纾国难，昌辉革命弃房廊。塞翁失马宁知祸，郑侠流图斯断肠。请把慈悲心放大，为人愁虑为人伤”。（二）1945年写三江政府大门春联：“ 鳌已深沉，抚景恨无三载艾；政躬须检讨，栽花又是一年春”。（三）撰写三江戏园楹联：“鉴古衡今，外患多缘于内乱；杀敌救国，艺术能振奋雄心”。（四）1945年9月，文武圣纪念节，并开全县体育运动竞赛大会，魏撰会场楹联：“角艺竞争雄，好趁秋风扬我武；尊师即重道，休因浇俗堕斯文”。我们从这些诗联中，大致可以想见其为人了。

编者注：魏任重在中山纪念亭尚有一联，联文为：“登临快览之余，不忘闾阎疾苦；案牍劳形而后，来话原野桑麻”（此联见民国版《三江县志》）

我所知魏任重在三江的二三事

颜 谷

杨大彬先生写的《我对魏任重的去思》一文，笔者似有同感。在日寇侵华，国难当头，社会动乱之际，1943 年秋，魏任重调任三江县县长，历时三年。在这期间，魏对三江民众的抗日运动是积极支持的，对抗日民主进步人士是同情和关爱的，对三江的文化、教育、体育、工业的发展也是做过一些贡献的。现就笔者亲身经历和在整理中共党史资料中的一些史实和感受略述如下。

一、坚持抗战

1944 年秋，日寇逼近龙胜、长安，并数次侵入我县丹洲，烧毁民房 40 余间，抢走粮食 10 余万斤和大批财物，还强迫群众为其将抢来的物资挑运去长安，就连年逾古稀的刘老大爷都不能幸免。更为可恶的是硬逼刘老大爷趴在地上让鬼子当“马”骑作乐。日寇的烧杀掳掠激起民众极大的愤慨，纷纷要求武装抗日。在民众的要求下，三江县成立了民众战斗指挥部，魏任重亲任指挥官。时任三江国民中学教师的共产党员谭安犹和进步教师官健平、侯崇才、杨登岩（时任县参议会副议长）商议要组织一支抗日武装来保卫家乡，抗击日寇。他们通过杨登岩之兄杨登岳去找魏任重（杨登岳与魏是同学）建议成立民众抗日自卫队。魏也觉没有武装就不能抗击日寇，保境安民，于是就满口答应，并指定杨登岳组织队伍，还表示召集得多少人，就发给多少枪支弹药。杨登岳等积极活动，在 11 月很快组成了有 120 多人的队伍，命名为三江民众抗日自卫队，魏任重如数发给枪支弹药，并任命杨登岳为大队长，谭安犹为政训员，官健平为文书。谭、官二人随侯崇才中队开赴与龙胜交界的沙宜驻守。后日军撤退，形势缓和，学校复课，谭安犹、官健平、侯崇才等亦回校教学。民众抗日自卫大队同时解散。

二、同情、爱护进步人士

由于魏任重曾就读中山大学，任过中学教师，参加过国民革命军，故对知识分子、进步青年、民主人士有一份自然的亲近感和同情关爱之心。

1941 年 1 月 6 日“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在全国掀起一股反共高潮，一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共中央决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员实行“长期潜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并要求共产党员要“勤学、勤业、勤交友”，以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方式进行抗日宣传，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3 年 9 月，共产党员梁林、路璠、莫矜等在富禄一带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宣传抗日，进行社会调查，秘密建立起“黔桂边特别支部”。期间，陆续隐蔽到三江以教师为职业的共产党员有田季文、何大群、曾景、江明、付岳松等，以及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他们以学校为阵地，建立学生自治会，组织学生过民主生活，讨论时局，关心国家大事。当时，古宜、丹洲、林溪、八江、富禄等学校都组织

起抗日宣传队，到群众中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还教唱抗日歌曲《黄河大合唱》、《山那边哟好地方》和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活报剧，鼓舞群众的抗日斗志，受到广大民众的好评。魏任重任期间，三江未出现过压制抗日运动、迫害进步人士和逮捕共产党员的事件。更可贵的是，当三江县委对付共产党的秘密五人小组开会，有人提出县国中教师官健平等属共产党，应予逮捕时，魏任重则以“证据不足”，“不能随意侵犯人身自由”为由，予以反对。会后，魏任重暗示国中校长梁立言转告官健平等教师离开三江，以免遭迫害。

1946年秋，魏任重离开三江后，继任县长覃彩如企图加害进步青年曹蔓山、秦振武等，曹、秦闻风逃离三江。后任县长梁志高还以共产党罪逮捕了国中教师杨登岩、侯崇才。

三、发展体育运动

1945年秋，魏任重组织了一次全县运动会，项目有舞龙、舞狮、拳术、田径、吹芦笙比赛等。笔者当时在古宜表证中心校读高小，因生病未能参加比赛，但却去参观了各项比赛。记得在100米赛跑前，我们学校的体育教师梁兆先吹嘘，在百米跑中肯定拿第一。可是在决赛时却被从长安来三江走亲戚的青年周国荣夺了第一名。有趣的是在挑担比赛中，有一位妇女背着一个小孩，挑起250斤的重担，绕操场跑了一圈，夺得了挑担的第一名。

芦笙比赛是个新鲜事，32个乡，每乡一个芦笙队同时在体育场听吹奏，如何分得出高下呢？我们看到几个裁判员到离体育场200多米远的古宜小学操场听吹奏。我觉得奇怪，也跑到裁判员的旁边听他们评论，他们说是那一队吹得最响、最整齐、最动听，我仔细一听也确实如此。

魏任重为人正直，温文尔雅，诗书皆能，态度和蔼，平易近人，家教甚严。就其儿子魏德庄而言，他是我小学同班同学，从未见他摆少爷架子，和我这个穷小子成了知交，还邀我到他家玩。解放后他回三江医院工作，仍情谊如故。最近，魏德庄从加拿大回三江故地重游，尚不忘我这个儿时老友及一伙同事，特邀去赴宴，畅叙友情。

回忆香山慈幼院在三江办学

杨开枝

八年抗日战争期间，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日寇出动飞机在我国境内到处狂轰滥炸，日军所到之处，实行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人民痛苦不堪，唯一出路就是逃难。

原来设立在北平（今北京）的一所很完善的学校——香山慈幼院，就由北京疏散下来，一部分到湖南省芷江市，一部分到我们广西的桂林市来，成立了香山慈幼院桂林分院。还是因为战局紧张，1937年冬又从桂林搬到三江。从此，在三江开办了香山慈幼院桂林分院幼稚师范学校（简称幼师），校长张雪门（教育家，宁波人）校址设在二小（即现在的县招待所）。幼师班第一班在古宜毕业。1939年春，该校又迁往丹洲，在丹洲继开第二、第三两

个班，学生全部是女性和外县籍人。

同是这所学校，于 1938 年上半年，抽调张子招、周仰岐、王旭晨（均系北京人）三位老师，到丹洲去创办一所小学，名为：香山慈幼院桂林分院抗敌将士遗族及难童学校（简称慈小）校长张子招。刚开办时，只有一个班，后来增加到 4 个班。当时，田季文老师（湖南凤凰县人，后在梧州地区教育局）也曾在这所学校任教。校址原来设在丹洲武庙，后来迁至三皇庙。学生来源绝大多数是我县贫困地区的穷苦孩子和各地的抗敌将士遗族子弟，还有因疏散而离乡别井无家可归的苦难儿童。这些在校学生全部是公费（即学校供给笔墨纸张，管吃饭，对一部份特别困难的学生还管穿衣）。在丹洲时，只有第一班（小学六年制）毕业。其余几个班，于 1941 年跟随学校全部迁下柳州。

两毁三建回龙寺

王机先

回龙寺位于三江侗族自治县林溪乡西部的大培山脚，从县城乘车 26 公里到冠洞，再步行山路 4.5 公里即到。回龙寺始建于清光绪二年（1876）。一百多年来，该寺经历了始建——烧毁——重建——拆毁——再重建的过程，所有碑记和有关资料已全部散失。为抢救史料，笔者走访了当地老人，但因年湮代远，沧桑变故，其情况实难具体。现将该寺三建之经过略记如下。

始建回龙寺

大培山有个寨子名曰大培屯，一百多年前有 8 户吴姓人家 30 多口人在此居住。大培山脚有一深谷，谷有溪涧，流水潺潺；从北边而来的另一条山谷在此山脚与其相会；从西边向东延伸下来的山梁像一条巨龙欲去而又回头到山谷汇合处涟涟吐水，形成了独特的地形地貌。先人们认为这里是块风水宝地，于是选中该处建寺，名曰回龙寺。这里群山连绵起伏，青杉翠竹，鸟语花香，风景秀丽，美不胜收，身临其境，心旷神怡，是一个休闲、避暑的旅游胜地。

此处有一条直通高弄、马胖、八江的要道经过。早在建寺之前，人们就在山谷汇合的溪涧上架设了一座简易木桥。为保木桥和行人的平安，在桥北放置了一个土地公。年长日久，远近有一些人每逢初一、十五都到那里烧香祭拜，而且人数逐年增多。大培屯的吴富兴见此情形，萌发建寺想法，并于光绪元年（1875）与枫木屯王文旺、塘阳屯杨某等人当起首事。善男信女纷纷舍木捐银。不久，工程动工。由于工程量大，木料银钱不足，无法完工。翌年正月，吴富兴上林溪皇朝寨找吴伯兴（庠生），吴伯兴解囊乐助，献资较多。后又继续化缘募捐。光绪二年冬，工程告竣。后又进行几年的内外装修和建设，即寺内雕龙画凤；寺外由吴富兴负责建筑一大一小两座石拱桥。小石拱桥建在寺院前右侧的溪涧上。

大石拱桥建在寺院大门前面的溪涧上，桥高 4.7 米，桥面宽 3 米，长 17.2 米，桥面上建一座亭台式木架结构的风雨桥，称回龙桥，桥廊 7 间，桥身里边与寺院相衔接，形成寺桥一体。回龙寺的建成，使这个地方变成既幽静又热闹的胜地。从那以后，到这里来求神拜佛、敬香还愿的人更多了。

当时，为了以产养寺，首士们商议置办庙产。经善士们开田、舍田、出钱买田共有 38 屯。其中吴伯兴出钱买田 5 屯，大培屯吴永祥舍田 2 屯，吴盛青入寺吃斋开出新田 3 屯。这些田由回龙寺管理，租给附近村民耕种，收获分成。

二建回龙寺

清光绪二十多年，地方官府发觉有一段时间回龙寺常有近百号人集结于内，怒斥岂有寺院窝贼？即派地方管事人一把火烧掉，群众费了许多钱财和辛苦建成的寺院顿时化为灰烬。到了民国初年，大培屯吴宗胜（吴富兴儿子）等人商议重建，得到同人善士的支持和拥护。于是，又广为化缘募捐，舍木献工，清基重建，历经十年时间，三间佛堂以及总理间、厢房、厨房、飞山庙、回龙桥等全面恢复。重建的回龙寺设有天井，从远看去，青瓦白戗，楼檐重翘，廊柱挑悬，交错托架，规模较之过去更为宏伟。重建的回龙桥高 8 米，人行桥廊仍为 7 间，另有桥身内边 5 间连接寺院大门，构建精巧，紧密相连为一体。寺院内和桥廊上雕梁画栋，按原样雕刻大小菩萨 80 多尊摆放于佛堂和大小神台等处。复建后，信教乡民每月初一、十五纷纷赴寺敬香还愿；每年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三次举行佛会。另外，每次维修工程告竣，即举行大忏活动。为给大忏活动增添一份喜庆，后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在回龙桥南头外边修建一座戏台。到戏台建成为止，整个回龙寺包括回龙桥和戏台在内，总共占地面积约为 860 平方米，其中建筑 28 间占地面积达 600 平方米。寺院内公用住房和桥上 7 个客房总共可容宿近千人，实为壮观。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令打倒神权，破除迷信，即派人到回龙寺把寺内、桥上共 80 多尊菩萨全部搬出烧毁，尚有一尊未雕刻完毕也丢下溪沟里。民国二十八年（1939），宗教恢复，又请人来雕刻菩萨，用了三年时间才按原来尊数雕刻完毕。民国三十三年，又请人来绘画。当时，共有 100 多人出钱，用了两年时间，把整个寺院内和桥廊上的墙壁、天花板绘上历代民族英雄等油彩画二百余幅，十分富丽堂皇，使之成为一座具有突出民族建筑风格和民族文化特色的建筑。

三建回龙寺

1966 年，在全国“打倒牛鬼蛇神，破除封建迷信”，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口号下，山区旮旯里的回龙寺也未能幸免。是年 8 月 1 日（也有的说是 8 月 4 日即农历 6 月

18日)，80多尊菩萨又一次全部搬出烧毁。1970年，回龙寺房屋被拆除，除一栋一间三柱搬去塘阳屯搞文化室，一栋两间三柱搬去弄中屯搞文化室外，其余全部拆迁到吉利屯建设林溪中学教室，寺址仅余一片废墟，满地瓦砾。

1983年6月，一场山洪冲塌回龙桥里边干砌基脚，桥廊下崩，行人往来极不方便，于是地方民众自发成立修复回龙桥筹委会，成员有大培屯、塘阳屯、枫木屯、片塘阳屯、冠洞村、高弄屯、马胖村、青竹屯等共8个村屯61人。复建工程于1984年2月动工，1985年2月13日上梁，即日竣工，桥廊仍为7间，中间为一亭。回龙桥修复后不久，自治区召开全区宗教工作会议。会后，各县贯彻会议精神，逐步落实宗教政策。大培教学点即把在此地修建的一个教室让给回龙寺作佛堂，另在桥上镶一个小教室。1986年6月，中共三江县委统战部派员到枫木村调查回龙寺房产被拆问题，并予适当补偿，把大培教学点在桥上新镶的一个小教室补偿给回龙寺。1987年由221人（首士）组成的回龙寺重建筹委会，商议再建事宜，并于1988年上半年报告林溪乡政府，获准村民砍伐木头进行捐献，同时化缘募资，1988年秋工程开工，1989年8月18日（农历6月25日）竖柱上梁，翌年3月14日（农历2月28日）竣工。

回龙寺基本恢复后，又多次化缘募资近9000元，陆续于1992年、1993年、2003年请人雕刻菩萨20尊（其中一尊是送的）置于庙中。至此，回龙寺的佛教活动恢复正常。但这次恢复重建，因没有总体规划，也未能一次性建成，故建筑结构难以效仿原样。

2003年11月

史事扫描

吴炳金

太平军四过三江

1851年，洪秀全领导金田起义，1853年定都天京（南京），建立太平天国。1856年9月发生内讧。翼王石达开闻变驰回天京，面斥韦昌辉滥杀无辜，并上奏天王洪秀全，请诛韦以正国法。洪秀全准予杀掉韦昌辉后，合朝欢腾，石达开的声望也随着提高。不久，洪秀全对石达开渐生疑忌，暗使其兄洪仁发、洪仁达挟制，阴谋图害。石达开深感忧虑，1857年6月，率10万精兵离开天京，独立行动。1860年5月，在湖南与湘军大战后，入川不遂，回师广西。9月经湖南靖县、通道行至与三江接壤的青龙界。民国版《三江县志》载：“翼王石达开，率众数万人，绕道入川，在青龙界与楚兵大战三昼夜，并用火烧张正、峒雷两村。楚兵知不能敌，横逃入都垒而去。”石达开率部自灵川西进。10月至融县，旋攻占庆远府城，滞留8个月。

1861年3月，石达开率部自武缘入上林。其部属余姚带兵万余，于3月28日由湖南通道县的双江、黄土过林溪，在科马界与阻击的湘军和地方团练星夜混战，双方死伤惨重。

战后，余姚率队经古宜，沿江而下入长安，寻找主力部队会合。

1861年6月，石达开率部向贵县转移。大成国国都秀京（原桂平浔洲府）陷落后，石达开率4万余众北上。10月18日，再经三江入湖南，转至云南、贵州、四川。

1863年9月上旬，太平军陈李部一万余人，由绥宁出长安堡，过青龙界到三江县境斗江，然后上牙林出白言，在瓦瑶墟休整。

同年10月初八，石达开部左宰辅李幅猷所率部队被清军追剿，亦从湖南退至三江斗江。陈李部在瓦瑶墟派人侦察长安，长安守敌颇众，难以进攻，旋退至斗江与李幅猷部会合。两支队伍合为一处，改道上文村，经程阳，林溪，沿途住三夜，而后“入贵州高角四寨，转至黔省”。

综上所述，1859至1863年，太平军在转战期间，曾先后4次经过三江。由于史料缺乏，仅有两次遭遇战的简单记述，难述其详。虽未能展现出交战中的兵力部署和激战情况，但太平军不畏强敌，不惧艰险，英勇奋战的精神至今仍在侗乡流传着。

李源发三战古宜

清道光三十年（1850）8月17日，正当以洪秀全、冯云山为首的拜上帝会教徒从四面八方聚集于金田，积极准备举旗起义的时候，领导湖南、广西、贵州三省交界地区天地会起义，威震清军被清王朝定为“据城戕官，起意谋反”罪的李源发英勇就义了。李源发领导的农民起义，虽然没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那样威武雄壮，但也为中国历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尤其是义军英勇强悍，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转战三省，横扫封建统治反动势力的故事，至今仍在各地流传着。三战古宜便是其中之一。

道光二十七年（1847）秋，李源发父子参加雷再浩、李世德领导的湘、桂边境汉、侗、瑶族人民起义。两个月后，起义被清军镇压，雷再浩、李世德壮烈牺牲。李源发的父亲李成周也遭杀害。

1849年，李源发秘密组织“天地会”，聚集一千多人，以红布裹头，吹牛角为号令，在湖南新宁县水头村再次树旗，举行起义。10月，李源发率队出奇制胜，一举攻占新宁县城，杀死知县，开仓赈济贫民，破狱释放被关会友和无辜群众。11月，清廷从永州、长沙、衡州等地调集2万兵力围攻新宁县城。双方相持20多天，清军见无进展，调来千斤大炮，炮轰县城。又从城外挖掘地道直达城墙根，用炸药炸塌城墙，而后攻入城内。义军在城内被围困多日，粮食和弹药逐渐匮乏，李源发决定弃城突围。他派人轮流在南门放炮、布阵，摆出与清军决战架势，迷惑清军。待清军集中兵力至南门时，李源发率部乘雨夜从城东北角撤出，向广西千里转移。

在湘、桂交界山区，李源发率领起义军时而广西，时而湖南，避开清军防御重点，集中兵力，选择薄弱和易攻易退的地区，乘敌不备，速战速决，歼灭敌军，集小胜为大胜，

队伍士气得到鼓舞，兵员和物资也得到补充。

1850年正月18日，起义军在湘、桂交界的湖涌山与清参将玛隆阿带领的500清军相遇，激战一小时，互有伤亡。李源发率部退入湖南绥宁地界，玛隆阿以为起义军怯退，率军追击。乘清军得意忘形时，李源发率部突然调头向清军反击。玛隆阿被砍伤右臂倒地，旋即毙命。清军丢盔弃甲，伤亡惨重，大败而逃，起义军缴获若干帐篷、枪炮、弹药。之后，来到广西龙胜，佯攻广南汛城。待同知吴德征、都司邓宗武派兵增援广南时，李源发率部不惧艰险，翻越人称“西南锁钥”的青龙界，至三江县属沙宜，与驻守该处的清军展开激战。驻广南和全州的清军由参将成安率领赶往沙宜截击。李源发获悉后，离开沙宜，于正月廿四日抄小路翻山直扑古宜，在守军尚未察觉前，抢占北面大头坡制高点。又分兵占领西、南渡口，大部队则从东面攻入城内，一举攻占古宜。焚毁古宜衙署，开仓济贫，释放被关押的无辜群众。队伍热热闹闹地在古宜欢庆两天。李源发估计到，清军一定会从凤凰下文村抄近路增援古宜。于是，派重兵至文村路边山林和引木坳埋伏。同时在古宜渡口也埋下伏兵。

古宜失守后，清军融怀营守备苏秉华，庆远协都司邓宗武，绥宁训导邓树坤奉命率兵前往古宜围剿李源发。清军一路奔波，李源发部以逸待劳。等清军进入伏击圈内时，起义军从丛林里挥师出击，加上又有天助，下起大雨，清军的枪炮威力大减，一片混乱。起义军刀枪并举，大显神威。都司邓宗武，守备苏秉华、千总周荣和训导邓树坤均被斩杀。起义军获胜后，挥师回扑古宜。

李源发重占古宜后，部队在古宜休整。而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改变方向，挥师西进，经林溪、水团、通坪进入贵州黎平的四乡、黄林所地区。义军受到当地苗、瑶群众的欢迎，队伍发展到3000多人。接着，李源发又率队穿林越岭，奇袭湖南靖州亚咀口和绥宁藕团营卡，击毙绥宁营守备哈心靖和提标千总黄廷英。毙、俘兵勇不计其数。李源发的行动沉重地打击了清军，清廷大为恐慌。湖广总督裕泰惊呼“贼势猖獗，未便绥待”。即从各地调集兵力围攻起义军。

起义军攻破藕团卡后，又经黎平四乡折回广西。至靖州哨团时，清军跟踪追击，时值大雾弥漫，方向难辨，人迹不清。战斗中，义军失利，撤至黔桂交界的水口时，又与清军副将奚应龙带领的一千多清军相遇。双方进行了两天激战，各有胜负。但此时，贵州、湖南的清军援军又至，起义军前后受敌，李源发的堂弟李源松等被俘。于是，李源发决定长途突袭，摆脱敌人的尾追。

1850年3月，李源发率部离开水口，四路遣人探明无兵之处行走。月中，就僻路再至古宜，与古宜守军交战。古宜守军闻知是李源发的队伍，不战而逃。

李源发率部三驻古宜一段时间后，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在敌军四处追剿的情势下，不能以一地而长踞。因此，在清军调兵遣将来围剿前，又离开古宜，过斗江，经三门

大罗山，抵融县长安。而后转战至永宁、阳朔、荔浦、修仁，进入大瑶山。

李源发起义及率队经过三江之事在群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程阳，林溪一带民间艺人编唱的侗族琵琶歌《李源发之歌》，至今仍在民间传唱。

天地会血洒三江

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外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对内加紧镇压和剥削，政治日趋腐败，经济日益衰弱。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互相勾结，朋比为奸，苛捐杂税，巧取豪夺，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天地会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以“劫富济贫，驱除胡虏，反清复明”为口号而兴起的。

三江地处湘黔桂交界处，虽非军事重镇和兵家必争之地，却是战略转移和休养生息的好去处。近代，天地会及其领导的起义队伍更是多次经过三江，并在这里洒下了热血。

1852年9月，天地会首领朱洪英（湖南东安县人）、胡有禄（广西武宣县人）在南宁竖旗，率众起义。后活动于湘桂边境一带，连克多座县城，1854年10月建号“升平天国”。1857年3月攻克柳州。1858年6月与清军作战失利。镇南王朱洪英率部经三江，沿溶江而上转战贵州古州。

1854年7月，天地会首领李文茂（广东高鹤县人）、陈开（广东佛山市人）在佛山起义，义军取名“红巾军”。8月，10万义军围攻广州未克，溯西江而上，于9月攻占广西桂平浔州府，建立“大成国”。李文茂为平靖王，陈开为平浔王。1857年李文茂率部攻克柳州，旋连克柳城、罗城、融州、庆远。1858年4月清军反攻，柳州、庆远失守，融州陷落。李文茂率部转战柳城、融县和三江。6月，李文茂率部从三江进入贵州，11月，又从贵州转回广西，在三江老堡、溶江一带活动。由于转战多年，积劳成疾，12月病逝于三江。

1902年，浔、溶两江涨大水。水灾、饥荒、瘟疫造成群众流离失所，饿殍遍野。为解群众于倒悬，伍开先在和平乡寨禄村建立天地会，以“劫富济贫”为口号，竖旗反清，队伍发展到800多人，震动融、怀两县。官府派融怀营先锋率兵进剿。平寨一仗，官兵不敌，复派文、蔡两帮统率兵分两路，一路由龙胜下斗江，一路从永宁出板榄，并集融、怀两县团练共万余众，实行南北夹击。伍开先率义军退进深山，被叛徒出卖而遭杀害。会众分散隐蔽下来。

随后，桂南天地会首领梁月初（广东海南人）与李林红和张亚祥（即张熙祥）、张三嫂夫妇相继潜入三江，秘密发展天地会会员。

辛亥年（1911）春，武昌起义爆发前夕，三江境内程阳、林溪、八江等地“款”众在吴吉彪、王均臣的带领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困石官抗刘官”斗争。“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时候的清政府和怀远县衙已摇摇欲坠。天地会看到这种形势，便由秘密转为公开活动。他们和“款”组织联合起来，设洪胜大馆于程阳。（洪胜馆后迁至林溪平地棉村），设常胜

馆于斗江，设长胜馆于旋盆。同时，吸收“款”首吴吉彪、王均臣、梁国安、梁大萍、潘文仁等入会。让他们担任本地的天地会首领，广招会员。时称三江一片红。

辛亥年夏，天地会首领梁月初、李林红、张亚祥率武装会众数十名，由斗江经沙宜、凤凰向程阳进发。清怀远县古宜分署团练获讯后，在程阳平寨村东的“沙亭”一带布置防线，企图伏击歼灭天地会武装。由沙宜至程阳，有一条比较大的乡村道路，天地会舍此不走，另抄一条小路，从“龙岗角”居高临下，突然出现在团练的伏击阵地背后，把团练队伍打得落花流水，全部歼灭。

天地会在程阳，不驻近河边和路边的大村寨，而驻扎在偏僻的坪坦村。这样既可防守八江方面来的敌人，又可遥控程阳八寨。平坦村前后有大片原始森林，四周与平甫、高弄、高迈、归座邻近，大有回旋余地。

天地会在坪坦驻扎期间，安抚群众，广招会员。首领与会员有饭同食，有苦同当。不抽税，不纳粮，平买平卖，不侮辱妇女。广大青年也纷纷参加天地会的抗清义军。

由于天地会发展很快，在坪坦村已住不下，同时，亦因需提防古宜之敌，故于辛亥年秋，洪胜馆迁至林溪平地棉村。这个村距离林溪仅一公里，四周古木参天，既隐蔽，又方便。穿过林下，有路通湖南、贵州和县内八江、马胖、美俗、高友、弄团、水团、高步等地。在平地棉，天地会公开挂幡摆台，招收会众。据记载：“每天都有数十人入会，还有关‘打单’钱（地主以钱银代粮）、送‘捉参’钱的（富户官绅赎身钱），络绎不绝。有时一天收得白银、铜钱足有两庞桶”。

至此，孟江、武洛江、林江一带的反动团练均被天地会歼灭。除丹洲、古宜两个孤点为清军盘踞外，全县大部分农村皆为天地会和“款”组织所控制。当局派来接替刘官的知县曾建勋带领配备有六八式新枪的八百湘军来到三江后，曾企图消灭天地会武装。由于看到形势不利，也只好龟缩在古宜，“守机以待，不敢骤发”。

辛亥年10月，武昌首义成功。同盟会柳州分会派刘锡镐回三江。刘锡镐到三江后，即与“款”组织和天地会首领吴吉彪、王均臣、梁月初联合，在长安设立指挥机关。以“款”兵和天地会武装围攻县城，并策动县联防队为内应，融北安江团反正于丹洲，一举攻克怀远县城丹洲。旋又击溃八百湘军。曾建勋率残部逃离。至此，清王朝在三江的统治宣告结束。

天地会这支农民义军，原以“劫富济贫，反清复明”为宗旨，到辛亥革命，走上了“反对封建统治，建立民国”的民主革命轨道，成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同盟军，这是一个飞跃，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三江的天地会活动，其领导者来自广东、湖南和桂南，但会员多是本县各族群众。他们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与“款”组织联合，推翻了清王朝在三江的政权，建立了民国政府，这也是历代农民起义所未能达到的目标。但是，民国建立后，广西政权还是操纵在旧桂系军阀陆荣廷的手里。三江这支天地会和“款”组织所领导的农民武

装拒不接受军阀的改编，仍继续坚持斗争。

梁华堂败离三江

梁华堂，广西北流人。1923年在桂林任自治军司令（后来任第四集团军少将参议）。1924年陆荣廷与沈鸿英为争夺桂林发生激战，陆荣廷不支，退至全州。沈鸿英占据桂林后，将梁华堂赶走，自称建国军司令。

梁华堂退出桂林后，率兵千余经龙胜到三江，分兵驻扎在古宜、斗江、泗里，林溪、八江等地。梁华堂是赌棍出身，曾为桂林一博豪。所到之处，大开赌场，派捐纳税。仅在林溪，除向一般商店收税外，又强令“信太”商号为其部赶制军服一千套。同时，发函至孟江、平流、独峒一带，以征收烟苗税为名，索要银毫3万元。地方上的一些败类，如平流的胡育德、邕团的吴万高等暗中与梁华堂勾结，为之奔走催收税款，从中渔利。当地的寨佬、“款”首莫如贵、莫让贤、龙明彪、吴起凤等聚议。议后，即派人赴桂林向沈鸿英揭露梁华堂所为。沈鸿英亦想借民众之力削弱梁华堂的力量，便以“军既殃民，民可抗之”为复，并许诺如需枪弹，可派人来领用。寨佬、“款”首又派人至孟江上游款组织“上五脚”（指干冲、独峒、邕团、平流、八协五村），联络抗敌，反对苛捐。正筹划之中，被内奸将消息暗通给梁华堂。

1925年正月初一，梁华堂遣兵一营前往独峒，于途中的盘寨被“款”众阻击。双方交战，梁华堂部以武器优良取胜。而后“焚烧盘寨，掳掠财产和少女10余人，老弱妇孺毙于难者50余人”。当晚，该部退回八江驻扎。

正月中旬，梁华堂又派出一连兵力，进至孟江下游的同乐、瓦寨等村征款。上五脚民众获知，组织“款”众与团练一起驰援同乐。敌兵始时顽抗，后见“款”众和团练源源而至，不敢恋战，突围而逃。当他们沿着山路窜至牛塘坳时，被埋伏于此地的“款”众伏击，伤亡过半。于是，又折道转向和里欲出古宜，至岑里山腰时，又遭伏击，一连兵力全部报销。

梁华堂获此消息，震惊加激怒，倾其所带兵力，加上收罗的张龙彪、何善初股匪共千余兵力，于二月初向上五脚大举进攻。其先头部队至高亚下寨时，被据守在该村炮楼里的少壮敢死队阻击，不让匪兵进寨。梁华堂见状，即调炮将炮楼轰塌，敢死队冲出炮楼与匪兵拼杀而壮烈牺牲。村寨遭焚，财产被掳掠。消息传出，上五脚“款”首们即将火急木牌传至下三脚（当时指猛团、七团、同乐等村）和“五百和里”，调动大“款”，共同御敌。

梁华堂攻下高亚后，当晚下至独峒、邕团，遍驻村内外。梁华堂虽然兵多，但地形不熟，亦有些惧怕与侗族“联款”交战。于是，派内线吴万高等至平流、八协试探招降议和，遭到拒绝。随后，梁华堂按吴万高所示，移兵围攻平流、华练。两村“款”众紧闭寨门拒敌。午后，各处“款”众及本地团练源源赶到救援。经会议策划，以在同乐缴获的武器装

备一支强队设伏于漆木坳。在双方对垒之中，“款”队派出小分队装扮成敌兵，用计将敌兵军旗夺到手，挥旗将寨外之兵引往漆木坳。众敌兵见军旗移动，以为战况已有进展，随旗跟进至漆木坳，突遭伏击，阵势立即大乱。寨内丁众，趁势打开寨门，冲杀出来。敌兵遭四面夹击，全线崩溃，突出重围向山林逃窜。杀至黄昏，敌兵尸体成堆。梁华堂趁黑夜率残部退回八江。次日逃离三江。

梁华堂部副司令何善初率另一残部从古宜上溶江。经过和里时在和里宿营。时值和里迎神进庙赶会期方毕，所请戏班还未离开。何善初为鼓残部士气，截留戏班为其演出。和里“款”首即草书一函随火急木牌传至上五脚。上五脚“款”首龙明彪即率二千余“款”众奔赴和里，与五百和里“款”众兵分三路，一路从和里入村大路正面打，一路下平岩坡攻右侧，一路抄小道至良梨溪边埋伏。何善初意想不到“款”众如此信息灵通，来得如此神速，只好仓促应战。而后且战且退，抄小道逃往贵州边境。

至此，仅两个月时间，自治军司令梁华堂想占据三江地盘发展其势力，捞取钱财的美梦破灭，并差点命送三江。

日军两次侵入丹洲

日军曾两次侵入丹洲，对此史料已多有记载，人们在写回忆文章时也多次提及。但系哪支部队在何背景下侵入丹洲，则尚未有记述。最近，翻阅史料时，发现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为使这段历史更加清晰，使人们牢记民族仇恨，将这些零星资料理顺，记述如下。

1944年9月，日军为了打通从中国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出动了第11军和23军共8个师团，加上2个独立旅，共15万兵力，分别从湖南沿湘桂铁路南下；由雷州半岛经桂粤边境北进；从粤西沿西江西上，分三路向广西进攻。10月黄沙河失守，桂林震惊。10月14日，三江县政府宣布三江第一期疏散。并划定平流、八江、同乐、富禄、林溪等乡为各机关疏散地区。各乡民众视战况，临时指定疏散于背敌50华里以外之地区。

11月10日，桂林、柳州沦陷。三江又成为桂林、柳州军民的疏散要地。当时经三江绕道去重庆、昆明、贵阳的军政要员、部队和机关很多。暂避于三江古宜、富禄、老堡、良口、林溪的也不少。

11月17日，日军侵至龙胜县属江底。三江宣布第二期疏散。

11月19日，日军侵至长安。丹洲乡宣布第三期疏散。县政府也立行署于富禄以应急。邻近三江的黔属从江县和榕江县也宣布进行疏散。

在组织群众疏散的同时，为阻击日军侵入，以防地方遭受掳掠，县成立民众战斗指挥部，并以乡为单位，成立民众自卫大队，村成立自卫中队。当时全县共成立了32个自卫大队，287个自卫中队，组编成8个自卫联队，由县长魏任重担任指挥官。配合作战部队，扼守各乡要隘。

共产党员谭安犹和进步教师官健平、杨登岳联合进步人士杨登岩争取当局支持，组织了县直民众抗日大队，共 120 人枪，到龙胜至三江的必经关隘沙宜石门驻守。

县府富禄行署获悉黔东南杨标组织一支 500 余人的游击联队，即派人前往联络，晓以大义。杨标率队到富禄，接受点编。而后带队到融属遥送、珠玉一带活动，并寻机进至浮石，偷袭日军。初获小胜，后遭日军反击，退回板江。

除民众抗日武装外，当时驻扎在三江的中央军足有二万多人。第四战区副司令兼 16 集团军司令夏威又派其部属在三江招募兵员，组建“威南支队”，辖 5 个大队，16 个中队，一千余兵力，分别驻扎在头坪、和里、泗里、老堡等地。支队司令部设在和里的“三王庙”。

从民众抗日热情、兵力兵员和山区地形诸因素看，阻击日军侵犯山区是有能力的。但由于国民党采取消极抗日的政策，其军队在日军面前多数是望风而逃，不敢抵抗。进驻地方后，不是积极组织抗日，只知勒索横征，使日军更为猖狂。

1945 年 1 月 7 日，“日军第 23 军为了向柳州西部地区追击围歼重庆驻军，下令先遣第 104 师团向柳州西部地区，第 22 师团向流山挺进。同时命其主力开向柳州西南方。随后，军司令部从新圩出发，开向三江，开始了山地行军”。

1 月 31 日，日军小股部队从融县长安出发，侵入丹洲。驻在三江的国民党中央军“秀山”、“南川”、“阳峡”、“平阳”、“平原”各部共万余兵力，只“阳峡”部队派萧营长率队到板江阻击，击毙日军 20 余人。日军稍作反攻，部队都不见踪影。日军侵入丹洲后，掠夺大米 8 万斤、稻谷 3 万斤以及乡公所的 5 支步枪和电话机，加上群众的衣、被和财物一大批，而后返回长安。

随后，日军第 11 军的 4 个师团经过长途跋涉才逼近柳州 50 公里，而第 23 军的两个师团此时已远离柳州，想以此态势在柳州西部地区捕捉重庆军已经无望。因此，日军放弃西进计划，三江也因此免遭蹂躏。

日军改变西进计划后，又派出第 22 师团和独立混成第 23 旅团经宾阳、上林等地向南宁进攻。11 月 24 日再度占领南宁，与驻越南的日军连成一线。广西大部分县城、县境为日军所占领。在桂林、柳州一带，日军将第 11 军司令部设在柳州；第 13 师团部设在宜山；第 34 师团部设在全州；第 58 师团部设在桂林。时常派出部队对周边地区进行骚扰。

1945 年 4 月 1 日，美国军队在冲绳岛登陆。4 月 5 日，苏联决定中止苏日中立条约，准备对日宣战。为应付新局面，日军决定撤出在华南地区的部分兵力，加强华北和华中。日军在撤离柳州、长安前，获悉有不少豪门富商携带资财疏散于三江，便乘多艘船只，沿江而上，进行掳掠。4 月 12 日，日军从融县第二次侵入丹洲，犯下新的罪行，奸淫妇女，烧毁房屋，抢夺粮食和财物等，无恶不作。抢得财物后，又强拉民工为其当挑夫。年老者申言不能挑，竟被日军强令手足着地，匍匐而行，而后又坐在背上当马骑来取乐。其残忍令人发指。

自 1945 年 1 月至 4 月，日军共进犯丹洲 4 次，侵入两次。

1945 年 4 月下旬，根据新的形势，广西开始向日军进行反攻。6 月 29 日收复柳州，7 月 26 日收复桂林。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三江各界民众连续 3 天举行抗战胜利庆祝大会，并奉令豁免田赋一年。庆祝大会会场的对联为：

“八载血痕殷，九死一生，才争来最后胜利；
千秋青史在，五光十色，须记取空前殊勋。”

（参阅资料：《中国通史》、《广西历史人物传》、《广西军事人物》、《广西军事志》、《三江县志》、《三江文史资料》）

宜阳旧地名地物考

唐志宗

福嘉义山

福嘉，指的是福建和粤东嘉应州两地。在三江县古宜镇居住的客家人（又称麻界人），其先祖来自闽西和粤东之嘉应州（即现在的梅州市）。据考，嘉应州的客家人亦多从闽西迁去。他们虽原居异地，本则同宗、同源，关系格外亲密。

本县的客家人，自明末清初陆续迁入，散居各市镇，尤以古宜、富禄为多。定居古宜的福嘉客家先民们，考虑到古宜是全县的中心点，水路交通直达长安、柳州，商业较发达，很有发展前途，可作长久定居之地，于是共商买下一片山场（即现在义山街后背山坡），作为坟地。以后凡源出福嘉者，有人过世，均可在此坟山自择穴地进葬，无须交纳地皮费，故称之为“义山”，因是福嘉人共有，全称就叫“福嘉义山”。

现在人们只知此片山场叫“义山”，则不知其全称，更不知其来由为何。

马道

明末，县设主簿一员（古称县丞），为知县之佐治官。清初怀远县主簿驻古宜，掌管这一方的一切军政要务，故有分县之称谓。主簿掌有巡徼弹压勘灾等职责，常驻兵丁。有兵丁就要训练，故在古宜开辟两条“马道”，以作训练弓马之用。一条是从竹寨坳起取直路向北延伸至大田头处（即现在新街头东方红旅社）；另一条是从鸡公桥头过大寨村前向西延伸直至朝龙坪。两条“马道”，从起点到其终点的地方，时人称为“马道头”，现在许多老人仍作如是称呼。

一沟三拱桥

古宜，明清时称古泥关（镇）、宜阳镇和宜良镇，驻石眼口（林江河口）南岸。镇移现地后更名古宜，沿袭至今。

石眼口地方狭小，面临大滩，水势湍急，停船不便。镇移下现地后，地势较为开阔，面临浔江之滨，水势平缓，方便泊船，九角八寨环绕其周，是较好的买卖集散点，市井初步形成。

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于古宜设怀远县分署，设主簿一员。此后，外地客商逐渐增多，市场日益繁荣。并开始建设街道。当时，由东冲至二圣庙背后，是一条大水沟，长年流水不息。建设街道有三处要跨越水沟，一处是由西街口上桐漏坪这条街道，于江西会馆门口外面；一处是从西街进入和德安的栈房地下；还有一处是在粤东会馆大门前。这三处都必须修建拱桥，以便街道路面跨越其上。这三个拱桥都被路面和栈房地面覆盖后整个水沟也全部改成阴沟。当时人们都称之为“一沟三拱桥”。这三个拱桥如今已鲜为人知。

一钟两响

古宜镇中长街南头，过二圣桥的大榕树背后，清时建有回龙庵，南邻梓潼阁。回龙庵的尼姑们，每日晨暮都要击鼓敲钟做功课。因与梓潼阁紧紧相连，庵的钟鼓一响，两处一样听清，阁内亦跟着作其要作之事，阁内无须设置钟鼓，亦无须安排专司此事之人。所以，人们称之为“一钟两响”。

以上是我写《建置区划志》，在收集古宜镇资料时，有赖进爵等老人在提供我所需资料之余，顺便谈及的故事，姑且纪之。

2004年9月

《怀远县志》序

莫 抑

怀远为县，盖肇于有宋。至明兴，文幅具整，广轮无外，诸瑶扶服而请吏。成弘间，乃跳梁侵蚀县治，当事视为北户昏荒，置不问。至隆万，遂戕邑令。诏征之，乱始平。而县治荆榛，数议城弗就。凤谷苏君来尹其地，慨然曰：“边徼去天万里，责在司牧，而僦居邻邑，养安岁时，是荒饱也。”于是入箐峒，躬劝谕群夷，聆戢受汉朔，则卜丹阳镇而迁邑焉。镇地疆，挟两川，围群山，风气所都，而君拮据芟柞，不辞劳瘁，缮雉墉，构庐舍，创胶庠，通化居，变瓠脱为夷庚，灌树莱沛之区，一旦焕然乐土矣。顾深念营创难而无识，后且堙而莫考，则请诸当道，为志以纪之。山川、田赋、兵防、城社，区分胪列，其部署方略可覆而据也。予反复请阅，深叹苏君之贤而多才也。县之废将百年，司土者玩愒岁月，假舍郡城不一，厕足武牢玉江之间，将三甲民而秦越之矣。渠宁功难首事，亦缘才有莛楹。

夫怀远险土也，郡守江君失利于前，邑令马君覆绩于后，甫烦诛讨，而复变起坡头。瑶之犷悍，事之艰危，谁其堪者。而苏君焦思殫力，龛世拯乱，走虎狼之穴，扰狰狞之夷，辟棘蒺之场，启宫室之丽。遂使家连困鹿，野亘钱罇。韦潘木楫，稗贩纒属，彼其才略何如也。县功成，天子嘉厥绩，擢庆远贰守。又念怀民才定，非君无可善后者，复留治而久任焉。丹阳千载之灵秘，由君而泄；遐陬百年之纠结，由君而解；民萌数世之痍瘡，由君而平。欢雷应期，灵龙献异。新邑鼎建，将与帽山融水同长。而是志也，传之久远，亦永为千祀不刊之典故矣。君身为之，而身纪之，故事核而详，思远而深，辞恳而切。后之经理者，不烦擘画，手此书而专治，若奉律令守成案耳。异时金马石室之臣，修龙门兰台之业，考览功伐，著于琬琰，不其有藉于斯哉！苏君整布寰宇，树尝鼎之勋，当不限此，而邈尔小邑，茂立鬼绩，从此无方事业，所以爚竹素而煜丹简者，则俱发矚于兹矣。予喜县功之成，叹苏君之才，因引言于篇端，俾来者观焉。

（韦运芳录于民国廿七年所纂《柳江县志》）

重修二圣侯王庙碑

窃维有功于国则祀，有德于民则祀，故夫聪明正直护国庇其功德有不容没者也。我古宜自昔荒服，有蓝氏兄弟二人，生而神异，英挺绝伦，幼丧，椿庭，事母至孝，友恭性笃，正气不衰，一方之薰德善良不知凡几，后父偕歿于宜之江口，屡著灵应，地方仗以物阜民安，正德间诏敕封为二圣。乡人。因立庙祀之。嗣永历奔道古宜，危无舟渡，转瞬一舰泊于河侧，王及輿从举登之，旋有双金鳌扶舟送行到岸。视船则菁茅所结。永历询之将军曹应元，敬述蓝氏灵迹。诏加封为江口得道二圣侯王。我朝雍正年间，龙胜广南之苗逆作乱，游戎杨刚督兵剿匪，祷于二圣侯王，果得神助，一鼓荡平。咸丰初年以还，地叠遭苗发各匪，彼时辄於庙中夜闻戈甲人声，比晓马迹杂踏庙门，频劫默佑。岁丁卯，各首事梦侯王嘱曰：现今大难将临，予暂避他所。至冬，果苗逆窜燬，殿宇一概无存，墙壁尽皆断裂。爰集同人，僉商重建。工程告竣，迎驾升宫，庶侯王之凭依得妥，则威灵之显被益昭，赐福降祥，士民全资呵护，御灾捍患，永庆升平。是为序。

陞用管带道字营勇协镇黄才贵捐钱拾千文

古宜厘金局委员荣本雄捐花银四元

署古宜分县周文焕捐钱拾千文

（其余人名略）

注：此碑现存放在古宜大寨曹祠内

钱粮额定

钦加知州衔署理柳州府怀远县事即补县正重加十级纪录十次吴，为络示新碑永定钱粮

章程事，业处匡里塘团总等禀称，塘地丁钱粮年清年款毫无□□惟塘□内保以禾把棉布米蛋上纳。无如该处山多田少，禾把不便于民，向日种棉之□处近来十不一获，民间俱不种，无从上纳，至于米蛋累更重。禀稳照额银用钱算，有闰之年每两愿折老制钱叁千四百文，无闰之年每两愿折老制钱三千，恳给示勒碑实为德便等情。前来窃念朝廷立政保民总以便民无累民为要，今据该塘心愿用钱折算，在其如水数完纳，所有禾把棉布米蛋概符蠲免，合行出示。为此示仰匡里塘各村粮卧便遵照於务明。国保家寨之义急於输将，毋得任意拖欠。自定章程以后，粮户如过限期不早自封投柜□□□赴塘各村徵收应给工食外，不准额外浮收一文。如违定即从重惩办不贷。各宜□□□□□特示。□□一勒

匡里塘本定额银壹钱 有闰折老制钱叁佰肆拾文 无闰折老制钱叁佰文 工食钱三百文

溶阳村额银贰钱 有闰折老制钱陆佰拾文 无闰折老制钱陆佰文 工食钱三百文

上田、大闹、八约村额银壹两伍钱 有闰折老制钱伍千壹佰文 无闰折老制钱肆千伍佰文 工食钱壹千文

苟壁村额银贰两 有闰折老制钱陆千八百文 无闰折老制钱陆千文 工食钱壹千文

归畜、岑洞村额银贰两 有闰折老制钱陆千八百文 无闰折老制钱陆千文 工食钱壹千文

书差赴村徵收钱粮，各村按数发给钱文以作工食之费，如自封投柜者免。

同治拾年三月二十日立。

注：此碑现立于富禄乡匡里村球场左侧，“□”为字迹不清或缺不全之标记，以下碑文有“□”字之意皆同。

（吴仕光抄录）

清白悠传

且夫人之有祖，犹水之有源，木之有本也。开源则流长，培根则叶茂，人于宗祖岂可不追德而忘其本哉？故我前辈立同以祀之，俾凭依之有所，其意岂非深远者耶？溯斯祠，始创于前清光绪初年，迄今六十余载矣。然建造虽宏，而规模犹狭，实不足以壮观瞻而贻敬重也。族人等爰发诚心，重建外座。门楼高耸，西式装璜。中设天井，拾级而上，足供揖让升超；前有骑楼，纵目而观，可享清风明月。左右为学童寝室，其中层为授课讲堂。鸟革翬飞，堂皇富丽；雕梁画栋，彩彻云衢。先灵既得妥安，后哲定卜继起。宗功祖德，俎豆惟馨；子肖孙贤，克昌厥后。兹值工程告竣，并将乐助芳名刊列于后，用垂不朽云耳。是为序。

首事：代广 有昌 有庆 有常 代椿 有标 □□ □□ 文德 有珍 有祥 有

洪

族长：代珍 文美

房长：有□ 有学 有彦 文□ 代标 文科 文魁 文良 文梯

生□：梁君杰撰

择日师：秀宣 有庆

刊师：李付春

民国三十五年丙戌九月廿九日发墨

民国三十五年丙戌十一月廿五日子时竖柱未时上梁

民国三十六年丁亥元月十一日起场脚

民国三十六年丁亥六月十一日完兴

注：此碑存放在南寨杨祠内

（王机先 杨盛玉录）

名扬万古

盖闻

原夫羊肠鸟道，乃天然之形势；运河铁桥，本人造之奇工。所以天地无全，必待人力。□□□□□境，地属弹丸，虽非四通八达之区域，实属两粤三楚之咽喉。东南商贾，上下旅行，朝焉□□□□□征夫跻□与逢春天骤雨，河水疾涨，两岸断津，未免望洋之感，徘徊迷途之嗟。爰吾矢□□□□□足资，同舟之共济，免着涉水之难，作成永古之利，诚为好善者劝。不意天有不测风云，□□□□□水患，忽于蒲月之天，大雨滂沱，狼谷狂溪，霎时浚流，势若排空倒海。河水不由故道，村□□□□□桥梁冲折，飘流无存矣。迨至己卯之冬，阖团父老召集会议，提倡义举，重建复修。金曰□□□□□争先，各解囊乐捐，鸠工庇材经之营，不日成之。由兹以往，桥梁与日月而常，永固山河□□□□□斯桥也，斯桥也，诚有磐石之安，长有泰山之固。旨哉言乎，兹功成告竣，恭叩供奉之神，永作一方之福神，德被生民，长享万世之香烟，功高日月，捍灾御患，四民乐业，驱□□□□读，女者纺织，一道风同，化行俗美之乡，而含鼓舞盛之休徵。兹承诸公不嫌请序，抢浅恐会大方见笑，惟以管见所及提大容而云尔。谨引。

撰书 杨树青 择日 吴发刚

首士：吴臣贤 吴钦儒 陈世超 吴发安 杨宗德 杨东发 杨振德 陈桂清

陈桂喜 吴发清 杨义发

信士

陈童捐银五十毛 梁源荣捐银三十毛 杨祖明捐银三元七 杨丁未捐银三元四毛半

杨云戌捐银十二毛 杨云桥捐银十二毛 杨宗光捐银一十毛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岁次壬午二月

注：此碑现仍放在平岩村岩寨右侧的小溪边

(王机先录)

诗二首

凌绍光

(一)

参观南寨古塔复修竣工庆典有感

2006年3月15日

群山环抱拥高峰，文峰古塔展姿雄。
千村安定民心顺，万户欢歌祖国荣。
温饱再向小康进，艰苦创业志未穷。
喜看故地人勤奋，农村面貌焕新容。

(二)

喜逢杨有树同志

五十年前志气同，面对党旗誓尽忠。
一生敬业齐奋斗，两袖清风夕阳红。
故地重游思战友，文峰塔上喜相逢。
古稀耄耋双携手，健步迈登绝顶峰。

忆江南·侗乡好

韦英

(一)

侗乡好，三月正春浓。树护花遮楼阁隐，燕穿蝶舞雨旸中，彩袖引东风。

(二)

侗乡好，古道重人情。三碗油茶四碗酒，一家来客百家迎，闾巷漾温馨。

忆江南·瑶山美

覃安民

瑶山美，河峪好漂流。秀水青山迎远客，惊涛骇浪泛轻舟，两岸笑声稠。

诗四首

龚敬

白石沟访弟

(一)

姐弟相邀访住山，一行亭午过层峦。
纷纷各自抒高见，尽在林粮种养间。

(二)

家临铁路大江边，老树深沟数亩田。
今日住山休买斧，脱贫致富养资源。

(三)

清溪白石水淙淙，创业精神处士风。
种树种田还养殖，俗流不与众人同。

住白石沟答亲友问

晚年好静住山沟，半是家居半旅游。
屋外疏篱成院落，田间小径入林丘。
风光不用一文买，食宿能凭两手谋。
岂必远寻名胜地，花钱辛苦看人头。

记隔山一对夫妻

龚义

恩爱夫妻进山沟，十又余年少外游。
鸡犬猪牛一大群，瓜果米谷成小丘。
勤劳只顾一心干，致富全凭两手谋。
只盼儿曹勤攻读，青丝情愿换白头。

访白石沟

梁肇基

寂寂深山里，潺潺流水声，
柴门何用闭，草径自难寻。
蕨笋殷勤意，桑麻故旧情。
隔窗听夜雨，山远日迟生。

咏三江鼓楼

覃安鼎

巧夺天工

浔江河畔一崇楼，巧夺天工接斗牛。
六角飞檐龙凤舞，尧天舜日耀千秋。

风骚别致

三江鼓楼大江边，二十七层龙凤檐。
矗立九霄扬四海，风骚别致乐尧天。

高耸云霄

古镇宜阳一巨亭，装点侗乡面貌新。
飞檐穿斗歇山式，高耸云霄冠古今。

瑶乡名胜·风情

向本才

九江瀑布

一路山青水秀川，攀行鸟道过山穿。
两峰对峙插云汉，一水中分吊碧渊。
河口汇流一坝锁，山头纵览几帆船。
晚间千万星星闪，谁料深沟别有天。

禹甸飞泉

绿树丛中杂鸟喧，遥看白练挂峰前。
飞花朵朵垂空下，金线银线丝撒满渊。

马尾滩秀

情系深沟马尾滩，梦游越险探奇观。
银丝玉带飘飘下，红日波光闪闪翻。
奇石怪藤沿岸丽，青山秀水入云端。
关河降下无休止，为洗尘埃汇海宽。

龙潭飞瀑

仰望两崖间，瀑流落九天。
雷鸣惊十里，电闪破千渊。
潭面翻金浪，日中腾紫烟。
沟深林密处，美景讶天然。

初江奇景

三宵洞下马尾滩，滚滚龙潭卷巨渊。
秀水奇峰冠两县，千年美丽出瑶山。

鹧鸪天·三宵洞

访胜寻幽瑶岭巡，峪深树海景森森。
谁知隐现一洞口，前面天生一线坪。
双眼望，洞中深，宽宽地毯谁铺成。
顶头石乳星光耀，锦绣石房四季春。

瑶族风情

(一)

(瑶族打锣挖地怀古歌)

咚咚哐，咚咚哐，挖地锣声满山岗。
似雨银锄劈下土，寒冬腊月就开荒。

(二)

唱首山歌慢表扬，谁人锄快劲头强。
移山倒海拼搏干，待种桐茶与杂粮。

(三)

瑶妹绣花

锣鼓一停取花针，心灵手巧绣幅成。
胸前绣满红花朵，绣对兰花锦绣春。

瑶族入赘歌

(一)

瑶族入赘喜洋洋，财产平分赐予郎。
换姓改名接宗祖，鸳鸯对舞百年长。

(二)

嫁男嫁女似枝花，男女平权制度佳。
女婿如同亲生子，互尊互让到白发。

诗三首

赖诗仁

(一)

抗击“非典”感赋

“非典”瘟神夺命凶，方闻笑语已人空。
他邦恁幸皆轻染，我域何辜竟首冲。
救难舍生医护勇，查疑忘寝干群同。
阴霾扫尽乾坤朗，虎跃龙腾丽日中。

(二)

和江泽民《登黄山偶感》步原韵

(江泽民诗：

遥望天都倚客松，莲花始信两飞峰。
且持梦笔书奇景，日破云涛万里红。)

峭壁风前一劲松，冷观流雾乱群峰。
几番雨过归晴景，更见千山染翠红。

(三)

秋 题

屋后庭前绕翠青，春风馥郁又金风。
黄童笑闹花间逐，皓首悠然乐景明。

众志成城抗“非典”

杨顺丰

众志成城抗“非典”，白衣天使走在前。
北京有难全国助，中华无灾世界欢。
三江千群并肩战，四海农工携手歼。
运筹帷幄国务院，人民安康乐无边。

诗三首

莫先平

游丹洲明代古城

轻舟破浪过融江，喜见丹阳映艳阳。
旧巷幽幽农舍乐，新茶醞醞柚花香。
一泓澄碧洲头望，百鹭悠然水面翔。
慧眼苏公开宝岛，古城今日始民康。

柳州市慈善会三江办事处成立有感

挂牌成立逢初雨，机构全新事业兴。
单位捐资温暖送，个人出力热情真。
扶贫济困千家惠，累德积功万古名。
灾病孤残多救助，春风缕缕抚身心。

观独峒高亚村宝石加工有感

机台转动乐无穷，宝石加工产业隆。
昔日梧州钻技艺，此时高亚铸恢宏。
家家彩电欢声里，栋栋新楼绿岭中。
侗寨苗村添喜气，脱贫致富道途通。

词二首

韦运芳

浪淘沙·茶叶村见闻

秀水绿山间，晨雾连绵。茶园遍岭叶芽妍。科技兴农开富路，侗寨新颜。
大厦入云天，电讯频传。争迎淑女满庭喧。频创名优经济振，奋力扬鞭。

水调歌头·游丹洲村

踏浪洲头上，来觅古明城。欣逢金柚佳节，宾主意情深。嘉树星罗文旦，庭院温馨典雅，河畔漾欢声。生态观光好，宝岛醉游人。

融今古，优环境，客盈村。拓开致富门路，收入逐年增。创建国优景点，荟萃八方贵客，宏业永蒸蒸。与时俱进者，阔步启新程。

《三江文史资料》稿件续征启事

《三江文史资料》稿件征集工作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展以来，在各级政协的统一部署和具体指导下，在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关心和热情支持下，取得了一定成绩，征集到了一大批珍贵的史料，至本期止，共刊印了七辑《三江文史资料》，为存史、资政、育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文史资料的撰写和征集，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意义十分重大。这项工作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为此，恳请社会各界人士继续踊跃赐稿。

征稿范围：继续征集建国前三江史料（以民国时期为主，兼收宋、元、明、清各时期）；重点征集建国后至“文革”前三江史料；同时也征集“文革”中及其以后的三江史料。

二、征稿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科技、交通、民族、宗教、社会、风俗、名胜、古迹等各个方面，以及反映三江各个时期重要事件、人物的文字、实物、照片、图表等各种资料。

三、来稿要求：（一）所记必须是作者亲历、亲见、亲闻的史实，不可虚构。（二）必须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真实记述各方面的成就、经验，理智地总结失误教训，不夸大，不缩小，不隐过，不溢美，不为尊者、贤者、亲者讳，如实反映历史本来面目。（三）有历史价值，有教育意义，有借鉴作用。（四）体裁不限，长短不拘（一般以3000字以下为宜，特殊稿件另论）。（五）如属采访调查所得的材料，必须经严格考证核实。人物姓名，事件时间、地点、经过、前因后果，都要写清楚、准确。（六）稿件请用方格纸抄写，字迹清楚。注意署作者姓名、通讯联络地址、电话、邮编，以便联系。（七）投稿邮箱：政协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委员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八）在尊重史实、保留原意和原来体裁风格的前提下，我委编辑可对来稿进行技术处理，如压缩篇幅，删除赘语，修改病句、错字等。如不同意，请在来稿中说明。（九）来稿一般不退，请注意保存底稿。如属不便复制的物件，请用挂号投寄，以免遗失。用后退还。（十）来稿一经刊用，即付给稿酬并赠送当期资料。

本启事，请互相转告。不明之事，欢迎垂询。谢谢。

政协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委员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

教科文卫委电话：（0772）8615799

县政协办公室电话：（0772）8612225

邮 编：545500